新建設

學術性月刊

蘇聯的新五年計劃與共產主義建設　郭季青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　王亞南

明確師範大學的教學工作方針　丁浩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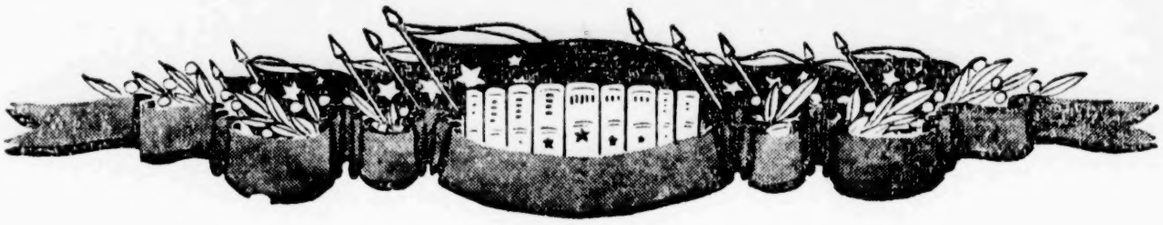
讀「蘇聯利益和人類利益的一致」　梁純夫

略論現實主義與主觀　蔡儀

11

1952

新建設雜誌社出版



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告世界人民書……（一）
蘇聯的新五年計劃與共產主義建設……郭季青（三）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王亞南（八）
明確師範大學的教學工作方針……丁浩川（一四）

·學習「毛澤東選集」第二卷·

讀「反對自由主義」……王南（一七）
讀「蘇聯利益和人類利益的一致」……梁純夫（一九）
「矛盾論」與中國革命實踐問題……馬特（二一）
「矛盾論」解說（五）……李達（二六）
略論現實主義與主觀……蔡儀（三二）

譯文

關於蘇聯司法幹部的訓練……蘇·H·Г·蘇達里可夫（三五）
政治經濟學批判之導論（下）……馬克思原著 郭大力譯（三八）

書評

評介幾種米丘林學說的主要著作……葉篤莊（四三）
學術論文提要……（四七）
國外期刊重要學術論文介紹……（五三）
國內期刊重要學術論文索引（一九五二年七—九月）……（五八）
新書簡介……（六一）

新建設
（學術性月刊）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號
（總第50期）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編輯者：新建設雜誌社編輯委員會
出版者：新建設雜誌社 北京東華門南夾道62號
總經售：新華書店 北京前門外延壽寺街
印刷者：北京新華印刷廠分廠

定價：每冊四千元
預定：全年十二期 48,000元
半年六期 24,000元
三個月三期 12,000元

廣告刊例
封底全面三百萬元，半面一百六十萬元。封內全面二百萬元，半面一百一十萬元。

本期印數：1—30500（京初）

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

告世界人民書

我們來自三十七個國家的三百六十七位代表，在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上，在友好和互相信任的氣氛中聚集一堂；我們屬於不同的民族和種族，持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和政治見解，但代表着十六億人民爭取和平的堅强意志；我們一致認爲爭取和保衞和平乃是一個必須而且能够以共同的努力來完成的迫切任務。

在朝鮮，殘酷的戰爭已經進行了兩年多。細菌武器、凝固汽油彈、濫肆轟炸以及其他大規模屠殺方法，正被肆無忌憚地使用着。和平的城市和鄉村被焚燒和毀滅了；無辜的男女和兒童遭到可怕的暴行。這一個戰爭已經奪去了無數人的生命和幸福。美國政府拒絕依照國際法原則遣返戰俘，阻礙着朝鮮停戰的實現。美國軍事指揮部再三破壞和談，使用非法的戰爭方法，以及侵犯中國主權，都是有擴大戰爭的危險的挑釁行爲。

同時，在越南和馬來亞等國，企圖鎮壓人民爭取自由願望的武裝干涉在繼續着。

美國政府爲了把日本變成一個戰爭基地，來發動對亞洲及太平洋區域的新戰爭，違反了莊嚴的國際協定，扶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對於整個區域來說，這就是把戰爭的惡魔又復活起來。在本區域的許多國家裏，爭取民族解放與維護民族獨立的鬥爭正遭受着外國的干涉。由於軍事基地的强行建立和軍事同盟的强迫簽訂，許多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遭受了侵犯。許多國家的財富正受到掠奪，它們的經濟資源正被掠奪來爲外國的侵略戰爭計劃服務。在被迫參加大規模擴軍備戰運動的國家裏，物價高漲，通貨膨脹，嚴重地影響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封鎖和禁運造成了更多不必要的困苦，使得還沒有完全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下恢復過來的經濟，又陷於紊亂。許多國家的文化事業和社會改進計劃不得不停頓。在本區域的很多地方，婦女的權利被侵犯，兒童的福利被忽視。爲了辯護並促進戰爭政策，有人正在通過欺騙宣傳，來煽動國際間的猜疑，宣揚種族歧視的理論，並用各種方法來製造各民族之間的分裂。

和這種向戰爭狂奔成鮮明對比的是：全世界的人民都誠懇地渴望停止目前的各種衝突，把用來毀滅生命的力量和資源用來建設並美化生活，並保證人類應有持久和平。

仍然爲外國奴役着的各國人民認識到，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與反對戰爭的鬥爭，是緊密結合，不能分開的。備戰正在加强着奴役他們

的鎖鏈。在其政府正領導着備戰的國家中，人民生活在恐懼與毫無保障之中；他們正在認識到，祇有經過和平發展才能獲得安全和穩定。那些有巨大的和平經濟建設計劃的國家，迫切地渴望和平，以便繼續進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工作。

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各國人民堅持共同的目標，就是反對戰爭，保衛和平。

我們重申我們堅定的信心：具有不同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國家是能够和平共處、互利合作的。

我們充分瞭解：和平不能等待，和平必須爭取。爲了贏得持久和平，我們必須團結起來進行不懈的鬥爭。

爲了這個區域和世界的和平，必須要求：

立即在公平合理的基礎上，實現朝鮮停戰；結束越南、馬來亞及其他地區的戰爭；並從這些地區撤退一切外國軍隊。

制止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締結有關各國與日本之間的眞正的和約；建立獨立、民主、自由與和平的新日本。

反對一個國家干涉另一國家的內政；反對一個國家侵犯另一國家的主權；保衛並實現民族獨立。

反對封鎖和禁運；在平等互利基礎上促進各國間的經濟合作和文化交流。

禁止煽動戰爭；反對種族歧視；保護婦女權利，增進兒童福利。

迅速締結五大國和平公約。實行裁減軍備，禁止使用原子、細菌和化學武器及其他大規模屠殺的武器。

美國人民在保衛亞洲及太平洋區域與全世界和平的鬥爭中，負有特別重大的責任。

美國政府在本區域和世界其他地區進行戰爭與準備戰爭的行爲，對於亞洲及太平洋區域人民以及全世界的人民都是深重的禍害。這些行爲雖然是假藉美國人民的名義進行的，但是既不符合美國人民的意志，也不符合他們的利益。

因此，美國人民的迫切需要和莊嚴的義務就是，担當起責任來制止他們政府的這些行爲，並把他們的國家引到和平的道路。

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向正在巨大困難中爲和平而鬥爭的美國人民表示敬意。我們希望美國人民加緊鬥爭，加强團結，來保衛和平。我們祝他們在這個崇高的事業中獲得成功並向他們伸出我們的友誼的手。

我們瞭解：日本人民在美國佔領者和本國軍國主義統治者的壓迫下，遭受着嚴重的痛苦。我們相信，他們一定會和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其他各國人民站在一起，爲民族獨立並爲免作砲灰而鬥爭。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各國人民，將全力支持日本人民保衛和平、爭取獨立的英勇鬥爭。我們祝他們成功並向他們伸出我們的友誼的手。

目前戰爭所伴隨的滔天暴行已經激起每一個善良男女的良心。對平民的大規模屠殺，對和平城市和鄉村的瘋狂破壞，以及加諸於無辜婦女兒童身上的空前的恐怖，都使近代戰爭成爲一個毀滅一切的工具。用人類發明的最惡毒的武器來屠殺同類的罪行，勢將波及其它地方和人民。如果不讓悠久年代的文化成就毀滅無餘，如果不讓生命變成禽獸的生存競爭，如果還要生命保留幾分人道，那麼，在朝鮮、越南和馬來亞及其他國家的血腥罪行便必須加以制止。另一次世界大戰的悽慘遠景，使每一男女和兒童的生命都受到危險。所以，爲爭取和平並制止世界走向戰爭的鬥爭是我們的共同職責。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各國人民抱定決心，要向戰爭勢力進行無情的鬥爭；並且堅信：他們在與一切善意的人們合作之下，一定能够避免威脅着我們的浩劫，消除戰爭的陰雲，並廓清人們的眼界，來迎接普遍友好與持久和平的曙光。

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二日於北京

蘇聯的新五年計劃與共產主義建設

——爲慶祝十月革命三十五週年而作

郭季青

一 蘇聯新五年計劃對於人類歷史發展的偉大意義

蘇聯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已勝利閉幕了，它總結了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以來黨和全體蘇聯人民的偉大鬥爭和勝利，並且指出了蘇聯走向共產主義及資本主義各國人民爭取解放的鬥爭達到完全勝利的道路。這不僅是蘇聯共產黨和蘇聯人民的偉大勝利，也是全世界勞動人民和一切愛好和平的各國人民的共同勝利。因爲，蘇聯共產「黨的利益和愛好和平的各國人民的利益不但沒有矛盾，而且是融合在一起的。至於蘇聯，它的利益是決不能跟世界和平的事業分開的」。㈠

在這次大會上所通過的關於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五年蘇聯發展五年計劃（第五個五年計劃）的指示草案，就是這一全世界歷史性的偉大勝利的具體標誌。這個計劃的完成，將加强蘇維埃國家的力量和提高蘇聯人民的生活水平，使蘇聯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大大地推進了一步，並且又一次向全世界表明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較之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具有根本的優越性，同時，它對加强國際和平、民主與社會主義陣營的事業，也有無比巨大的貢獻。所以，全蘇維埃人民正爲這個計劃的一致通過而歡呼，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也都爲這個計劃的付諸實現而慶賀！

誠如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馬·薩·薩布羅夫所說：「第五個五年計劃繼續了前幾個斯大林五年計劃的和平發展蘇聯經濟、有計劃地擴大社會主義經濟及改善人民福利的路綫。第五個五年計劃的實現，將是蘇聯逐漸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一個重要階段。」㈡從十月革命到今天，特別是蘇聯實行了第一個五年計劃以來，在「共產主義偉大建築師」斯大林的英明領導之下，到第三個五年計劃時期（一九三八年——一九四二年），蘇聯已進入了「發展的新階段」，爲「完成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建設、逐漸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㈢而努力了。一九三八年時，蘇聯在生產技術和工業發展速度方面，都已超過了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可是，由於希特勒匪軍的進犯（一九四一年六月）和破壞，就使蘇聯的和平建設不得不暫時中斷下來。蘇聯在偉大的衛國戰爭取得勝利後，又進入了經濟發展的新的和平時期，從一九四六年起，開始執行了第四個五年計劃，它的基本任務，就是要恢復戰災的區域，恢復工農業的產量到戰前的水平，並且要超過這個水平。到一九五〇年，這些任務都已超額完成了。照計劃上的預定目標，蘇聯一九五〇年的工業產量，應較戰前（一九四〇年）超過百分之四十八，執行的結果，却超過了百分之七十三。在農業方面，一九五〇年的穀物總收穫量，也比一九四〇年增加了三億七千六百萬普特，穀物的單位產量平均增加了百分之十三。所以，當戰後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時，蘇聯的國民收入已比戰前超出了百分之六十四，大大地提高了全體蘇維埃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

所有這些輝煌的成就，都爲蘇聯過渡到共產主義創造了更堅實的物質條件。斯大林進一步證實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預見，根據現實的歷史條件，具體地確定了蘇聯建成共產主義社會所必須達到的高度的生產力水平。他明確地指出：「只有當我們在經濟上也超過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時，我們才可希望我們有完全充足的消費品，有豐富的食品，那時我們就有可能實行從共產主義第一階段過渡到共產主義第二階段。」㈣那麼，到底應該達到怎麼樣的生產力水平，蘇聯才能在經濟方面（即按人口平均計算的生產量方面）超過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呢？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斯大林在莫斯科選民大會上曾這樣提出，蘇聯的生產力水平必須達到每年能產鐵五千萬噸、鋼六千萬噸、煤二萬萬噸、石油六千萬噸，就可使蘇維埃祖國「有了免除一切意外的保障」㈤，而順利地

㈠ 斯大林在聯共第十九次代表大會閉幕會上的演說。
㈡ 在聯共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詞。
㈢ 聯共第十八次代表大會根據莫洛托夫的報告而成立的決議。
㈣ 見「列寧主義問題」，中文版，頁七五七。
㈤ 見「戰後蘇聯與國際形勢」，一九五一年二月人民出版社出版，頁二〇。

進行共產主義建設了。根據新五年計劃的規定，到一九五五年底，蘇聯將可產鐵三千四百餘萬噸、鋼四千四百餘萬噸、煤三億七千二百餘萬噸、石油約七千萬噸。到那時，蘇聯的鐵、鋼和煤的產量，將分別達到上述生產力水平的百分之六十八、百分之七十三點六和百分之七十四點五，而石油的產量，則將超過百分之十六點六了。所以，「第五個五年計劃的完成，將是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前進了一大步。」㈥

同時，蘇聯的第五個五年計劃，又是一個和平的經濟和文化建設計劃，它要「保證國民經濟各部門的進一步發展以及人民物質福利、衛生和文化水準的提高」㈦，它規定在這五年內，工業生產水平要提高百分之七十，穀物總產量要增加百分之四十到五十，國營和合作社零售貿易要增加將近百分之七十，國民收入將至少增加百分之六十，社會保險的撥款將增加百分之三十，各種醫療設備將增加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此外，在城市和農村增設的學校，還比上一個五年計劃增多百分之七十，公共圖書館網要擴大百分之三十，俱樂部也要擴大百分之十五。所以，蘇聯新五年計劃就非常明白地反映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法則的主要特點，是「通過在優越的技術基礎上進行的社會主義生產的不斷發展和不斷趨於完善，保證社會所有成員的不斷增加的物質和文化要求得到最高限度的滿足。」㈧

蘇聯新五年計劃的另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它的規模是空前的，它將朝着高度機械化、電氣化和自動化的方向發展。在這五年內，國家基本建設的總量將比第四個五年計劃約增百分之九十，電力站的整個能量約增爲兩倍以上，水電站的能量增爲三倍，費力的操作將完全機械化，生產將廣泛自動化。特別要迅速發展機器製造業，以爲蘇聯國民經濟各部門中新的高速度的技術進步的基礎。在五年期間，要使機器製造業和金屬品工業的產量約增爲兩倍。在農業方面，也要使集體農場的基本田間工作完全機械化，而對飼養牲畜、栽培菜蔬和水菓、排水等操作，都要開始實行廣泛的機械化。由於高度的技術改進，在今後五年內，工業方面的勞動生產率將提高百分之五十，農業方面也將提高百分之四十。這就使社會生產力有了空前的提高。

我們分析了蘇聯新五年計劃的具體內容及其基本特點，就可以更深刻地認識到它對於人類歷史發展的偉大意義了。列寧早就指出：「目前，我們主要是用我們的經濟政策來影響着國際革命。所有的人，全世界各國所有的勞動者，都注視着蘇維埃俄羅斯共和國。……在這方面的鬥爭是有全世界意義的。我們一解決這個任務，那我們就是一定和最終地在國際範圍內獲得了勝利。」㈨它的偉大國際意義，我們可從三方面來看：

對蘇聯來說，這個新五年計劃的執行，可以再一次向全世界證明：在蘇聯共產黨和列寧斯大林的領導之下，蘇聯人民不但在一個國家內勝利地建成了社會主義，並且滿懷信心和加快步子地向着共產主義邁進。

對世界人民來說，新五年計劃的執行，將加強和鞏固蘇維埃國家的威力，也就是進一步加強了世界民主、和平與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所以，新五年計劃公佈以後，大大地鼓舞了全世界一切愛好和平的人民，使他們增強了反對侵略戰爭、保衛世界和平的勇氣和信心。特別因爲「這個計劃將進一步鞏固和擴大蘇聯與人民民主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㈩，這樣，就可以加速地使各人民民主國家過渡到社會主義去。正如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委員舍爾所說：「蘇聯第五個五年計劃指示草案不僅考慮到蘇聯人民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需要，而且還考慮到人民民主國家的需要。」㈠㈡

最後，就人類社會的發展前途來說，這個新五年計劃更具體而生動地證明出來：社會主義制度對於資本主義制度具有無可比擬的優越性。就生產力方面來看，從十月革命到今天，蘇聯的工業產量已增加了三十九倍，英國却花了一百六十二年（從一七九〇年——一九五一年）才能做到這一步。法國工業在過去九十年中，增加到不足五倍半；而美國在過去三十五年間，也祇增加了二·六倍。㈠㈢再從生產關係的一方面來看，蘇聯早就根絕了階級剝削、失業現象和經濟危機，人民的物質文化水平日益提高；而在資本主義世界裏，剩餘價值率（剝削率）大大地超過了戰前，（僅在一九三九年與一九五一年之間，由於勞動強度的提高，美國工人所受的剝削，就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㈠㈣目前還有四千五百萬失業和半失業的人口，廣大勞動人民的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都日益惡化了，特別因爲「第二次世界大戰不但沒有消除資本主義的經濟矛盾和政治矛盾，反而使得這些矛盾更加尖銳，震撼了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並加深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總危機」。㈠㈤這些活生生的事實，最有力地指出了歷史發展的道路：今天的時代，一方面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崩潰的時期，同時，又是條條大路通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時期！

㈥ 見聯共第十九次代表大會關於新五年計劃的指示草案。
㈦ 同上。
㈧ 見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
㈨ 「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解放社版，下册，頁五二八。
㈩ 見新五年計劃指示草案。
㈠㈡ 見「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中文版，第一六三期，頁八。
㈠㈢ 參閱貝利亞在聯共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㈠㈣ 參閱「新時代」，一九五二年，第二十七期。
㈠㈤ 見馬林科夫在聯共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二　蘇聯共產主義建設的基本特徵

蘇聯的新五年計劃是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邁了一大步，在這五年內，蘇聯的共產主義建設究竟有些什麼具體內容呢？

在一九五〇年八月、九月和十二月間，蘇聯部長會議按照斯大林的建議，作出了關於建造古比雪夫、斯大林格勒和卡霍夫卡水力發電站以及關於建造土庫曼大運河、南烏克蘭運河、北克里米亞運河與伏爾加河—頓河運河（即列寧運河）的決定。在這以前，蘇聯部長會議及聯共中央委員會還根據斯大林的建議，於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四日發佈了關於改造自然計劃的決定。所有這些，就是偉大的共產主義建設工程，是斯大林的共產主義建設工程。

這些工程之所以偉大，就因爲它的規模在人類歷史上是空前未有的。古比雪夫水電站建成以後，將具有發電能力約二百萬瓩，斯大林格勒水電站將具有發電能力一百七十萬瓩，卡霍夫卡水電站將有發電能力二十五萬瓩。今天世界上最大的水電站，是美國科洛拉多河上的鮑爾德水電站和哥倫比亞河上的大河床水電站，前者的發電能力爲一百三十萬瓩，後者祇有九十七萬瓩。爲了完成古比雪夫水電站，必須挖土一億五千萬立方公尺，澆灌混凝土六百萬立方公尺；建造斯大林格勒站也要挖土一億立方公尺，澆灌混凝土七百萬立方公尺。僅把建造古比雪夫水電站所挖出的泥土，裝到列車上去，它的長度就可以環繞地球四周。這些新水電站的總發電能力約達四百萬瓩，幾乎相當於南美十個國家現有水電站發電能力的四倍。我們知道，在一九二〇年三月列寧所提出的國家電氣化的計劃中，要在十年到二十年內，建造三十個大電力站，它們的總發電能力爲一百七十萬瓩，幾乎十倍於沙俄時代的電力，這在當時已算是一個很龐大的計劃，現在僅祇古比雪夫站的發電量就將超過它了。

再拿土庫曼大運河來看，它全長一千一百公里，也將是世界上最長的一條現代化的運河，巴拿馬運河祇有它的十三分之一，蘇彝士運河也剛及它的六分之一。爲了建造它，將掘土三億立方公尺，而蘇彝士運河祇掘了七千五百萬立方公尺，巴拿馬運河也祇掘了二億餘立方公尺。加以，施工地區是一片沙漠，在修築時，還首須在沙漠上敷設一千多公里的水管，全部工程更包括了三個水電站，靠近運河，還要種植防護林五十萬畝。工程的浩大，也就可想而知了。

其次，是關於改造自然的計劃。一九四八年，蘇聯政府通過了關於植造森林防護帶的計劃，要在一九五〇年——一九六五年內，建立八條大規模的國營防護林帶。加上其他的人造林，共佔面積六百十四萬公頃，如果將它拉成一條三十公尺的森林帶，其長度就可繞地球五十一周。受到全部防護林和人造林的防護作用的，將近有一億二千萬公頃的耕地，相當於英國、法國、意大利、荷蘭、比利時和丹麥歐洲領土面積的總和。㈠㈤

蘇聯共產主義建設的第二個特點，就在於它是利用了最新、最高度發展的技術設備。在修建古比雪夫站和斯大林格勒站的時候，已使用一種巨型的平路機，祇要一個人操機，在一小時內就能壓平六公頃的土地，可以抵得上三百個人的勞動。在開鑿列寧運河時，各主要工程機械化的程度，達到了百分之九十。在這次建築中所使用的一種挖土機，一次就能挖土十四立方公尺。蘇聯科學院院士朱達科夫對於一種超型的自動移轉的挖土機，曾作了這樣的描寫：「它高比九層樓，重達幾千噸，鋼鐵製的零件數萬件，安裝着發電機四十四部，總發電能力六千瓩，一斗能挖起十五立方公尺的泥土，一晝夜挖出的土能裝兩千多火車廂。」㈠㈥像這樣的掘土機，每架就可替代一萬二千名掘土工人的勞動！

由於蘇聯掌握着這樣進步的科學技術，像上述那樣規模宏大的共產主義建設工程，就可能在很短的時期內完成。古比雪夫站將完成於一九五五年，斯大林格勒站將完成於一九五六年，土庫曼大運河將完成於一九五七年。這些工程都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它們竟在五、六年內完工，難道還不是人類歷史上的奇蹟嗎？像巴拿馬運河，全長不過八十一公里，却築了三十五年，蘇彝士運河全長一百六十公里，也築了二十二年。可是，蘇聯已通航的列寧運河（今年七月二十七日已正式通航），長達一百零一公里，全部工程還包括十三座水閘和三個大抽水站，另有一個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水庫——齊姆良海（全長一百八十公里，容水一百二十六億立方公尺），實際祇有四年（一九四八年——一九五二年）的時光，就已完工了，對照之下，也可反映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資本主義制度的腐朽性了。

蘇聯共產主義建設的第三個特點，就是它開闢了人類征服自然的新紀元，使人類進入大規模改造自然和支配自然的階段。一九二一年四月，在列寧致南高加索共產黨員的信上，就這樣號召：「爲了無論如何都必須發展農業和畜牧業，灌溉事宜是特別重要的。」要「立刻努力改善農民生活，開始電氣化與水利灌溉的巨大工程。水利灌溉是最需要的，它最便於幫助改造邊疆，復興邊疆，埋葬一切舊的，而使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事業鞏固起來。」㈠㈦斯大林在說到伏爾加河東岸區的防旱問題時也這樣指出：「在伏爾加河東岸各區培植森林和造成樹蔭地帶，是有莫大意義的。……我們在伏爾加流域一定要有一個完全穩定、絲毫不受偶然天災影響的……產穀基地。」㈠㈧在列寧和斯大林的創議

㈠㈤ 參閱張醒石：「蘇聯改造自然的計劃」，載「中蘇友好」第三卷第五期。

㈠㈥ 參閱「蘇聯偉大的共產主義建設工程」，人民出版社編，頁一四四。

㈠㈦ 見「列寧文選」，下卷，頁八四三——四。

㈠㈧ 見「列寧主義問題」，頁六〇五—六。

和領導下，蘇聯人民開始與乾旱和乾風進行了鬥爭。一九四八年蘇聯政府所通過的關於植造森林防護帶、實行牧草與農作物輪種制、建築池塘和蓄水池的計劃，就可以保證蘇聯歐洲部分草原區和森林草原區年年豐收。誰都知道，蘇聯的黑土地帶（即蘇聯歐洲部分廣大的草原地區和森林草原區），是世界聞名的肥土，特別是伏爾加河流域，俄羅斯人民很親熱地稱它爲「哺育他們的媽媽」。但是，由於帝俄時代採伐林木過多，這一大地黑土帶就缺少樹林，經常要受到乾風（從裏海沿岸和中亞細亞吹來的）的侵襲。這一帶，雨量本來不多，再加乾風一吹，就時常要鬧旱荒。在最近六十五年中，伏爾加河流域就遭受到二十次旱荒，一九四六年農產的歉收，也是爲了這個原因。可是，再過十幾年，當這個改造自然的偉大計劃實現時，旱災就將成爲蘇聯歷史上的名詞了。就說土庫曼大運河的工程吧，它建成以後，將使沙漠地區變爲桑田，估計在運河兩岸，將可開闢七百萬公頃的新牧地，建立一千多個集體農莊和七百多個拖拉機站。在過去，人們一直是把「征服自然」看成一種神話的，可是，在今天的蘇聯它就快成爲美麗的現實了。

從蘇聯新五年計劃的具體內容以及現階段共產主義建設的一些基本特徵來看，我們可有充分理由，相信蘇聯的共產主義建設，一定可以得到輝煌的勝利。

在斯大林的這部天才著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他創造性地發展和豐富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關於科學共產主義的學說，給我們明確地指示出來：

「過渡到共產主義，至少必須實現三個基本的先決條件：

「第一，是整個社會生產的不斷增長，首先是生產資料生產的增長。……

「第二，必須用實行起來有利於集體農莊因而也有利於整個社會的逐漸過渡的辦法來把集體農莊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並且也用逐漸過渡的辦法使產品交換制來代替商品流通制。……

「第三，必須達到這樣的社會文化的高漲，保證社會的一切成員全面發展體力和腦力，使社會成員有可能獲得足以成爲社會發展的積極活動家的教育，有可能自由地選擇職業，而不致由於現存的社會分工終身束縛於一種什麼職業。」㈢㈨

先就第一個條件來看：從十月革命勝利以來，蘇聯的社會生產是不斷增長的，並且還以日益迅速的步子在增長着。雖則說，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的產量同時在增長，而在過去三十五年中，生產資料的產量無疑地是增長得更快、更多。當作「國民經濟改造事業的基本槓桿」的機器製造業，在一九四〇年時，它的產量（包括五金加工工業）已比一九一三年增加了五十倍；到第四個五年計劃完成時（一九五〇年），又比一九四〇年增加了二點三倍，在新五年計劃期內，又規定了要「迅速發展機器製造業和金屬品工業的產量約增爲二倍。」就整個工業生產來看，則在新五年計劃期內，規定生產資料產量的增加率爲百分之十三；消費資料產量的增加率爲百分之十一。

就第二個條件看，今天蘇聯的經濟基礎雖是社會主義所有制，但它却具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國家所有制形式（這是全民的財產），另一種是合作社和集體農莊所有制形式（這是個別集體農莊的財產或各合作社的財產）。那麼，在今天的蘇聯能不能就把集體農莊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呢？怎麼樣才能提高到這樣的水平呢？斯大林在覆薩寧娜和溫什爾兩同志的信上，對這個問題曾作了最完善的闡釋：由於集體農莊的產品，包括着穀物、肉類、油類、蔬菜等，另有農莊莊員的個人副業產品。這種產品的大部分，要列入商品流通的系統中，正就是這個情況，現在就阻礙着把集體農莊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爲了把集體農莊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必須把集體農莊生產的剩餘物從商品流通的系統中消除掉，把它們列入國家工業和集體農莊之間的產品交換制中。」㈢㈩在目前，蘇聯還沒有發達的產品交換制度；但在農業的一切部門中，已經有了產品交換的萌芽，並且正在日益擴大中。事實上，集體農莊的農民從國家手中換得的產品，將比在商品流通中得到的，既多而又便宜。與政府訂有產品交換合同的集體農莊，比沒有訂立這種合同的集體農莊，當然要獲得更多的利益。正因如此，這種產品交換制一定會在蘇聯很快地全面發展起來。在新五年計劃期間，國家還要繼續不斷地減低消費品的價格（至少要減少百分之三十五），這也可進一步擴大產品交換的範圍，使它逐漸發展成爲廣泛的產品交換制度。祇有當商品流通的範圍日益縮小了，就使社會主義易於過渡到共產主義了。因爲，「在社會主義生產的兩種基本形式——全民的形式和集體農莊的形式——讓位於一個無所不包的生產部分時，商品流通及其『貨幣經濟』就和價值法則一樣地要消失。……商品流通與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前途是不相容的。」㈢㈠

最後，就第三個條件看，在今天的蘇聯，已可使社會的一切成員去發展他們的腦力和體力了。爲了使社會成員有可能自由地選擇職業，還需要實行普及義務技術教育。在新五年計劃中，規定「爲了保證中學畢業學生有條件自由選擇職業，今後開始在中學校內實行技術教育，並爲逐漸過渡到普遍實行技術教

㈢㈨ 見「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
㈢㈩ 同上。
㈢㈠ 見馬林科夫在聯共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育而採取必要的措施」。同時，還保證成年的勞動市民可以不脫離工作而得高等、中等、專科或普通學校的學習機會，並在工廠中組織訓練班，使那些使用新式機器的熟練人員也可得到必要的科學知識。由於社會文化的普遍高漲和生產規模的高度機械化和日益自動化，就可以爲縮短勞動時間（逐漸縮減到六小時乃至五小時）和最後消滅腦力與體力勞動的對立，創造更共成熟的條件。

所以，當新五年計劃完成時，蘇聯是一定可以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大大地推進一步了。

三　保證蘇聯永遠走向勝利的基本因素

然則，究竟有那些基本因素，才使蘇聯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更大的勝利呢？一九三三年，在總結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斯大林曾經指出：保證蘇聯得到這個歷史性勝利的，有三個基本因素。他說：

「首先就是千百萬工人和集體農民所表現的積極性和舍已精神，熱忱和首倡性，他們和工程技師人員一起施展巨大力量來發展了社會主義競賽和突擊運動。沒有這個情況，我們就會不能達到目的，就會不能前進一步，這是無可懷疑的。

其次，就是黨和政府所實行的堅强領導，它們號召羣衆前進，並克服了前進途中的一切困難。

最後，就是蘇維埃經濟制度所特具的種種長處和優勢，它包含有克服一切困難所必需的雄厚能力。」㉓㉓

這三個基本因素，即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無比優越性、人民羣衆的創造性和積極性以及蘇聯共產黨和蘇維埃國家的堅强領導，就是保證蘇聯永遠走向勝利的主要動力。

由於社會主義制度永遠消滅了階級對立和人剝削人，所以，在這個經濟基礎上，它才可能產生了社會的精神上和政治上的一致。在今天，構成蘇維埃社會的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是在友愛合作基礎上生活着和工作着。每一個蘇維埃公民，都關心着共產主義建設的勝利和社會主義祖國的鞏固。蘇維埃國家已經表現着全體蘇維埃人民的共同利益。今天「蘇維埃愛國主義的力量，就在它不是以種族主義或民族主義的偏見爲基礎，而是以人民對自己蘇維埃祖國之深厚忠忱，以及我國所有各族勞動者之兄弟般的友誼爲基礎」，它「就是蘇聯各族人民間牢不可破而愈益鞏固的友誼的基礎。」㉓㉔正因爲蘇聯各族人民對於社會主義祖國的無限忠忱，所以，蘇維埃愛國主義在實踐中已經化爲爲爭取共產主義的勝利而不懈地勞動和鬥爭的決心和力量了。

而蘇聯人民的這種高度自覺的和創造性的勞動，對於共產主義建設是具有決定意義的。列寧在論「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時，曾這樣深邃地指出：「無產階級專政，並不僅僅是對剝削者採用的强力，甚至主要不是强力。這種革命强力底經濟基礎，它富有生命力和必獲勝利底保證，就在於無產階級是代表着並實現着比資本主義更高式樣的社會勞動組織。要點就在這裏。共產主義所具力量底來源及其必然會完全勝利底保證，就在這裏。」㉓㉕又說：「共產主義就是利用先進技術的那些自願、自覺、聯合的工人所創造出來的，較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之所以異常寶貴，因爲它是共產主義底實際開端。」㉓㉖這也就是斯大林所說的「覺悟到工人不是爲着資本家作工而是爲着自己的國家作工，爲着自己本階級作工——這種覺悟心就是我國工業發展和改善底極偉大的推動力。」㉓㉗

當然，蘇聯在建設共產主義事業中的一切勝利，都是與蘇聯共產黨的——列寧斯大林的黨的正確領導不可分的。而斯大林的天才領導，更是蘇聯永遠走向勝利的一切保證中的最大保證。因爲，「斯大林主義的原則已在我們黨內取得了完全的、絕對的勝利」㉓㉘，斯大林主義的光輝照亮了全人類走向共產主義完全勝利的道路，全世界勞動人民都已緊密地團結在斯大林的勝利旗幟下，朝着我們理想的目標——共產主義邁進了。

*　*　*

三十五年來，蘇聯人民所走的道路，就是我們中國人民今天正在走和明天將要走的道路。我們慶祝偉大社會主義十月革命的三十五週年，最主要的，就是要向蘇聯學習，學習他們勝利地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寶貴經驗。毛主席教導我們：「聯共就是我們的最好的先生，我們必須向聯共學習。」㉓㉙劉副主席也說：「我們中國人民的革命，在過去就是學習蘇聯，『以俄爲師』，所以能够獲得今天這樣的勝利。在今天我們要建國，同樣也必須『以俄爲師』，學習蘇聯人民的建國經驗。」㉓㉚現在，我們正在走向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就更應加倍努力地向蘇聯學習，在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早日完成國家的工業化，勝利地從新民主主義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去。

㉓㉓ 見「列寧主義問題」，頁五二九。
㉓㉔ 見斯大林：「論蘇聯偉大衛國戰爭」，頁一六〇！一。
㉓㉕ 見「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上册，頁二三二。
㉓㉖ 同上，頁二四二。
㉓㉗ 同上，下册，頁一〇五。
㉓㉘ 見伏羅希洛夫在聯共第十九次大會上的演詞。
㉓㉙ 見「論人民民主專政」。
㉓㉚ 見一九四九年十月五日在中蘇友好協會總會成立大會上的報告。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

王亞南

一　當前政治經濟學學習上已經發生的和尚存在着的問題

政治經濟學的學習，在目前，不能不說是相當的普遍了。但正因爲如此，在學習過程中，也就相當普遍地存在了一些問題。那些問題，基本上是由舊經濟學的學習轉變到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學習所無可避免的，要當作一種規律發生的。

爲了說明的便利，我把那些問題概括在以次幾個有着聯帶關係的說法中：

（一）資產階級經濟學，是否可以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並存呢？

在以往，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並不被我們的學者教授們，認爲是一種經濟科學；論壇上及大學講壇上差不多通是把所謂經濟學概論或價格經濟學一類東西，奉爲金科玉律。現在情況根本改變了，教授們一下轉不過彎來，乃一半保留一半轉變的認爲價格經濟理論一類東西，即使不算全對，也至少可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相並存在，「道並行而不悖」；何況在我們社會的新民主主義經濟中，有社會主義經濟成份，也有資本主義經濟成份，不是可以作爲並存的物質根據麼？有一位教授，還在公開集會中表示：他能把兩者同時講得沒有「矛盾」，並叫學生聽得非常「滿意」。我們大學教授的本領，是可見一斑的！然而，學了一些舊的貨色捨不得丟，似乎情有可原；拿舊的教義來比附新的眞理，一時也不易完全避免；若不分皂白，沒有一點立場觀點，把絕對相反的學說，講得沒有抵觸，讓它在自已乃至自已學生腦子裏「和平相處」，那該是如何荒謬絕倫啊！

（二）批判資產階級的經濟學，是否應當同時吸收它的「精華」？

當「並行論」眼看愈來愈站不住脚的時候，「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另一種說法，就跟着產生了，那就是說，資產階級經濟學中的錯誤成份，雖不妨加以批判，但我們不能一味抹殺其中的「合理」部分，後者是應當吸收的。這裏；且不管這種說法，是否「並存論」的另一表現，也姑不問這種意見，在開始清算資產階級反動經濟理論時有怎樣的害處，我們應當指出的是：馬克思主義在本質上不同於一切狹隘宗派的教義，它對一切科學的眞理，都是敞開着大門的。事實上，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在某些方面，竟可說是資產階級的古典經濟學的發展和繼續。也許就因了這個論據，我們的經濟學教授們，就振振有辭地認定：當前流行的價格經濟學一類東西，不是也可批判吸收嗎？但問題不能一概而論哪！同是戴上資產階級的頭銜的經濟學，性質和內容，是頗不一樣的！這却是我們一些經濟學教授們特別生疏的一點，下面將要交代清楚。

（三）我們應不應當把反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同非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混爲一談呢？

這個問題的提出，也是有原因的。當資產階級的庸俗的價格經濟理論被肯定爲不能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並存，且還肯定爲沒有什麼「精華」被吸收的時候，一種新的逃避方式被採取了，那就是說：反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理論，固當摒棄，但許多並未明白反對馬克思、恩格斯的經濟理論，也應一併否定麼？這個問題在表面上像是提得非常聰明，其實是極端皮相的望文生義的說法，從基本原則上去看，馬克思主義就是一個無產階級的立場，唯物的觀點，辯證的方法，凡是違反那個立場觀點和方法的，就是反馬克思主義的，那同文字上是否把反對的字樣明白標出來，並不相干。就是在馬克思出世以前的許多學說理論，也不妨其爲反馬克思主義的；反過來說，即使在標題或措辭上戴上馬克思主義的帽子，仍舊不妨是反馬克思主義的。

（四）爲什麼明明標榜着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說，也不被贊許呢？

前面所講的三條路都走不通，一種像更聰明，但却更有害的手法被採用了，那就是在新罎子裏，裝進舊酒；把庸俗透頂的經濟理論，硬塞進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範疇中；或者是從馬克思主義的各種文獻裏面，斷章取義地摘取出合乎庸俗口味的片斷，以便把砂子煤屑攪和着麵粉鷄蛋，做成馬克思主義的布丁。在經過了三年學習的我們經濟講壇或論壇上，無論是出於有意或無意的，這總歸是最常見的一種作法。

以上種種存在於我們大學政治經濟學講壇（在論壇上比較不容易顯現出

來）上的思想情況，也許是在過渡期間難於避免的。但在政治經濟學被視爲明確社會立場和改造思想的黨性科學的限內，像這樣一些混亂而有害的思想情況，顯然是需要從最基本的原則上，即從立場觀點方法上，把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與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加以本質的區別的。

二　怎樣解析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不同階級立場

誰都明瞭：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是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代表無產階級的利益的；同時，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是爲資產階級的利益講話的。但這樣說，似乎要引起以次的問題：是不是眞有兩種經濟科學存在呢？不是的，經濟科學只有一個。對於同一研究對象或同一經濟現實，只允許有一種科學的說明。如其一種說法是科學的，其他一種說法就是非科學或反科學的。舉例來說，如其馬克思在資本積累法則中所說明的勞動人口理論是科學的，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就是非科學或反科學的；如其馬克思關於勞動價值學說是完全正確的，亞丹·斯密和里嘉圖的價值學說就是不够完全、不够正確的，以後奧大利學派及其他的價值學說或價格學說就是荒謬錯誤的。亞丹·斯密和里嘉圖是資產階級經濟學者，奧大利學派價格學派亦是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在爲資產階級利益講話的限內，爲什麼表現出了那麼大的分界呢？爲什麼站在無產階級立場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就是眞理呢？

我們須從以次三點來說明其究竟。

（一）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兩大類別：

同是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它們的內容顯得極其不同，乃是由於處在不同歷史時期的資產階級對於經濟學的要求不同，當資本主義經濟尙在發生成長階段的時候，即當舊的封建統治，對資本主義經濟的束縛還沒有解除，或者還嚴重地限制其發展的時候，亦即當資產階級對封建勢力，還是站在進步立場，要求打破生產力障礙，以增進其利潤的時候，適應它的要求的政治經濟學，就需要在消極方面暴露封建經濟形態的生產與交換關係的不合理，而同時在積極方面論證資本主義生產交換方式的合理。資產階級的古典經濟學就担任起了這個歷史任務，由是在它們的政治經濟學說中，就或多或少地表現了以次幾種進步的科學的特徵；（1）與以往封建意識相反，它是否定神定秩序，而採取一種自然主義的觀點的；（2）它是重視生產的，把生產的重要性，提高到了首要地位。惟其它重視生產，所以，（3）勞動這個因素，也相應被看重了；勞動，勞動力，勞動生產率在古典經濟學中，是不厭詳盡地被說明着論證着的。事實上，資產階級要用革命行動向封建領主貴族爭取的，也無非就是當時還被拘束在各種封建組織中的勞動力（不管是封建莊園的農奴，還是封建基爾特的學徒或職工）的解放，沒有這種解放，完全靠僱傭自由勞動者來生產的資本主義經濟或自由競爭經濟，就不可能，而以勞動觀點來說明商品價值的增殖或財富的增加，也是從這點出發的。最後，（4）沿着生產觀點、勞動觀點去看問題，去研究生產力增進的道理，一定會引出階級認識來。沒有這個認識，向封建貴族作階級鬥爭的號召，就提不出來；聯合勞動階級打倒地主階級的號召，也提不出來。結局，階級鬥爭的學說，工資取得者、利潤取得者、地租取得者相互對立的學說，也被迫承認了。一句話，資產階級的前進地位，就決定了它所要求的經濟學說的進步性。

但當資本主義經濟在逐漸淸除了封建障礙的基礎上而大踏步地向前發展起來的時候，它的對立物，即勞動階級的力量，也相應加速地發展着，階級關係根本變化了：資產階級由原來的進步地位，轉落到保守地位了；它原來是同腐朽的封建貴族階級對立，現在是同新興的勞動階級對立；它保守，原來在它進步階級對它有利的進步學說，現在對它不利，反而對它的階級敵人——無產階級有利了。這樣，就使它在經濟問題的說明和研究上，要求掩飾曲解現實。生產的觀點、勞動的觀點、階級鬥爭的看法，都不對路了，都要觸到它的痛處，宣佈它的死刑了。於是，以消費論代替生產論，以效用價值學說代替勞動價值學說，以階級調和敎義代替階級鬥爭理論……把前期資產階級經濟學者在經濟學說中的一些進步性的表現，都給取消了；即以往泛濫在我們大學講壇及論壇的經濟理論，正好是那一些同古典經濟學絕緣了的、同科學絕緣了的各種庸俗不堪的東西。

（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上述兩類資產階級經濟學的關係：

我們前面已經講到，政治經濟學是只能有一個的。如就同一的研究對象或資本主義經濟來說，對它只能有一種的科學說明。

資本主義前期的資產階級經濟學者，既然站在進步立場上，對封建經濟，特別是對資本主義經濟，研究出了它一些基本原則和運動法則，馬克思主義者就決不會像小氣的資產階級學者那樣，講門戶，鬧宗派，深固閉拒，自立蹊徑，而一定會在眞理的大道上，指出其不徹底不明確部分，而對其合理部分加以吸收。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正如同它的哲學乃至社會主義一樣，通是總結以往的有關的學說，在一邊批判一邊吸收的過程中，建立起來的。但作爲完整的經濟科學看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就在以資本主義經濟爲研究對象的限內）還不僅只是批判吸收了資產階級學者或古典經濟學者有關資本主義發生成長的科學的說明，並還確立了任何資產階級學者不敢觸到的有關資本主

義沒落的必然性的法則。因爲資本主義一達到了相當發展的階段，一達到無產階級對它表示了威脅力量的階段，資產階級學者，就再也不敢正視現實，把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剝削本質和內在矛盾揭露出來；也就因爲這個緣故，在無產階級確定地顯示了它的力量的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以後，那怕是像古典經濟學那樣不明確不徹底的經濟理論，也再不能期之於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了。在這以後不久，陸續出現的所謂調和學派、歷史學派、奧大利學派，乃至由奧大利學派脫胎的晚近英美學派，通是站在反動的保守的立場，掩飾並辯護階級剝削，歪曲現實，拒絕眞理，根本沒有科學的影子。不幸，由經濟學者們「買辦」回來，流行於中國大學講壇，而在解放後，還被嚷着要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並存」或批判吸收的，恰好就是這些貨色。不論是克拉克的教義，還是以改良主義標籤貼蓋着的凱恩斯的胡說，在骨子裏，都是反勞動人民的，反馬克思主義的，反科學的。

從這裏，我們應當可以明瞭：

1.當作經濟科學看的政治經濟學，就是由資產階級的古典經濟學者開其端緒，由馬克思主義者加以批判吸收，加以發展完成的那種經濟理論；那就資本主義經濟來說，就是暴露資本主義運動法則的眞理。

2.我們所謂資產階級經濟學，在說明便利上，雖然把它分作兩個類型，但其實只算是不完全不徹底的古典經濟理論和一味爲沒落反動資產階級利益辯護的庸俗的反科學的晚近英美派的經濟理論。

3.晚近英美學派的那些反科學的理論，恰好是我們經濟學者從國外「買辦」回來，當作教條傳播講授的東西，它的立場根本是反勞動人民的，所以我們要徹底排斥，不能唱批判吸收的老調。

（三）爲什麼要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才能把經濟法則完全徹底地發現出來建立起來呢？

我們講過了：資產階級在它前期的進步階段，它是需要揭露封建制及重商主義和專制主義混合的初期政治經濟制度所加於資本主義商品生產上的妨礙的；但因爲當時辯護封建制及重商主義制的表象的片面的學說的存在，和依據那些說法的政策法令的存在，他們商工業的資產者自己，是講不出一些駁斥那些理論政策的道理的，於是代表他們的要求的經濟學者，就不能不從經濟的內部聯繫上，去發現出一些貫徹在其中的運動法則，古典經濟學，就是這樣產生的。同樣的，當無產階級以新興階級姿態，站在進步階段，需要揭發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無政府狀態以及新的奴役制的本質的時候，資產階級早經利用它的金錢，以各種方式，僱傭了大批的御用經濟學者，來爲他們辯護。因爲這個緣故，還因爲資本主義剝削，比封建剝削更有烟幕性，需要徹底的從根本掘發它的秘密，於是代表他們的要求的馬克思主義者，就必須在一方面，把古典經濟學講得不完全不徹底的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法則，進一步地加以批判和發展，而同時對於任何資產階級學者，都因限於階級立場，不敢正視揭發的資本主義經濟的沒落法則，則更不能不依着古典經濟學所揭出的勞動價值學說的綫索，貫徹下去，把剝削者被剝削的辯證規律，建立起來。

單就這一點講，一個完整的政治經濟學，也正如同完整的哲學或社會主義一樣，是歷史規定了要由無產階級的代表者——馬克思主義者來完成的。

但他們是怎樣完成這種階級任務的呢？那是不是用資產階級學者所採用的那種觀點和研究方法可以完成的呢？顯然不是的。

三　怎樣分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不同觀點

一般來講，當作黨派科學看的政治經濟學，是須有更明確的立場，才能依據正確觀點，來作着嚴密的科學分析的。當然，採取了正確觀點，就能更好更有力地堅定立場。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對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說表現的無比正確性，再從研究觀點上看，就更加清楚了。一般資產階級學者有一個共同的極其膚淺的說法，以爲一有立場，一偏向某一階級，就是成見，就不易發見眞理。但他們忘記了，他們的祖先在現代初期，其所以能在科學上有一些貢獻，不正因爲他們是站在反封建貴族的資產階級的立場麼？可見能否發現眞理的問題，不在是否有階級立場，而在是否站在革命的進步的階級的立場上。有了進步的階級立場，站穩在新興的階級的立場上，就必然要採取較正確的觀點的。反之，如爲反動的保守的階級的利益辯護，他就不可能正視現實，把事物的原形暴露出來。

且作一概括的比較說明罷。

（一）資產階級的自然主義、經驗主義和唯心主義觀點：

從整個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說的發展過程來看，很明顯地可以發現，它們所採取的觀點，是逐漸由接近唯物的自然主義，慢慢墮落到唯心主義；亞丹·斯密是由自然主義出發的，里嘉圖也是如此，德國歷史學派充分表現了經驗主義的特點，而到晚近英美學派所宗師的奧大利學派經濟學，就陷於主觀主義的泥潭中了。且分別分劃出一個輪廓。

1.自然主義觀點　由於中世紀的封建統治是把神定秩序作爲護符，而造成了進步的障礙，在近代初期的資產階級的反封建的思想鬥爭中，就一般的舉

起了自然主義這面大旗，把一自然秩序」「自然權」……一類號召，拿來對抗並打擊一切神化的東西。自然就是好的，順着自然就是好的，違反了自然，就不利，就不合理，自然主義是資產階級的各種思想學說的共同特點，政治經濟學也分有了這個特點。亞丹·斯密就公然宣稱要根據人類自私自利的自然本性，聽其自動，不加干涉，而由是建立起一種自然而自由的經濟制度。在他的說明中，還帶有唯物主義的色調。不僅亞丹·斯密，一切古典經濟學者，特別是里嘉圖，因爲他處在英國資本主義發展得相當成熟，但無產階級勢力還不會變爲資產階級威脅的時期，他由是就敢於無所顧忌的從經濟關係的內部，去發掘其運動法則，提出工資利潤的對立，即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不可調和的對立，而被反對者攻擊爲具爲煽動性的唯物主義者了，如其我們把說明限定在這種限度內，即在把資產階級不顧一切，唯利是圖的面貌以及他們與勞動者的對立關係不加隱諱，照着原來形相揭露出來的限內，他確是唯物主義的；這同他們古典學者站在進步的資產階級立場相照應，但也正因爲他們只是站在進步的「資產階級的」立場，他們就不可能是純粹的或徹底的唯物論者，而只不過是在有一些科學的說明中，帶有唯物主義的成份罷了。

2.經驗主義觀點　一切資產階級的學者，在他們不可能是徹底的唯物論者的限內，在他們不可能遇事從經濟關係內部去作着科學的分析的限內，他們都多多少少是經驗主義者，是從表象、片面或外部，把直接感官所接觸的事象或間接得自他人的經驗，沒有提到原則上，沒有通過理性階段，就很皮相地肯定下來，當作眞理；例如亞丹·斯密把商品價值分解爲資本家所得的利潤，勞動者所得的工資，地主所得的地租；里嘉圖依據馬爾薩斯的人口論胡說所提出的工資鐵律，都是受了經驗主義的毒害。

不過，如其說，站在進步資產階級立場的經濟學者有時不免要犯經驗主義的錯誤，而站在快要趨於沒落、或已經震驚於無產階級吼聲的經濟學者，就像逼着不能不變成經驗主義者了，如其他們還不甘心戴上唯心主義的王冠的話。在十九世紀中葉前後出現於德國的所謂歷史學派，基本上就是根據經驗主義來作他們的教義的。他們不論對於什麼問題，都從歷史上去找論據，都從客觀環境裏去求得說明，在表面上，像是很合理的，但所謂客觀環境，在他們都是同樣的沒有主從的在那裏發生作用，那裏包含有自然條件、人的條件、社會的條件；是不是這一切都發生作用呢？是的；是不是這一切都等同的發生作用呢？不是的；是不是這一切都各自的個別的發生作用呢？不是的。他們不能理解到這一些，不能理解到自然的社會的乃至人的因素，只是在一定的社會經濟結構下作爲社會物質生活條件而作用着，於是經濟的法則，經濟發展的法則，在他們都是想不通的。爲了反對英國經濟學者所提倡的自由競爭，儘管他們根據一些極皮相的經驗史實，把經濟發展分成各種各色的階段，來論證德國應採取保護主義，但他們的每一種階段論，都只說明了一種經驗主義的標本，在本質上，他們是反科學法則的，也不能不是反歷史的。

3.唯心主義觀點　經驗主義者往往只是素樸的客觀主義者。當社會經濟事象的變動，不能由客觀主義得到說明，他們往往就不免要由一極跳到另一極，而成爲主觀主義者。德國舊歷史學派的破產，使得新歷史學派不能不很顯著地在他們的教義中，把人類經濟活動中的情感和心理的因素，誇大起來；然而略加仔細的分析，就知道那是由於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及社會主義，已經在德國發生着決定的影響。也許就因爲這個緣故，資產階級世界是不能靠着這種在經驗主義裏面混雜一些「不徹底的」唯心主義成份來招架的。落後保守的維也納大學的教授們，就振臂一呼，乾脆把他們資產階級的自然主義乃至經驗主義都拋在一邊，而在經濟學上戴起限界主義的主觀主義的帽子。商品的價值由心理變化去說明；利潤、利息、工資也都由時間先後在心理上的差別去說明；把一切剝削說得合理，把一切矛盾衝突，說得非常調和或一團和氣。資本家是過去的工人，工人是將來的資本家。階級不存在了，對立不存在了，鬥爭也不存在了。該是如何偉大的經濟學啊！

然而，這一切矛盾和衝突，究竟還只是在資產階級的經濟學中不存在，在他們學者們的「心理」中不存在，實際上，却是一天嚴重一天地在資產階級支配的社會存在着，以致威脅和擾亂着資產階級的安寧呢！有鑒於此，當主觀主義經濟學離開那當作世界資產階級享受樂園的大消費都市——維也納，向着資產階級世界，特別是向着英美兩國傳播的時候，樂觀的氣氛，就逐漸被冷酷的事實所沖銷了。於是，在基本上，繼承着奧大利主觀主義衣鉢的英美學派，乃不能不或多或少地改變他們的調子，把一些似是而非的自然主義的經驗主義的論點，揉和在他們改良主義的說教中。

被看作「美國里嘉圖」的克拉克，被看作歷史學派和奧大利學派的調和者馬雪爾，就是這樣成爲英美學派的先導者，而作爲他們的變種或亞種的凱恩斯之流，如其說他的學說對其先輩表示了什麼特點，那就是他把代表腐朽資產階級利益的改良企圖，更機詐、更圓滑從而也像更能依據事實地掩飾在自然主義、經濟主義和主觀主義揉合的說教中。然而，就因爲這樣，我們不問立場，不講觀點的經濟學界中人，就以爲那是「科學」，不能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並存，也當吸收其「精華」了。

（二）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觀點：

唯物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從這個觀點出發，一切先驗的東西，是不存在的，作爲古典經濟學的立脚點的自然秩序、自利本性這一類教義，無非

是把特定歷史時期的特種要求，加以超歷史的理解罷了。從唯物主義觀點出發，不論是自然現象，還是社會現象，都在依着一定的物質條件的變化，表現爲各種運動規律，經驗主義者根本不承認這點，他們的經濟學說，就無法不庸俗化爲反規律、反科學的龐雜的史料堆積。從唯物主義觀點出發，一切主觀的心理的因素，都要在客觀上找到它所反映的物質基礎。如像奧大利學派那樣，把一切經濟現象歸結到最單純的心理因素，或者，由最單純的心理因素，推論到最複雜的經濟現象，那樣的學說體系，根本就是與現實沒有關聯的主觀臆斷。

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是把事實做出發點，但事實本身，並不像表現在經驗主義者頭腦中那樣的混雜一團。它們是有本末先後或主從關係的。如其把主要的環節看成次要的，把依屬的關係看作決定性的，或者誇大其作用，或則貶損其作用，那一來，即使是如許多庸俗資產階級經濟學者所做的那樣，用數字，用圖表，說得如何眞確，其實那不是依據事實，而是顚倒事實。比如，生產活動，或社會生產形態決定交換分配以及消費，但庸俗學者却爲了適應腐朽資產階級的要求，把消費放在第一位，以爲人類生產，是爲了消費，爲了滿足消費的慾望。但他們沒有想到，他們所講的「人類生產」的人類，並不是一般人，而是資產階級，他們生產出來的東西，並且也不是供任何人的消費，滿足任何人的慾望，而只是供那些有購買力和購買興趣的人的消費。滿足他們這一部分人的慾望，一句話，他們生產，不是爲了消費，不是爲了滿足自己的消費慾望，而是爲了交換，爲了滿足自己的佔有慾望。像這樣一方面强調資產階級社會如何根據人類消費慾望而生產，如何自然而合理，但另一方面，又把這個社會不根據人類消費慾望而分配生產果實的事實放在一邊，他們的整個說教，顯然是把事實歪曲顚倒了。馬克思主義者是不否認慾望在經濟上的作用，在價值上的作用的。但第一，他們把慾望看成是社會歷史的產物，而不是像資產階級學者所描述那樣，一有人類，就第一次生成固定下來的；第二，慾望只可藉以說明使用價值，並不能拿來解釋價值或交換價值，或拿來測定一物與他物的交換比例。所以，馬克思主義者堅持的從事實出發的唯物主義觀點，與資產階級學者所泛取雜拾事實的自然主義、經驗主義特別是唯心主義完全兩樣；「馬克思只關心一件事：那就是由嚴密的科學研究，證明社會關係的次序的必然性，並對於當作出發點和根據點的種種事實，儘可能，予以完全的確認」。（見郭王譯「資本論」第一卷原著者二版跋第十頁）科學研究「最重要的一點是：必須正確研究諸秩序的順序，研究諸發展階段的次序與聯絡。」（同上）若不顧這一切，只是用一些數字圖表來證示根據了「事實」，那就根本不知道唯物主義者所謂根據事實，並不是任意從客觀存在中「抽調」出一些合乎自己論證需要的事實的事實，而是就客觀存在所顯示出它的主從關係、作用次第以及推移順序的事實。

不懂得這種區別，是極容易把經驗主義者實驗主義者所喧嚷的「拿證據來」，和唯物主義者的從事實出發混同的。

四　怎樣區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資產階級經濟學的不同研究方法

觀點問題，屬於認識論的範疇。但在馬克思主義，怎樣去進行認識的方法，是統一在認識過程中的。

但爲了說明的便利，這裏也不妨就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方法和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方法，作一概括的比較觀察。

（一）我們已經講到資產階級經濟學者所採取的自然主義的、經驗主義的和唯心主義的觀點，其中，自然主義觀點算是比較有進步性的，現在且看這種自然主義觀點，是依着怎樣的方法，去認識經濟現象。

在現代初期的一切啓蒙學者的心目中，自然有天定的意思，有本來如此的意思，有合理的意思；對於他們所希望實現的制度或秩序，就認爲是合理的，認爲是出於人類本性的，是自然的；反之，就以爲是不合理的，不是出於人類本性的，是反自然的。自然和不自然就成了他們的眞理性的標準，他們對於經濟問題的觀察，都是在這種自行設定的認識方法裏兜圈子。在他們看來，歷史的變化，也只有兩種，自然的，和不自然的；資本主義制度以前的一切制度是不自然不合理的，資本主義制度才是自然的合理的，歷史就停止在這裏，永不前進。這就是所謂不易捉摸的、然而却是固定不變的形而上學的方法。自然主義者反對一切訴之於上帝的想法，他們却一切訴之於自然，自然變成了他們的上帝。同樣的，經濟學上的經驗主義者，也有他們的上帝，那就是訴之於直感的經驗。在經驗主義的思想方法中，各種經濟現象，只有在把狹窄範圍內的表面的偶然的聯繫，它的特徵是不講原則，不講必然性，不觸到發展規律，有了這種「自由」，即在思想方法上，有了一種把許多沒有內在聯繫的事象拿來支持其階級成見的「自由」，就恰好造出歷史學派的那些似是而非的經濟階段理論的典型。從表面上看，主觀主義的（奧大利學派的）經濟學的方法，應當是和經驗主義不同的，但如其說對於經濟事象，不按照本來的內在的關係去觀察，却依着自己主觀的願望去牽强附會，那就是唯心的或傾向唯心的，那麼，唯心主義者要使其說得動聽，或使其說明適合於低級常識，也就不能不藉助於經驗主義乃至自然主義了。比如，奧大利學派儘管在方法論上反對古典學派，反對歷史學派，但他們却是把人性生而自利的這一古典派的命題作爲其出發

點；而他們爲了論證那出發點在經濟生活上的決定作用，就不惜乞憐於一些經驗事實，如像物品愈多，則滿足慾望的效力愈小，價值愈低，反之則愈大愈高之類。所有資產階級經濟學者的五花八門的思想方法，其所以具有形而上學的共同點，就因爲它們都是把資本主義當作合理而永生的政治經濟體制，而其異點，則無非是因爲在不同歷史時期來進行那種考察罷了。一句話，把資本主義制度看成天生的永生的要求，基本上就決定了它們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

（二）當資產階級學者企圖永遠維持資本主義制度，因而就決定並限制了他們的思想方法，恰好站在相反立場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就因爲要推翻資本主義制度，他們考察研究經濟事象或經濟問題的方法，就顯然不能把那些看作固定不變的了。也就是說，他們的立場，他們所採取的觀點，也決定了他們的思想方法。

但這樣的論斷，顯然是不會把事物的眞理性表達出來的。馬克思主義者觀察事物所採取的方法，與其說是單由立場來決定，更基本的毋寧是由所觀察研究對象本身的性質所決定。一切社會事象（資本主義當然包括在內）都在不斷地變動發展中，都顯示爲連續不斷的過程；由前一過程推移到後一過程，由前一形態轉移到後一形態，顯出了成熟了就要作着歷史交代的辯證的發展法則，那就是所謂辯證的法則。那法則，是我們從客觀現實中、從事物自身轉變中去發現的，所以又稱爲唯物辯證法則。當我們考察事物時，就我們這裏的論題講，當我們考察經濟事象時，我們能依據所考察對象的這種變動發展的辯證關係，我們的思想方法，就是辯證的。就是辯證的方法。

在馬克思主義看來，正如同以往一切其他的經濟制度一樣，資本主義制度也是整個歷史發展過程上的一個辯證的環節，你儘管憎惡它，但不能叫它不發生發展；你儘管辯護它，也不能叫它不沒落滅亡。用這樣的思想方法去研究，才能很科學地客觀地把資本主義的本質顯現出來。然而這是談何容易啊！

第一、當作一個整體來看的資本主義經濟的辯證發展轉變，是要從它的每個細胞、每條血管的有機變動來說明的。馬克思的「資本論」，恰好就是作着這種說明。也就因爲這個緣故，「資本論」曾被列寧理解爲馬克思的辯證哲學的具體表現。作爲資本主義經濟細胞的商品的價值與使用價值的矛盾，是資本主義社會一切矛盾衝突的最基本的癥結，生產物在一定的程度上或一定發展條件下才變爲商品，變爲貨幣，再轉化爲資本，以及在整個資本積累運動中所顯示的剝削者逐漸轉變到被剝削的史實，構成了生動的辯證發展的圖樣。馬克思如實地把這種辯證關係表現在他的「資本論」中，他所運用的思惟方法，就如他自己所說的「不是辯證的方法是什麼」？（同上第十一頁）可是，

第二、我們又得把論點拉回來，馬克思以及其他馬克思主義者，其所以能堅決地採用這種方法，仍不能不說是他們的階級立場，他們代表無產階級要求的歷史使命，有必要敦促他們採取唯物主義觀點和辯證方法去揭露出資本主義經濟的這種內在矛盾和沒落的必然性，以便在精神上在思想上瓦解資產階級的幻想，而由是加強無產階級鬥爭的勝利的信心。這就是政治經濟學爲什麼是黨性科學的有力說明。

惟其資產階級學者、特別是沒落階段的資產階級學者，自始就企圖把資本主義制度永存下去，他們就有必要採取形而上學的方法；馬克思主義者恰恰相反，他們要論證資本主義制度滅亡的必然性，也就有必要採取恰好與形而上學相反的辯證的方法。這就是辯證的唯物論之所以只能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觀的道理，也是唯物的辯證法之所以只能是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經濟學說的研究方法的道理。

五　我們應當應用到政治經濟學教學上的結論

由上面的說明，我們似乎可以得出以下幾個結論，那都是可供我們學習政治經濟學的參考的。

（一）不管那種經濟學說，或那一個派別的經濟學說，因爲它在階級社會內，是爲特定階級的利害關係服務，它的階級性、黨性，是比任何一種社會科學，都要表現得更加明顯的。也就因爲這個緣故，因爲要堅持階級立場的緣故，研究的觀點和方法，就非特別同它的立場適應不可；否則如像資產階級的，特別是沒落期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說，如其依着唯物的觀點，把資本主義正要作着辯證的歷史交代的關係多多少少地暴露一些出來了，那樣的學者，將怎樣向豢養着他們的資產階級報賬呢？所以不管是資產階級經濟學，還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都很顯然地貫徹着一個立場、一個觀點、一個方法。但由於這一點，只有馬克思主義者可以這樣宣揚，資產階級學者怎麼也不敢把他們的立場明白昭告出來，因爲他們如其這樣做了，他們宣揚資本家階級是爲了人類服務，爲了改善勞動階級的生活，爲了拯救落後地區貧困人民的幌子，不就被揭露了麼？所以，愈是爲資產階級豢養得好好的學者，如像英國的凱恩斯，美國的斐雪之流，他們就愈要把他們的理論矯飾得更像科學，更多方遮掩其階級的尾巴，而使那些如像曾經一度遊視闊步於我們經濟學界的天眞的崇拜者摸不着頭腦。因此，

（二）政治經濟學的教學或學習，如不懂辯證唯物論，如不懂唯物史觀，就不但不能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區別開來，也無法把資產階級中的古典經濟學和庸俗經濟學區別開來。從而也就沒有可能瞭解政

治經濟學，儘管戴着各種各色的名目，其實作爲科學，它只有一個，因爲眞理只有一個，古典經濟學中的科學成份，已經過批判地被吸收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了，而古典經濟學以外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因爲是庸俗的、反科學的，都只算是玄學同詭辯，這是我們今天學習政治經濟學必須明確瞭解的。

（三）但是，不學好馬克思主義哲學，不理解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基本原則，那就不但無法研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其實，他又何能明白瞭解資產階級的，特別是晚近庸俗的經濟學呢？晚近庸俗經濟學的各種玄談和詭辯，只有在馬克思主義的照妖鏡裏，才能好好地顯示出它的原形。如其你墮落在他們那一套觀點和思想方法的當中，那就一輩子也不要想認清它的錯誤。所謂「不見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我在前面提到的我們經濟學界主張「並存論」「批判吸收論」，主張作一個非馬克思主義者但不是反馬克思主義者的高論，乃至在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名目下，偷天換日地輸進一些庸俗成份的講法同作法，那都不外是資產階級的觀點和方法，特別是小資產階級的立場在那裏作祟，那都是毫無結果的。我希望我們的經濟學者和教授們，爲了自己，特別是爲了我們下一代，以更眞摯老實的態度，來對待馬克思主義的眞理。

明確師範大學的教學工作方針

—關於北京師範大學教學改革的建議

丁浩川

一　新的情況新的問題

院系調整後，新的北京師範大學所處的情況與過去有了很大的不同。但主要的不同，還不是校舍分佈、學校機構、辦事制度、人員多少、課程增減等等方面的變異，主要的變異、有決定意義的變異是以下兩點：

一方面，就全國來說（這是學校的外部情況），經過解放三年來土地改革、鎭壓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愛國增產等一系列的政治改革與社會改革的偉大勝利之後，我們國家的情況已經起了根本的變化：準備建設的階段基本上過去，大規模的、有計劃的經濟建設與文化建設的階段就要開始。我們正處在開始大規模建設的前夕。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政府和人民向我們的學校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我們培植大量的、好的中等學校師資，而且要儘量快些。大量的而不是少量的；好的、合乎人民民主國家建設時期所需要的規格的、即不僅有爲人民服務的熱誠而且具備爲人民服務的科學知識與教學本領的人民教師，而不是一些廢品或半廢品；要儘可能快些，而不是懶洋洋地慢慢來。出品要多、要好、要快，這就是今天我們的國家和廣大勞動人民在建設開始時向我們學校提出來的要求。像過去北京師範大學五十年總共畢業生不到一萬人的那樣的工作規模與工作步調，無論如何是不行的了。

就我們學校內部情況看，也起了根本性質的變化。主要是教師思想上總地說來，起了根本性質的變化。三年來祖國在各方面的偉大成就，激發了我們每個人的愛國熱情與進步要求，特別經過了思想改造運動以後，學校內部殘餘的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反動思想基本上被肅清了，資產階級的思想與作風也受到了有力的批判，大家的政治熱情工作熱情與學習熱情都是空前未有的。每個人頭腦裏的新生因素都在抬頭、茁長以至對落後的因素說起來取得了或開始取得了優勢，其總的結果就是工人階級的思想在我們學校裏開始佔取了領導地位。

但是，在這種情況之下，也發生了新的問題：先生有了很大的進步，但學生在政治覺悟與思想水平的提高上，比先生跑得更快，這樣就使得三年來原已存在着的「教師的教學水平趕不上同學的學習要求」這一個矛盾顯得特別突出、特別嚴重起來。

因此集中力量進行教學改革，並進一步提高教學質量，便成爲擺在我們面前的迫不及待的任務。

就我們校內的情況說來，和全國情況一樣：以羣衆運動的方式進行政治改革和思想改造的階段過去了，目前我們正在邁入教學改革與學校建設的新階段。

這是一個轉變關頭。在這樣一個轉變關頭，一方面對於過去三年來——特別是過去一年來在學校裏所執行的以教師思想改造爲主的工作方針有正確的評

價（任何低估教師思想改造的意義的觀點都是錯誤的，因爲那等於說，任何反動思想都可以在我們大學的講壇上散佈，等於說我們的青年可以任人引導或誘騙到任何一個錯誤荒唐的道路上去而不需要一個堅定明確的政治方向），同時要認識：如果不在思想改造勝利的基礎上前進一步，如果滿足於在一般的政治思想改造上所獲得的成績，如果不進一步把工作重心推到教學改革和學術思想的改造（主要是批判資產階級的不負責的自由主義教學態度，與資產階級的治學觀點）上去，那麼，我們就將不能滿足同學的學習要求，而更重要的，則是不能適應國家建設的需要（國家建設所需要的人才是社會主義規格的人才），我們在工作上，就會犯歷史性的錯誤。

把思想改造的勝利成果在教學工作中求得鞏固，把在工人階級思想領導之下進行政治思想改造的勝利深入並且擴大到學術思想領域裏去，這也是所有進步教師自己的要求。

這就是在新的情況下祖國、廣大勞動人民和我們自己，對於我們的工作提出來的新的要求。

在新的情況下，「面向教學」應該做爲我們學校全部工作的方向。這也應該做爲我們踏上新階段時的戰鬥口號。

二　明確我們的教學工作方針

明確教學工作方針，應該是我們進行教學改革中的第一個工作步驟。有了方針，才好安排各個教學單位和各個教學工作人員的工作計劃；有了方針，才能明確我們每一具體工作的目的性；有了方針，才可以把大家動員起來，組織起來。

「學習蘇聯」是我們在今後教育改革與教育建設上的堅定不移的總的方向。關於這一總的方向，還有必要加以簡單的解釋。

首先必須認識：我們今天的學習蘇聯跟舊中國辦教育的人抄襲日本，模倣美國有着本質上的不同。這就首先因爲：蘇聯是社會主義的國家，它不僅是我們中國和所有人民民主國家前進的榜樣，它也是世界各國、全人類的共同努力的方向。其次就因爲蘇聯在消滅了人對人的剝削之後，已經出現了眞正屬於人民大衆的嶄新的文化，而且這一文化無論在哲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或文藝方面，都已經或必將遠遠地超過資本主義時代所達到的水平。這不僅因爲這種文化是在一種新的社會制度下所產生的文化，因而它的發展速度與發展規模爲資本主義世界所不及；而且主要地是因爲這種文化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哲學觀點—即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指導之下成長發展起來的文化。我們國家的前途，既然是走向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而我們在全國解放前又沒有也不可能在自然科學領域裏佔取領導地位更沒有辦正規高等學校的一套經驗，那麼在我們的教育建設中吸取蘇聯先進經驗，也就成爲絕對必要的事。

有人說：「爲什麼總是學別人呢？爲什麼不建立自己的一套呢？」我們說：學習蘇聯正是爲了建設我們自己的一套。從政治上說來，從思想體系上說來，蘇聯的先進經驗是世界無產階級和進步人類的共同財富，是我們自己的東西，而不是什麼別人的東西。今天，在思想體系、學術觀點、教學制度與工作作風上要劃清的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界限，今天在教學改革上要解決的主要的問題，就是通過對蘇聯三十餘年先進經驗和科學成果的學習來用無產階級的東西，批判並代替腐朽的資產階級的東西的問題。因此，我們說：學習蘇聯正是爲了建設我們自己的一套。

根據向蘇聯學習的這樣一個總的方向，根據師範大學的任務，根據我們已經開始做了的一些工作，提出如下的三項具體的教學工作方針：

第一、吸取蘇聯先進科學成果，改革教學內容。

在這一方針下，我們必須在我們的教學內容中肅清那些顯然爲帝國主義和反動資產階級服務的反動觀點和認眞批判那些反歷史反科學的資產階級觀點。這是一個細緻的、需要長期努力的工作，但這却是必須立刻開始的工作。在這一工作中，蘇聯三十餘年來對資產階級學術觀點和教育學說進行鬥爭的經驗，將給我們以莫大的幫助。

在這一方針下，我們必須學習蘇聯的教學大綱和教學方法，體會它們的精神與實質，應用到我們的具體環境中來。

在這一方針下，我們就必須克服我們思想中的保守主義（實質上是舊的頭腦對新鮮事物的抗拒）和對於蘇聯先進經驗的懷疑態度。

在這一方針下，我們就要克服向蘇聯學習中的最大障礙——不懂俄語。因此，我們就要把學習俄語、掌握語文工具做爲我們全部教學改革中的一個不可缺少的步驟。

但是我們要防止那種把向蘇聯學習就簡單化爲學習俄語，或狹隘地認爲向蘇聯學習就止於是翻譯蘇聯教材、應用蘇聯教本的觀點。

吸取蘇聯先進科學成果是與學習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觀點分不開的，是與提高我們政治思想水平的工作分不開的。

第二、面向中學教學，理論結合實際。

面向中學教學（教育系要面向中級師範和幼兒師範的教學，因而必須面向小學和幼兒的教學）這是師範大學本身的任務，這是師範大學的教學異於其它高等學校的教學的主要之點。

實行這一個方針，就是在實際工作中執行「共同綱領」所規定的「中華人

民共和國的教育方法爲理論與實際一致」。這是師範大學過去教學工作中所未能很好解決的問題。

爲了執行這一個方針，我們的系科設置、教學計劃就必須符合於中學教學的需要。我們的教學大綱、教材的編選，講授的重點就必須符合於培植中學各科教師的需要。我們的教學制度、教學方法就必須能够對在校學生起示範作用。

爲了執行這一方針，我們就必須更加重視教學實習，就必須注重教材教法的研究，就必須注意附屬學校的工作，必須與中小學建立聯繫。在這些方面我們就要建立必要的制度。

執行這一個方針，並不是說師範大學的教學要做中學教學的尾巴，而是說師範大學的教學一方面要符合中學教學的需要，同時也要對中學教學加以改進與提高。

在執行這一方針時，我們要克服一些人中間曾經流行的那種脫離實際需要空談學術研究的偏向。對這些人要强調提出：以共產主義的道德品質與先進的科學知識來培植青年人民教師的工作，並不是可以輕率從事的工作。這一工作的本身，就值得我們窮年累月地去研究。要强調指出：我們要培育的，決不是一些知識淺薄的教書匠，而是德才兼備的人民教師。他們的責任，是培育祖國的下一代，是決定祖國前途的一項重大任務。任何輕視人民教師，輕視師範教育的觀點都是有害的。

在執行這一方針時，同時也要防止那種狹隘地認爲師範大學的教學用不到學術研究的觀點。這是不理解新人的培植的重要性的另一種表現。我們既要求我們的下一代是有高度的道德品質與文化科學水平和健康的體魄的全面發展的人，那麼肩負培養責任的教師又怎樣可以是眼光短淺知識貧乏的人呢？

第三、建立集體教學制度，改進教學方法。

我們的教學工作既然是對祖國、對人民、對年青一代嚴肅負責的工作，我們就沒有理由再把這樣重大的責任看成是個人的事情。各門學科的設置既然是爲了達到一個共同的目的，那麼各種學科之間，各個教師之間的協同動作，就是必要的。

爲了有目的、有領導、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教學，我們就必須根據實際情況建設各種集體教學的機構——教學研究室或教學研究組，我們就必須建立這些機構的經常工作——共同備課、互相聽課、聽課後的評議會等。

爲了執行這一個方針，我們就必須正確地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

爲了執行這一個方針，系主任和教務長就要把了解教師教學情況、總結好的經驗、提出改進建議做爲自己的經常的主要工作。這一工作應該有計劃地進行。

即使祇有一位教師担任講授的課程，也必須預先擬出教學大綱，經過系主任批准，然後講授。

在執行這一方針時，我們主要地要改變舊大學裏那種資產階級式的自由主義教學的傳統習慣，同時也要注意：集體教學並不等於機械動作，它並不應該限制教師的積極性、創造性的發揮，相反地，我們要求的是在共同一致的原則下每個教師都儘可能地發揮他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以取得更大的教學效果。教學工作之不應該成爲機械的動作，還有一個最根本的原因，那就是：教學工作的對象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死的機械。

三　組織起來，加强學習

以上所提的三項方針，包括有教學改革的三個方面。根據這樣三條方針，各教學單位和教務行政單位還必須就這三方面安排具體的工作計劃。

國家建設要求我們提高工作的水平。這一方面要求我們提高我們的理論水平與業務水平，同時這也要求我們提高工作方法的水平——要求我們有目的、有組織、有計劃地去進行工作。

所以，在迎接教學改革與教學建設的新任務時，組織起來加强學習——學習理論、學習業務、學習工作方法就有了決定的意義。

友愛團結，使我們成爲一個從事教育事業的集體。組織起來發揮每個成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將使我們能够克服前進道路上的障礙。

加强團結、努力學習！將成爲我們貫徹教學工作方針的保證。

蘇聯外貝加爾發現許多古代遺物

蘇聯科學院物質文化史研究所考察隊曾在外貝加爾地區從事考古學研究工作，科學家們在那裏發掘了古代的居民區與住所，並且發現了許多石器時代和其他時代的遺物。特別有趣的，是在赤塔附近發現的一個石器時代的大作坊。古代居民曾在那裏製造各種石頭器皿與工具。在西爾卡河流域也發現了外貝加爾地區古代居民的許多遺跡。

出土物中特別有價值的，是在一個墓地發現的一個巨大的中國土瓶。這種瓶是青銅器時期的中國人使用的。在斯列田斯克附近發現的一柄劍也是同一時期的遺物。在發掘時發現的這些，以及其他物品表明了遠古時代中國與貝加爾草原遊牧部族之間的文化關係。

讀「反對自由主義」

王南

建黨問題，是建立指揮政治大軍作戰的司令部的問題，是建立中國工人階級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鬥爭、進行新中國建設的司令部的問題，是對革命成功、建設成功具有決定作用的問題。能夠指揮全中國人民的司令部，能夠被全中國人民擁護的司令部，就是光榮、偉大、正確的中國共產黨。中國建立工人階級政黨的巨匠就是毛主席，沒有毛主席領導的、按照毛主席建黨學說建立與鍛鍊成熟的中國共產黨，就沒有中國革命的勝利。這篇「反對自由主義」，就是毛主席教導我們建黨的光輝的文獻之一。

這一文獻的精神實質是什麼呢？我以爲是：反對在組織問題、組織生活上的機會主義，堅持組織問題、組織生活上的列寧主義。換句話講，就是在黨內劃清工人階級思想與小資產階級思想的界綫；就是要把中國共產黨鍛鍊成爲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全黨一致的、有鐵的紀律的、採取批評與自我批評方法的、聯繫廣大人民羣衆的、新型的政黨，布爾什維克化的政黨；而反對把中國共產黨變成「團結渙散，關係鬆懈，工作消極，意見分歧」，「失掉嚴密的組織和紀律，政策不能貫澈到底，黨的組織和黨所領導的羣衆發生隔離」的政黨，遭受小資產階級思想意識腐蝕的政黨。

毛主席號召我們反對自由主義，是根據中國社會與中國共產黨內部一些具體情況發出的。毛主席曾經指出，「中國是一個小資產階級極其廣大的國家，我們黨是處在這個廣大階層的包圍中，我們又有很大數量的黨員是出身於這個階層的，他們都不免或長或短地拖着一條小資產階級尾巴進黨來」（「反對黨八股」）。因此，克服小資產階級的影響，改造黨內來自小資產階級的同志，就是中國共產黨建黨工作中的重大問題。

毛主席在本文中，明確地指出：「自由主義是機會主義的一種表現，是和馬克思主義根本衝突的。」這種自由主義，也就是一種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克服自由主義的過程，就是以工人階級思想來改造小資產階級思想的過程，也就是中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化的過程。

「反對自由主義」這一文件，內容大體上可以分爲下面的五個部分：

（一）問題的提法；

（二）自由主義的主要表現；

（三）自由主義的危害性；

（四）自由主義的來源；

（五）號召同志們作一個好黨員，反對自由主義——對自由主義的態度。

一開首我們就看到，反對自由主義就是主張積極的思想鬥爭，反對取消思想鬥爭。

這裏所說的思想鬥爭是用什麼思想去和什麼思想相鬥爭呢？思想鬥爭在黨的建設上又佔什麼地位、起什麼作用呢？這裏所說的思想鬥爭就是用工人階級的科學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去和黨內的小資產階級思想——自由主義作鬥爭。毛主席這一思想，在劉少奇同志的著作中，得到極爲深刻的闡釋，他指出：「在我們黨內，最本質的矛盾，就是無產階級思想與非無產階級思想的矛盾，其中最主要的是無產階級思想與農民、小資產階級思想的矛盾。只有這個矛盾的逐漸解決，只有在黨內加强馬克思列寧主義——無產階級科學思想的教育與鍛鍊，不斷克服小資產階級以及其他各階級反映在黨內的思想，我們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才能進步，才能發展。……因此，我們黨的建設中最主要的問題，首先就是思想建設問題，就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無產階級的科學思想去教育與改造我們的黨員、特別是小資產階級革命分子的問題，就是和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進行鬥爭並加以克服的問題。」（「論黨」第二章第一節）劉少奇同志告訴我們，毛主席的建黨路綫，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進行建設，同時也在組織上進行建設，而不是單純地着重在從組織上建黨。毛主席經常指示我們：要把思想教育和思想領導放在黨的領導的第一位。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有許多同志還不大清楚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區別。有許多黨員，在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並沒有完全入黨，甚至完全沒有入黨。這種思想上完全沒有入黨的人，頭腦裏還裝着許多剝削階級的髒東西，根本不知道什麼是無產階級思想，什麼是共產主義，什麼是黨。」接着，毛主席講到這種人，如不改造會落到「離開黨完事」，此外，「還有一種比這更壞的人」，那便是混進黨內來的敵探和奸細，「因此——毛主席說——我們的黨，我們的隊伍，雖然其中極大多數都是純潔的，但是爲要領導革命運動更好地發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須把內部從思想上組織上認眞地整頓一番。而爲要從組織上整頓，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頓，需要展開一個無產階級對非無產階級的思想鬥爭。」

由此可見，思想鬥爭在建黨整黨中有多麼重要的地位與重大的作用。

所以，「反對自由主義」一文開首所提出的「主張積極的思想鬥爭」反對「取消思想鬥爭」是具有嚴重意義的。如果放任自由主義，取消思想鬥爭，就會產生嚴重的惡果。

劉少奇同志在「論黨」中曾經告誡我們，他說：

「黨的建設和黨的組織上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就是黨內某些同志的自由主義路線。這些同志企圖使我們黨變成小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黨，反對與廢棄黨在思想上、組織上的嚴肅性，破壞黨內的民主集中制與黨內鐵的紀律，集體地無分別地接收黨員，聽任各種錯誤思想在黨內發展而不加以糾正，對黨的敵人及暗害分子喪失警戒，提倡黨內的風頭主義，擁護黨內的散漫性和小團體傾向及自發性等。很明白，這將影響我們黨不能成功任何事業，並將瓦解我們的黨。」

用「自由主義路線」建黨，就會把黨引上覆滅的險途。

在中國共產黨、毛主席的領導下，全國得到解放，今後革命任務、建設任務更加艱巨，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革命隊伍一方面是更加壯大了，另一方面，在革命幹部內部的非無產階級思想，也就更加多樣了，那麼，結論應該是思想鬥爭必須加強，而不是鬆懈。毛主席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七日發出「反對自由主義」的號召，我們要繼續以行動來積極響應，任何懈怠與姑息都是錯誤的。

黨內自由主義的表現，毛主席舉出了主要的十一種。這十一種表現，是自由主義的「通病」，把它當作鏡子，來照一照自己，就可以發覺自己的「同病」。求得治療，恢復健康。這十一種表現包括了共產黨員與各個方面的關係。從第一種到第三種，大體上是自由主義表現在對同志與同志、組織與組織的關係上，其毛病在於抹煞了原則，取消了批評。

從第四種到第六種，大體上是自由主義表現在黨員個人對黨的組織的關係上，共毛病在於心目中有個人而無組織，不關心組織，不服從組織的紀律。

從第七種到第八種，大體上是自由主義表現在黨員對羣衆的關係上，共毛病或者是自己不關心羣衆，或者是聽任別人損害羣衆的利益。

從第九種到第十種，大體上是自由主義表現在工作態度上。

以上是對組織、對同志、對羣衆、對工作；最後一種，是連對自己都採取自由主義態度，知過不改，取消了自我批評這一思想鬥爭。

由此可見，自由主義就是沒有、或不完全有組織觀點、羣衆觀點，沒有紀律性、積極性，不正確地運用、甚至完全取消了批評與自我批評。

毛主席告訴我們，自由主義的表現，除這十一種以外，「還可以舉出一些」。因此，我們應該抓住自由主義的本質（不僅是抓住它的表現），聯繫自己對各個方面的關係、態度，來進行檢查。不要把這十一種表現當作「帽子」，往自己頭上來套，覺得「帽子」不完全恰恰當當地適合，便以爲自己沒有自由主義的毛病，或是雖有點毛病也不太重，這就錯了。

自由主義的來源，是小資產階級的自私自利性。這種自私自利性是屬於通常所說的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範圍內的髒東西。中國共產黨黨員標準的八項條件之一是：「一切黨員必須把人民羣衆的公共利益，即黨的利益，擺在自己私人的利益之上，黨員的私人利益必須服從人民的即黨的公共利益。」毛主席指出，自由主義却是「以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斯大林在所著「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一書中告訴我們：「無政府主義底基石是個人。馬克思主義底基石是羣衆。」因此，在你一切行動措施中，把羣衆與你個人，誰擺到「第一位」的問題，也就是馬克思主義立場與非馬克思主義立場的問題。

小資產階級的自私自利性，產生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自由主義。思想上的自由主義，其思想方法，不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而是理論與實踐、知與行互相脫節的，是以教條主義的態度來看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治上、組織上的自由主義，是黨內「機會主義的一種表現，是和馬克思主義根本衝突的」，「客觀上起着援助敵人的作用」。這三個方面又是有聯貫性的，不是各自孤立的。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關於增强黨性的決定」（見「整風文獻」）中，曾經指出「缺乏黨性的傾向」在政治上、組織上、思想意識上的具體表現。這個決定應該聯繫「反對自由主義」一起來學習。毛主席以後在「整頓學風黨風文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偉大著作中，對這方面有了更爲詳盡的闡發和教導。此外，一九四八年六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宣傳部在「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中，曾經指出：「堅持黨的鐵的紀律，鞏固黨與羣衆的聯繫，這是毛澤東同志的一貫的思想原則與組織原則。一九二九年古田會議的決議案與一九三七年『反對自由主義』的提綱，便是毛澤東同志爲這種原則而寫作的。」這個指示可以幫助我們來掌握「反對自由主義」的精神實質。

最後，必須指出，克服自由主義思想，不能停留在僅僅研讀文件的範圍之內。每個人的思想是其社會存在的反映，是其行動的反映，克服自由主義思想，就必須訴諸行動，訴諸實踐。反對自由主義，不論是反對他人的自由主義，或是反對自己的自由主義，都是一個持久的、艱苦的戰鬥。

克服了自由主義，鍛鍊自己成爲毛主席在「反對自由主義」末尾所說的那樣一個具有高度水平的共產黨員，實在是人生無上的光榮！

（附註：凡未註明出處的引文均摘自「反對自由主義」。）

讀「蘇聯利益和人類利益的一致」

梁純夫

毛主席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八日所寫的論文「蘇聯利益和人類利益的一致」，是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觀點和唯物辯證法的最根本法則——矛盾法則來分析國際問題的典範著作。

一九三九年，是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國際局勢最複雜和變化最急激的一年。當時有幾件事情會在我國內引起思想上的混亂，帝國主義分子和國民黨反動派乘機造謠，企圖破壞中蘇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掀起一個反蘇運動，甚至個別「進步人士」也弄得一時糊塗起來了。

這些事情之一就是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蘇德互不侵犯協定的簽訂。蘇聯一向倡議集體安全，堅決反對法西斯主義和希特勒的侵略政策，這一突然的行動在當時的確驚動世界，出乎英、法、美等國反動派的意料之外，一般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修養的人，也感覺到難以理解。並且九月一日德軍便大舉進攻波蘭，三日英、法參戰，第二次世界大戰隨之開始。有些人竟以爲蘇聯應負大戰爆發的間接責任，甚至推斷它即將參加德國方面對英法作戰。但是毛主席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發表的「關於國際新形勢對新華日報記者的談話」中已經天才地指出：

「蘇德互不侵犯協定是蘇聯社會主義力量增長和蘇聯政府堅持和平政策的結果。這個協定打破了張伯倫、達拉第等國際反動資產階級挑動蘇德戰爭的陰謀，打破了德意日反共集團對於蘇聯的包圍……在東方，則打擊了日本，援助了中國，增强了中國抗戰派的地位，打擊了中國的投降派。在這一切上面，就安置了援助全世界人民爭取自由解放的基礎。這就是蘇德互不侵犯協定的全部政治意義。」（「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五四五頁）

把蘇德互不侵犯協定與「蘇聯政府堅持和平政策」、與「援助全世界人民爭取自由解放」聯繫起來，確乎不是簡單的想法。但是毛主席在「蘇聯利益和人類利益的一致」一文中却簡單地便把這個道理說明白了。

只有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觀點出發，才能看出蘇聯的這一突然行動，是「蘇聯的利益和人類大多數的利益互相一致的表現」。因爲，如毛主席所指出的：「英美法的計劃是：推動德國進攻蘇聯，它們自己『坐山觀虎鬥』，讓蘇、德打得精疲力竭之後，它們出來收拾時局。」這個陰謀如果得以實現，英美法的反動資產階級便將重新强霸世界，人類的大多數又將回到十九世紀末期的苦難日子，世界革命勝利的日期將被拖延。這不單嚴重地損害蘇聯人民的利益，也嚴重地損害人類大多數的利益。但是，如毛主席所指出：「這種陰謀，被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擊破了。」

人類大多數的利益是什麼呢？就是爭取和平，就是爭取自由解放。

爭取和平的努力是多種多樣的，而其中一個重要的關鍵是，「堅決地不參加非正義的、掠奪的、帝國主義的戰爭」。毛主席在這裏列舉一連串的事實，說明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前，「多年以來，蘇聯對於世界和平的事業，盡了很大的努力」。例如，加入國際聯盟；同法國、同捷克訂立互助協定；在西班牙問題上反對英美法的所謂「不干涉」政策，並積極援助西班牙政府軍反抗德意；當日本侵略中國時同中國訂立互不侵犯條約，並積極援助中國的抗日；反對英法的慕尼黑政策；在大戰爆發前還同英法進行了四個多月的談判，企圖訂立一個英法蘇互助條約，制止大戰的爆發；等等。但是，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無如這一切，都被英法政府的帝國主義政策，縱容戰爭、挑撥戰爭、擴大戰爭的政策所障礙，世界和平事業就遭受了最後的挫折，帝國主義的世界大戰終於爆發了。」只有在這個時候，即「在張伯倫、達拉第決心拒絕蘇聯，決心進行帝國主義戰爭的時候，蘇德才訂立了互不侵犯條約」。毛主席在這裏指出：「蘇聯這樣地維持世界和平到最後的一刻，這就是蘇聯的利益和人類大多數的利益互相一致的表現。」

但是，不參加帝國主義的非正義戰爭，並不等於坐視帝國主義國家對別的民族的奴役和侵略。帝國主義即是戰爭。而爭取自由解放與爭取和平一直就是分不開的。因此毛主席在這裏指出，作爲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它的和平政策的另一面是，「積極地援助正義的、非掠奪的、謀解放的戰爭」。毛主席列舉了許多歷史事實，如援助中國人民的北伐戰爭和抗日戰爭、援助西班牙人民的反抗德意的戰爭、援助蒙古人民的抗日戰爭，等等，來證明蘇聯建國二十二年以來的和平政策的這一個方面，並斷定「今後的歷史還將繼續證明」這一點。

爲什麼呢？說來很簡單，因爲蘇聯的利益和人類大多數的利益是永遠互相一致的。

蘇德互不侵犯條約訂立之後，張伯倫、達拉第等國際反動資產階級的反蘇陰謀被擊破，蘇聯得以從容加强它西方和東方的邊防，改善了它的國際地位，這個形勢「大大地打擊了日本，援助了中國，加强了中國抗戰派的地位，打擊了投降派」，這是中國人民所熟悉的歷史事實。

不過在另外一個問題上面，在蘇聯大軍進入波蘭東部（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七日）這個問題上面，當時有許多人便不是那麼容易想得通的。

毛主席在這裏告訴大家：「蘇聯大軍的進入波蘭東部，是爲了收復自己國土，解放弱小民族，同時也是制止德國侵略勢力向東擴展，擊破張伯倫陰謀的一個具體步驟。……這就是蘇聯的利益和世界人類大多數的利益互相一致，和波蘭反動統治下被壓迫人民的利益互相一致的具體表現。」

這個結論，在十多年的歷史事實的印證之下，我們今天是容易理解的。但在當時，毛主席却費了一番極其深刻的分析工夫，才得到這個使人信服的結論。這一段文章，是我所曾看到過的、運用唯物辯證法的最根本法則——矛盾法則來分析國際問題的最深入的、最全面的、最完美的範例，值得我們好好學習。

關於蘇聯進兵波蘭問題，毛主席首先把它分做兩個方面來加以研究：一方面是波蘭問題的本質，一方面是蘇聯對波蘭的政策。關於波蘭問題的本質，毛主席又從下列幾個方面來加以全面的、深入的分析：

（一）在德國方面，它是爲了掠奪波蘭人民而進行戰爭的……是不能同情的，是應當反對的。

（二）在英法方面，是把波蘭作爲英法財政資本掠奪的對象之一……英法的所謂援助波蘭不過是同德國爭奪對波蘭的統治權，同樣是不能同情的，是應當反對的。

（三）在波蘭政府方面，它是一個法西斯政府，是波蘭地主資產階級的反動政府，它殘酷地剝削農工，壓迫波蘭的民主主義者；它又是一個大波蘭主義的政府……施行殘酷的民族壓迫……如果我們同情這樣的政府，那是不對的。

（四）在波蘭人民方面，他們是犧牲者，他們應該起來反對德國法西斯的壓迫，反對自己的反動的地主資產階級，建立獨立的自由的波蘭民主國家。毫無疑義，我們的同情應該寄在波蘭人民方面。

波蘭問題的本質被全面揭露出來之後，毛主席便進而研究蘇聯對波蘭所採取的政策。對於這個問題，毛主席也是從下列幾方面來加以分析的：

（一）讓整個波蘭處在德國帝國主義的統治下面呢，還是讓東部波蘭少數民族得到解放呢？在這個問題上，蘇聯選擇了第二條路。

（二）張伯倫企圖繼續他的反對蘇聯的老政策……用威迫利誘種種方法，推動德國放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使它倒轉槍口，進攻蘇聯。

因此蘇聯進兵波蘭東部，不單是爲了「解放弱小民族」，同時也是「擊破張伯倫陰謀的一個具體步驟」。

在這一具體的、深入的、全面的分析中，毛主席再度令人信服地證明「蘇聯利益和世界人類大多數的利益互相一致」，同時也充分證明蘇聯爭取和平與援助民族解放的政策是始終如一的。

此外，毛主席在這篇論文中還拿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時期蘇聯與日本的外交問題來判斷「蘇聯的利益和中國民族解放的利益決不會互相衝突，而將是永久互相一致」。關於這一點，十多年來的歷史事實，特別是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訂立後，中蘇兩國人民友誼的鞏固與發展，已經提供了確切不移的、無可置辯的明證。最近斯大林在聯共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中明白指出：「我們黨的利益和愛好和平的各國人民的利益不但沒有矛盾，而且是融合在一起的。至於蘇聯，它的利益是決不能跟世界和平的事業分開的。」我們把斯大林的這段話與毛主席的這篇論文對照着來讀，把今天世界的前景與過去的歷史事實聯結起來想一想，就更鼓舞我們爲保衛世界和平、爲祖國的偉大建設而奮勇前進！

蘇聯科學院組織考察隊
調查列寧運河地區生產力

蘇聯科學院組織了一個包括各方面著名科學家的龐大的伏爾加河—頓河考察隊。考察隊將着手擬訂一個廣泛的列寧伏爾加河—頓河運河附近地區生產力調查計劃。新水道與灌溉渠網的開鑿對於一片廣大地區的自然條件及其經濟一定將發生極大的影響。新成立的考察隊的各小組，將研究伏爾加河—頓河地區的土壤、天然資源和各種植物。此項研究工作將有助於開發這個地區的天然資源，以適應國民經濟的需要。

「矛盾論」與中國革命實踐問題

馬特

一

毛澤東同志的「矛盾論」，寫於一九三七年八月間。那時候，正是中國人民經歷了兩次國內革命戰爭，在從一個革命階段（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轉到另一個革命階段（抗日戰爭）的開始時期。爲了總結兩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經驗，特別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經驗，以教育幹部，提高全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水平，用以迎接新的革命高潮——抗日戰爭，毛澤東同志曾以極大的努力從事於理論的工作。「矛盾論」就是這一時期繼「實踐論」之後的又一篇傑出的哲學著作。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失敗，主要地是由於當時的黨對於中國革命的發展規律沒有正確的認識，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的結合沒有完整的統一的了解，這樣，就使得黨的領導機關中佔統治地位的成份，在這一階段的末期，在這一階段的緊要關頭，沒有能够領導全黨鞏固革命的勝利，受了資產階級的欺騙。而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挫折，則主要地是由於教條主義者「不了解諸種革命情況的區別，因而也不了解應當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種自以爲不可改變的公式到處硬套。」（「矛盾論」）——鑒戒於這兩次革命的失敗和挫折，毛澤東同志深切地感到理論工作的嚴重意義。「矛盾論」主要地就是「爲了克服存在於黨內的嚴重的教條主義思想而寫的。」（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所附題解）

毛澤東同志深刻地體會了列寧關於「發展就是對立的鬥爭」，「統一物之分而爲二以及我們對其各矛盾部分的認識，是辯證法的本質」的指示，認爲認識中國革命發展的特殊規律的關鍵，就在於對中國社會各個矛盾構成部分作出科學的分析。

毛澤東同志寫道：

> 「我們從事中國革命的人，不但要在各個矛盾的總體上，即矛盾的相互聯結上，了解其特殊性，而且只有從矛盾的各個方面着手研究，才有可能了解其總體。所謂了解矛盾的各個方面，就是了解它們每一方面各佔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種具體形式和對方發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關係，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後，又各用何種具體的方法和對方作鬥爭。」（「矛盾論」）

毛澤東同志特別突出的研究了矛盾的特殊性及其各方面的相互關係和轉變過程，這是與作爲東方各種矛盾的焦點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相聯繫的。毛澤東同志正是在這些矛盾的基地上，總結了中國革命的極端豐富的經驗，並以鮮明的形象，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矛盾的學說。

二

毛澤東同志根據列寧關於帝國主義的理論，關於帝國主義就是「極少數『先進』國用殖民政策壓迫、用財政資本扼制地球上極大多數居民的全世界體系」（「帝國主義論」）的理論，根據列寧斯大林關於帝國主義「一方面使各個民族經濟，各個民族領土，變爲所謂世界經濟這整個鍊條的環節，另一方面又把地球上的居民分成兩個營壘：一個是剝削並壓迫着廣大殖民地和依賴國的極少數資本主義『先進』國，另一個是迫得要進行鬥爭以求擺脫帝國主義壓迫的極大多數殖民地和依賴國」（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的理論，——毛澤東同志正是根據了這個理論，天才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內部矛盾和外部矛盾、內在鬥爭和外在鬥爭的辯證關係的學說。

毛澤東同志追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諸大師之後，强調地指出：「唯物辯證法的宇宙觀主張從事物的內部、從一事物對他事物的關係去研究事物的發展，即把事物的發展看做是事物內部的必然的自己的運動，而每一事物的運動都和它的周圍其他事物互相聯繫着和互相影響着。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內部，在於事物內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內部都有這種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運動和發展。」（「矛盾論」）這是完全正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發展的根本觀點。但由於帝國主義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屬國的侵略所造成的「全世界體系」，把無論怎樣落後的國家都放置在帝國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之內，成爲帝國主義的附庸，這種情況，改變了各個國家的閉關自守的經濟生活，而與其他各國發生密切的聯繫。這樣，就基本上規定了內部矛盾和外部矛盾、內在鬥爭和外在鬥爭的辯證關係的全新意義。毛澤東同志在對於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在發展過程中互相轉變、互易地位的複雜形態所作的科學分析中，指出外部矛盾如何滲透入內部矛盾，使內部矛盾發生變化，從而改變內部矛盾的地位和關係，外部矛盾又如何經過內部

矛盾而互相扭結，互相勾搭。

毛澤東同志寫道：「半殖民地的國家如中國，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關係呈現着複雜的情況。當着帝國主義向這種國家舉行侵略戰爭的時候，這種國家的內部各階級，除開一些叛國分子以外，能夠暫時地團結起來舉行民族戰爭去反對帝國主義。這時，帝國主義和這種國家之間的矛盾成爲主要的矛盾，而這種國家內部各階級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衆之間這個主要矛盾在內），便都暫時地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而「當着帝國主義不是用戰爭壓迫而是用政治、經濟、文化等比較溫和的形式進行壓迫的時候，半殖民地國家的統治階級就會向帝國主義投降，二者結成同盟，共同壓迫人民大衆。這種時候，人民大衆往往採取國內戰爭的形式，去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階級的同盟，而帝國主義則往往採取間接的方式去援助半殖民地國家的反動派壓迫人民，而不採取直接行動，顯出了內部矛盾的特別尖銳性」。但「當着國內革命戰爭發展到從根本上威脅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國內反動派的存在的時候，帝國主義就往往採取上述方法以外的方法，企圖維持其統治；或者分化革命陣綫的內部，或者直接出兵援助國內反動派。這時，外國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派完全公開地站在一個極端，人民大衆則站在另一極端，成爲一個主要矛盾，而規定或影響其他矛盾的發展狀態」（「矛盾論」）。

這就是說，照毛澤東同志看來，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就整個社會發展規律說，內部矛盾和外部矛盾、內在鬥爭和外在鬥爭的關係已經有着全新的意義。決定着一個國家的命運，固然是由這個國家的內部規律性在起決定性的作用，但這個國家與它所處的周圍世界的聯繫也起着很大的影響的作用。這種作用有時甚至巨大到如此地步，以至影響到這個國家的內部規律性，而促進着或阻滯着這個國家的內部規律性的發展。在這種時候，內部和外部，由於互相滲透、互相扭結，乃至成爲完整的統一，而互相受着同一個法則所支配。

斯大林在「論列寧主義基礎」的著作中，在分析了帝國主義在世界範圍內所造成的全世界體系，對於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全局所起的作用以後，指出：

「從前，通常都是說某一個已經發展的國家中的無產階級革命，作爲單個的孤獨自在的現象，而以單個的民族的資本戰綫爲敵方。現在，這種觀點已經不夠了。現在必須說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因爲各單個的民族的資本戰綫已經變成所謂世界帝國主義戰綫這整個鍊條的環節，必須拿世界各國革命運動總戰綫來對抗這世界帝國主義戰綫。」

正是根據了這個觀點，毛澤東同志從來就不把中國革命當作單個的孤獨自在的現象，而是當作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從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全局，從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鬥爭的全局去看待。毛澤東同志很高地估計了十月革命對全世界的影響，和這個革命對中國所發生的特別深刻的影響。毛澤東同志指出：「第一次勝利的社會主義十月革命，改變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方向，劃分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時代。」（「新民主主義論」）爲什麼？這就是因爲十月革命給世界人民指出了擺脫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奴役的一條正確的道路。在世界人民反抗帝國主義的革命鬥爭中，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在世界帝國主義統治的鍊條中首先打出了一個缺口，「它從而在社會主義的西方和被奴役的東方之間架起了一道橋樑，從西方的無產者起，經過俄國革命，到東方的被壓迫民族止，建築了一條新的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綫」（斯大林：「十月革命與民族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在這樣的條件之下，如果人們還把反對外國帝國主義的鬥爭和反對國內封建買辦階級的鬥爭孤立起來、隔離開來看待，如果人們還把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跟資本主義國家內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孤立起來、隔離開來看待，顯然是非常荒謬的。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把各個國家的內部矛盾和外部矛盾、內在鬥爭和外在鬥爭，經過十月革命，而聯結起來。毛澤東同志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在他革命實踐的指導和活動中，進一步發展和豐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然而內部矛盾和外部矛盾、內在鬥爭和外在鬥爭，仍然有着它們一定的界限。如果由於這兩者的聯繫，互相滲透，並在一定的條件下而互相扭結，互相勾搭，就從而混同了這兩者的界限，無疑是很不妥當的。

毛澤東同志寫道：

「唯物辯證法認爲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各國人民之間的互相影響是時常存在的。在資本主義時代，特別是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各國在政治上、經濟上和文化上的互相影響和互相激動，是極其巨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不只是開創了俄國歷史的新紀元，而且開創了世界歷史的新紀元，影響到世界各國內部的變化，同樣地而且還特別深刻地影響到中國內部的變化，但是這種變化是通過了各國內部和中國內部自己的規律性而起的。」（「矛盾論」）

這就是說，中國人民近三十年來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鬥爭，蘇聯人民和世界其他國家的人民的援助起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對中國發生了特別深刻的影響；但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對中國革命

的深刻影響，以及蘇聯人民和世界其他國家的人民對中國革命的援助的巨大作用，是通過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發展規律而起的，是通過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向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作前仆後繼、不屈不撓的鬥爭而起的。沒有這一切，蘇聯人民和世界其他國家的人民就無從對我們作什麼援助，馬克思列寧主義也無從對我們起什麼作用。

這也就是說，一方面，中國革命由於受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條件的限制，因此，它就不可能一步登天，飛躍到社會主義去，而只能經由民主主義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去；另方面，中國革命又由於受了十月革命的深刻的影響，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完成的，因此，它就不再是舊式的民主主義革命，而是新式的民主主義革命，而屬於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這就是毛澤東同志在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根據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極端豐富的作戰經驗，對於內部矛盾和外部矛盾、內在鬥爭和外在鬥爭的辯證關係所作的科學分析。

三

毛澤東同志依據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條件，依據這個社會的矛盾極端複雜的形態，對於如何運用這些矛盾的關係去戰勝敵人，特別是對於如何運用又聯合又鬥爭的統一戰綫的策略去戰勝敵人，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同志又進一步發展了列寧關於矛盾的同一性和鬥爭性之辯證的統一的學說。

毛澤東同志根據列寧斯大林把帝國主義國家，即壓迫別國人民的國家裏的革命，同殖民地和附屬國，即受別國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裏的革命加以嚴格區別的基本出發點，根據帝國主義國家裏的資產階級是別國人民的壓迫者，在革命的一切階段上都是反革命的，而殖民地和附屬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在共發展的某一階段上却可以支持本國反對外國帝國主義壓迫的革命運動這個基本出發點，天才地分析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重性，以及在民主主義革命的階段對於民族資產階級的又聯合又鬥爭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事實證明：對於民族資產階級的正確認識和對於它的正確態度乃是中國共產黨整個統一戰綫策略運用中的重要環節。

大家知道，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是敵對的階級，在資本主義國家中，這兩個敵對的階級存在着不可調和的矛盾；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由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同樣遭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這就使得這兩個敵對的階級在一定時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聯合起來。毛澤東同志正是根據了這個條件，在他的「矛盾論」中做了如下的天才概括：一切過程中矛盾着的各方面，本來是互相排斥、互相鬥爭、互相對立的。但在一定的條件之下，却又互相聯結、互相滲透、互相依賴。毛澤東同志寫道：「一切矛盾着的方面都因一定條件具備着不同一性，所以稱爲矛盾。然而又具備着同一性，所以互相聯結。」（「矛盾論」）

然而，這僅僅是事情的還不十分重要的一面，即矛盾的同一性的一面；事情的十分重要的一面是：矛盾的鬥爭性。這一面，如同列寧所指出，是絕對的、永久的、無條件的、自始至終貫徹全過程的；而矛盾的同一性，却是有條件的、一時的、暫存的、相對的。

毛澤東同志在「矛盾論」中充分地發揮了列寧這個天才的規定。按照毛澤東同志的意見，矛盾的同一性之所以是相對的，矛盾的鬥爭性之所以是絕對的，是由於如下的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矛盾的同一性只在事物發展的特定階段上出現，而矛盾的鬥爭性却存在於事物發展的全過程。另一個原因是：矛盾的同一性是通過矛盾的鬥爭性所取得的，沒有矛盾的鬥爭性就沒有矛盾的同一性。

在整個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關係呈現着複雜的形態。這是由於這兩黨的階級基礎在各個不同的發展階段上對各方面的不同的聯繫（矛盾和同一）所造成的結果。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中，當國民黨基本上還是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利益的時候，由於國民黨跟帝國主義及共工具北洋軍閥有矛盾，並實行了聯蘇、聯共、援助工農三大政策，這樣就造成了國民黨有和共產黨建立統一戰綫的可能條件，並從而在實際上接受了共產黨的倡導，建立了國共兩黨的第一次的統一戰綫；但又由於國民黨跟人民大衆的利益有矛盾，在統一戰綫中時時刻刻企圖並實行排斥共產黨的領導，又從而造成國民黨和共產黨在聯合中的不斷的鬥爭。一九二七年以後，在十年土地革命戰爭期間，國民黨從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轉到代表帝國主義和封建買辦階級的利益，從而國民黨和人民大衆的利益走到極端對立的地位，這樣就使得國共兩黨的統一戰綫遭到破裂並發生激烈的對抗和長期的戰爭。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以後，由於作爲美英帝國主義工具的國民黨蔣介石集團與日本帝國主義的變中國爲殖民地的侵略方針兩者間的矛盾的加劇，這又使得國民黨有再度和共產黨建立統一戰綫的可能，從而形成國共兩黨的第二次的統一戰綫。但由於國民黨蔣介石集團與人民大衆之間的矛盾始終沒有消失，相反地，隨着抗日戰爭的發展，這種矛盾日益加劇起來，從而形成兩黨又聯合又鬥爭的犬牙交錯式的奇異關係。一九四五年，由於蘇聯紅軍的參戰，日本帝國主義在戰爭中倒了下去，從而在基本上解決了美英帝國主義與日本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同時也在基本上解決了作爲美英帝國主義工具的國民黨蔣介石集團與日本帝國主義

之間的矛盾，而美英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帝國主義與中國人民大衆之間的矛盾則加劇起來，同樣國民黨蔣介石集團與人民大衆之間的矛盾也加劇起來，這樣就爆發了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國民黨和共產黨的統一戰綫再一次的破裂，結果，以我們勝利、國民黨反動派失敗的結局最後地解決了這兩黨的長期而複雜的矛盾和對立的關係。由此可見，無論在兩黨的統一戰綫的建立或兩黨的統一戰綫的破裂各個不同時期中，矛盾和鬥爭自始至終存在着，沒有矛盾、沒有鬥爭，就不會有國共兩黨的互相關係的運動。所不同的，只是在兩黨的統一戰綫建立時期中，鬥爭是比較緩和、比較隱蔽的；而在兩黨的統一戰綫破裂時期中，鬥爭則採取激化的形式，公開對抗的形式。無論在前一場合或後一場合，鬥爭是普遍的、絕對的、無所不在的；而聯合（同一）却只存在於前一場合，而不存在於後一場合。這就證明：爲什麼我們說，在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鬥爭性的互相關係中，矛盾的同一性是相對的、有條件的，而矛盾的鬥爭性却是絕對的、無條件的、自始至終存在於全過程的。

從又一方面說，在我們對於國民黨在特定時期的又聯合又鬥爭的統一戰綫中，聯合之所以是相對的、有條件的，而鬥爭之所以是絕對的、無條件的，這又是因爲聯合只有通過鬥爭才能實現，而且也只有通過鬥爭才能鞏固，沒有鬥爭就沒有聯合，就沒有團結，聯合、團結，是鬥爭的結果。

舉例來說，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蔣介石之所以肯和我們建立統一戰綫，主要地就是由於我們有着强大的人民武裝力量，如果沒有這個武裝力量，不能設想國民黨蔣介石會和我們建立什麼統一戰綫。而在國民黨蔣介石被迫和我們建立統一戰綫之後，隨時隨地都企圖依靠他自己的反革命的武裝力量，並依靠日本帝國主義的武裝力量來消滅我們的革命的武裝力量。三次反共的高潮，就是這種武裝進攻的最集中的表現。正是依靠了毛澤東同志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的原則，才打退了國民黨蔣介石這些反革命的猖狂進攻。這就說明爲什麼毛澤東同志在抗日戰爭時期堅持統一戰綫中獨立自主的原則（即既統一、又獨立的原則）。正是這個原則，才使得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綫中不致再被資產階級所欺騙，並爲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成爲人民勝利的結局而造成良好的條件。而這個條件就使得在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能够很迅速地擊潰國民黨反動派的進攻，從而取得了全國的勝利。

在中國人民革命的歷史中，「左」傾關門主義和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就在於不懂得列寧的矛盾的同一性和鬥爭性之辯證的統一的原理，不懂得統一戰綫中又聯合又鬥爭的策略運用，從而陷於機會主義的泥坑。按照「左」傾關門主義的意見，認爲革命的力量要純粹又純粹，革命的道路要筆直又筆直。「一切鬥爭，否認聯合」，這就是他們的信條。而按照右傾投降主義的意見，則認爲統一戰綫就是統一戰綫，決不可能既統一，又獨立；既聯合，又鬥爭。他們的信條是：「一切聯合，否認鬥爭。」

不難看出：「左」傾關門主義和右傾投降主義是從同一個基本點上出發而表現出的兩種不同的形式。「左」傾關門主義和右傾投降主義都是割裂矛盾的同一性和矛盾的鬥爭性之辯證的統一。「左」傾關門主義只看見矛盾的鬥爭性，而看不見矛盾的同一性；右傾投降主義則是只看見矛盾的同一性，而看不見矛盾的鬥爭性。兩者都只看到片面，而沒有看到全面，從而兩者都不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唯物辯證法。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曾犯「左」傾關門主義錯誤的同志，在抗日戰爭時期又轉到犯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充足地說明了這兩種傾向是完全可以過渡、彼此密切聯繫的。

四

毛澤東同志深刻地體會了列寧關於「對抗和矛盾斷然不同」的指示，認爲：「矛盾和鬥爭是普遍的、絕對的，但是解決矛盾的方法，即鬥爭的形式，則因矛盾的性質不同而不相同。有些矛盾具有公開的對抗性，有些矛盾則不是這樣。根據事物的具體發展，有些矛盾是由原來還非對抗性的，而發展成爲對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則由原來是對抗性的，而發展成爲非對抗性的。」（「矛盾論」）由此出發，毛澤東同志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根據各種矛盾在發展過程中的複雜關係和不同性質，天才地發展了「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不同的矛盾」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理。

毛澤東同志對於黨的極其突出的一個貢獻，就是在對待黨內的矛盾問題上，運用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理，謹愼地區別對抗性的和非對抗性的矛盾，而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從而保證了黨在思想上和組織上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統一。

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中國是一個小資產階級極其廣大的國家，中國的黨是處在這個廣大階層的包圍中，同時又有很大數量的黨員出身於這個階層，這些人都不免或長或短地拖着一條小資產階級的尾巴進黨來。這樣，就使得黨不能不對於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和作風作爲各種形式的鬥爭。這種小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說來，對於無產階級思想是不能共存的，然而小資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却是無產階級最接近的同盟軍之一，在反對共同的敵人——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這一點上，小資產階級是無產階級的朋友，而不是敵人。因此，毛澤東同志在處理黨內小資產階級錯誤的思想意識的時候，經常採取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來解決小資產階級思想意識跟無產階級思想意識的矛盾，用無產階級正確的思想去克服和改造小資產階級錯誤的思

想，而與對待黨內階級異己分子的反動思想及其危害性的不同而作不同的處理。一九四二年全黨的整風運動，就是毛澤東同志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解決黨內矛盾問題的偉大創作。

整風運動就是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使全體黨員認識和克服廣泛存在於黨內的僞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和作風，特別是主觀主義的傾向，宗派主義的傾向，和這兩種傾向的表現形式——黨八股。思想上的主觀主義的傾向，組織上的宗派主義的傾向，曾是黨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統一和黨與人民羣衆廣泛聯繫的嚴重障礙。從而主觀主義，宗派主義，也就是黨性不純的表現。誠如毛澤東同志嚴厲地所指出：這種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是共產黨的大敵，無產階級的大敵。這也就是說，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是和無產階級的思想作風有着不可調和的矛盾，只有打倒了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以及這兩種傾向的表現形式——黨八股，眞理才會抬頭，革命才會勝利，黨性才會鞏固。用什麼方法去克服？這就是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

「第一是『懲前毖後』，第二是『治病救人』。」

如同大家所知道，毛澤東同志這種「懲前毖後」和「治病救人」的方針，曾是完滿地解決黨內思想鬥爭的最好的方法。依靠了這種方法，毛澤東同志勝利地提高了全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水平，和造成了黨內在毛澤東同志旗幟下的空前的團結，而這也就是使得黨能夠在抗日戰爭時期和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勝利前進的重要條件之一。

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不同的矛盾的又一方面是：「過程變化，舊過程和舊矛盾消滅，新過程和新矛盾發生，解決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俄國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所解決的矛盾及其所用以解決矛盾的方法是根本上不相同的。」（「矛盾論」）

毛澤東同志關於從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的理論，就是根據這個原則而大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毛澤東同志寫道：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整個中國革命運動，是包括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個階段在內的全部革命運動；這是兩個性質不同的革命過程，只有完成了前一個革命過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後一個革命過程。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而一切共產主義者的最後目的，則是在於力爭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的最後的完成。只有認清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區別，同時又認清二者的聯繫，才能正確地領導中國革命。」（「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

但由於中國的民主主義革命是在無產階級（通過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以工農聯盟爲基礎、聯合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完成的，這樣，就使得中國的民主主義革命的結果不但有資本主義因素的發展，而更重要的是有社會主義因素的發展，而後一因素的發展又領導着和限制着前一因素的發展及其發展的方向。這樣，就保證了從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的一切必備條件，而這些條件也就使得在將來解決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矛盾的方法，跟解決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矛盾的方法，有着根本的差異。這個差異，甚至還不是如同俄國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所用以解決矛盾的方法那樣的差異。

這就是說，中國民主主義革命的結果，由於工人階級及其政黨——中國共產黨在國家政權機關中和人民軍隊中保持了領導權，並由於在經濟生活中，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保持了自己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地位，就使得從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有着全新的意義。

毛澤東同志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在分析了最後地消滅中國的主要的剝削階級——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的策略以後，指出：「剩下一個民族資產階級，在現階段就可以向他們中間的許多人們進行適當的教育工作。等到將來實行社會主義即實行私人企業國有化的時候，再進一步對他們進行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人民手裏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不怕民族資產階級造反。」

不久以前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三反」「五反」運動，就是人民的國家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使用自己的權力，對於資產階級的腐朽思想和猖狂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這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像這樣的鬥爭，在今後進入社會主義以前，是不可能停止的。因爲作爲剝削階級的資產階級只要一天存在，他的腐朽思想就有可能起侵蝕的作用，而這也就會對國家和人民造成莫大的損失。無產階級對於他所領導的各個階級，特別是對於貧雇無產、唯利是圖的資產階級，也只有通過一系列的階級教育和階級鬥爭，才能使各個階級，特別是作爲剝削階級的資產階級，得到徹底的改造，才能爲將來「從容地和妥善地走進社會主義」（毛澤東同志語）創造充足的條件。

這就是說，中國進入社會主義的革命，由於在民主主義革命的階段所造成的各種條件，就可以採取與資本主義國家進入社會主義革命不相同的解決矛盾的方法。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如同在其他方面一樣，毛澤東同志又一次天才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矛盾論」解說

（五）

李　達

革命鬥爭中的某些時候，困難條件超過順利條件，在這種時候，困難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順利是其次要方面。然而由於革命黨人的努力，能夠逐步地克服困難，開展順利的新局面，困難的局面讓位於順利的局面。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失敗後的情形，中國紅軍在長征中的情形，都是如此。現在的中日戰爭，中國又處在困難地位，但是我們能夠改變這種情況，使中日雙方的情況發生根本的變化。在相反的情形之下，順利也能轉化爲困難，如果是革命黨人犯了錯誤的話。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的勝利，變爲失敗了。一九二七年以後在南方各省發展起來的革命根據地，至一九三四年都失敗了。

〔說明〕在革命鬥爭中，也有矛盾雙方互相轉化的實例。有時革命鬥爭進行順利，有時則遭逢困難。順利和困難，形成矛盾的兩極。當困難條件超過順利條件時，困難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順利是其次要方面。但共產黨人是決不向困難低頭的，祇要黨的政治路綫的正確，通過共產黨人的努力，就能夠逐步地克服困難，開展順利的新局面，因而困難的局面就讓位於順利的局面。反之，當革命順利進行時，順利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困難是其次要方面。但在這種時候，黨的政治路綫如果發生了錯誤，敵人就會乘機反攻，革命鬥爭就會逐步地陷於困難的局面，順利就會轉化爲困難。這兩種情形，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革命的歷史中，都是有過的。例如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在最初的時候，由於孫中山的國民黨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將國民黨改組爲有共產黨人參加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聯盟，並決定實行聯蘇、聯共和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在這種條件下，共產黨領導着這個革命，很順利地把全國的工人和廣大的農民組織起來，並在軍事上也領導了北伐的戰爭，摧毀了北洋封建軍閥的勢力。這是革命鬥爭很順利的局面。但自從孫中山去世以後，蔣介石匪幫就陰謀背叛革命，採取了一系列的反共的措施，而陳獨秀機會主義領導集團，不但麻痺大意，不知提高警惕，反而放棄了對於革命的領導權，放棄了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結果，蔣介石匪幫在一九二七年公開反革命，給共產黨以嚴重打擊，使革命局勢陷於極端困難的境地。這是革命鬥爭由順利局面轉化到困難局面的實例。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以後，黨的革命鬥爭陷於極端困難的地位，蔣介石匪幫的統治比以前的軍閥更爲兇惡，許多優秀黨員和革命的工人農民，遭到了極野蠻的毒殺，全國突然轉入了黑暗。但以毛澤東同志爲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接受了失敗的教訓，清除了黨內的機會主義分子，集結了革命的力量，在敵人進攻的面前組織有秩序的退却和防禦，並利用敵人內部的矛盾，爭取革命運動的復興。但當開始在白色勢力包圍中建立紅色政權根據地之時，革命的困難條件是很多的，讀了「井岡山的鬥爭」，便可知道。毛澤東同志却很正確地應用了矛盾法則分析了當時客觀革命形勢中的矛盾，研究了敵我雙方的情況，指出革命高潮即將到來。同時，黨決定了一系列的正確的政策，整黨建軍，緊緊依靠農民羣衆，推行土地革命。於是革命根據地的範圍逐漸推廣，到一九三〇年已由江西發展到福建、安徽、河南、陝西、甘肅等地和海南島，紅軍勢力日趨壯大，粉碎了蔣介石匪幫幾次的「圍剿」。經過幾次的大勝利，新的革命形勢，也逐漸地接近於成熟了，這是革命鬥爭由困難的局面轉變到順利的局面的實例。不料革命情勢正在順利發展之時，黨中央「左」傾機會主義領導集團，却把革命引到錯誤的方面，致使白色區域中黨組織差不多全部遭到破壞，而在蘇區中排擠了毛澤東同志的領導，特別是排擠了毛澤東同志對於紅軍的領導。因而造成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大失敗，不得不開始了二萬五千里的長征。於是由紅軍勝利和國民黨統治區羣衆運動高漲所表現出來的革命復興就被破壞了。

在長征中，由於黨中央在軍事上繼續發生錯誤，使紅軍數次陷入危險境地並受到了極大的損失。自從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全黨的領導地位以後，才使中央紅軍克服了軍事上的、政治上的和自然界的無數困難，勝利地完成了二萬五千里的長征，在陝北建立了革命根據地，重整了革命的陣容，從困難的局面轉到了順利的局面。

又如就一九三七年開始的抗日戰爭來說。在最初的時候，日帝國主義佔居矛盾的主要方面，中國則處在非主要方面，敵强我弱，敵之進攻順利，我之防禦困難。但如毛澤東同志的分析，「日本的長處是其戰爭力量之强，而其短處則在其戰爭本質的退步性、野蠻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國際形勢之寡助。」「中國的短處是戰爭力量之弱，而其長處則在其戰爭本質的進步性和正義性，在其是一個大國家，在其國際形勢之多助。」（「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四一一和四一二頁）中國共產黨根據中日戰爭互相矛盾着的這些基本特點，規定了抗日的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軍事上的戰略戰術，領導着廣大人民的民族統一戰綫，終於取得了抗戰的勝利。

又如就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來說：當一九四六年七月，蔣介石匪幫發動全國規模的反革命戰爭的時候，共有軍事力量四百餘萬人，又有美帝國主義者大量的軍事援助，早已利用時間完成了進攻的準備，其局面當然是順利的。但從蔣介石匪幫發動反革命戰爭的那一天起，毛澤東同志早就斷定我們不但必須打敗蔣介石，而且能夠打敗他。果然，到了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毛澤東同志在中共中央會議上報告「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時，中國人民解放軍早已打退了美蔣匪幫數百萬反動軍隊的進攻，並使自己轉入了進攻；扭轉蔣匪幫的反革命車輪，使之走向消滅的道路，推進了自己的革命車輪，使之走向勝利的道路。解放戰爭的歷史，完全證實了毛澤東同志論斷的正確。

又如我們的新國家成立之時，首先遭遇到財政經濟困難的局面，財政收支不能平衡，物價波動，金融不穩定，這是蔣介石匪幫長期破壞的結果，也受了官僚資本的殘餘勢力的影響。但由於人民政府財政經濟政策的正確，由於毛主席的英明領導和全國人民的奮勇努動，由於土地改革的完成、工商業的調整、和國家機構所需經費的節減，由於「三反」和「五反」運動的偉大成就，在短短兩年多的期間內，在排除種種困難而又大踏步前進的情況下，我國的財政經濟情況就已經根本好轉了。這是財政部部長薄一波在一九五二年八月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中所宣告的。

在新國家建設的前途中，經常要遇到種種困難，但在中國共產黨和革命人民面前，任何困難都是可以克服的。祇要我們能夠善於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學習毛澤東思想，信任羣衆，緊緊地和羣衆一道，集中羣衆的智慧，我們是完全能夠克服任何困難而前進的。

研究學問的時候，由不知到知的矛盾也是如此。當着我們剛才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時候，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無知或知之不多的情況，和馬克思主義的知識之間，互相矛盾着。然而由於努力學習，可以由無知轉化爲有知，由知之不多轉化爲知之甚多，由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盲目性改變爲能夠自由運用馬克思主義。

〔說明〕研究學問的時候，由不知到知，也是矛盾雙方的互相轉化。例如馬克思列寧主義，不論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或民族資產階級的人，都是可以學習的。當人們開始學習的時候，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無知的。無知和有知之間形成爲一個矛盾。但若努力進行學習，就可以由無知到有知，由知之不多到知之更多。這是一種情形。若要進一步追問：一個人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有知或知之更多，是否眞知或眞的知之更多？這要拿他的行動來鑑定，看他所學得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知識，能否在行動上表現出來，知識和行動能否統一。如果單祇知道馬克思和列寧的著作中的文句和意義，而在行動上却是另外一套，那所謂「知」就和不知相等，甚至比不知還要壞。說到這裏，就要涉及階級立場的問題。因爲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是關於社會發展的科學，關於工人運動的科學，關於共產主義社會建設的科學。這種科學是工人階級思想的體系，祇有工人階級和完全站在工人階級立場的人們，才能把所學得的關於這個科學的知識作爲行動的指南，把知識和行動統一起來。他們學得這個科學的知識越多，越是能夠在革命和建設的實際工作中去運用它。祇有這樣，才能克服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盲目性，而轉變到能夠自由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

工人階級以外的三個民主階級，也可以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也可以由不知到知，由知之不多到知之更多。農民學懂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會知道農業集體化的美好的前途，在工人階級領導下向着社會主義社會邁進。小資產者學懂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會知道將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對於他們的生活更有保障。民族資本家學懂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便能夠誠心誠意地遵守共同綱領，發展於國計民生有利的企業，到了將來實行私人企業國有化之時，一定可以得到工作的機會，並且他們的消費資料也可以保留。這裏祇就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可以由無知到有知這個轉變來說，若要說到知和行的統一，則不能期待於今日的資本家。如果說要資本家懂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就見之於行動，那就等於說要資本家放棄對於別人勞動的剝削，放棄所獨佔的生產資料。若照這樣，他便不成其爲資本家了。

有人覺得有些矛盾並不是這樣。例如，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生產力是主要的；理論和實踐的矛盾，實踐是主要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經濟基礎是主要的；它們的地位並不互相轉化。這是機械唯物論的見解，不是辯證唯物論的見解。誠然，生產力、實踐、經濟基礎，一般地表現爲主要的決定的作用，誰不承認這一點，誰就不是唯物論者。然而，生產關係、理論、上層建築這些方面，在一定條件之下，又轉過來表現其爲主要的決定的作用，這也是必須承認的。當着不變更生產關係，生產力就不能發展的時候，生產關係的變更就起了主要的決定的作用。當着如同列寧所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的時候，革命理論的創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決定的作用。當着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樣）要做，但是還沒有方針、方法、計劃或政策的時候，確定方針、方法、計劃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決定的東西。當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層建築阻礙着經濟基礎的發展的時候，對於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爲主要的決定的東西了。我們這樣說，是否違反了唯物論呢？沒有。因爲我們承認總的歷史發展中是物質的東西決定精神的東西，是社會的存在決定社會的意識；但是同時又承認而且必須承認精神的東西的反作用，社會意識對於社會存在的反作用，上層建築對於經濟基礎的反作用。這不是違反唯物論，正是避免了機械唯物論，堅持了辯證唯物論。

〔說明〕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互相轉化，上面已經舉了很多實例說明了，但是抱着機械唯物論見解的人們，却說有些矛盾的雙方並不互相轉化。例如有人

說，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生產力是主要方面，兩者的地位並不互相轉化。這種見解是不合於唯物辯證法的。在辯證唯物論看來，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中，生產力是生產中最活動最革命的要素，是生產發展過程中決定的要素。生產關係是和生產力的發展程度相適合的。「生產力怎樣，生產關係也就應怎樣」。「起初是社會底生產力發生變更和發展起來，然後，人們底生產關係，人們底經濟關係也依賴於這些變更並與這些變更相適應而發生變更」。（「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一五四頁）生產力對於生產關係佔居主要地位，當然是很明顯的。但在另一方面，生產關係也影響於生產力的發展，生產力也依賴於生產關係。生產關係雖然是依賴於生產力的發展而發展，但同時它們也反轉來影響於生產力。因爲社會的生產力是不斷地向前發展的。當生產關係適合於生產力的性質和狀況，並使生產力有發展餘地時，它能助長生產力的發展；反之，當生產關係不適合於生產力的性質和狀況，並使生產力無發展餘地時，它就障礙生產力的發展。這是生產關係對於生產力的反作用。在這種時候，生產關係對於生產力就佔居主要地位了。不過這種情況不能持久，生產關係不能長此落後於生產力的發展，它們遲早必定適合於生產力的發展水平，適合於生產力的性質。這即是說，生產力仍要佔居矛盾的主要地位。但是，生產關係爲什麼能障礙生產力的發展呢？因爲生產力說明着人們用怎樣的生產工具生產他們的物質資料的問題，而生產關係則是說明着生產資料歸誰所有的問題，即歸社會所有或歸個人所有的問題。在階級社會中，生產資料歸特殊階級所獨佔，而別的階級則喪失生產資料。例如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資料歸資產階級所獨佔，無產階級則除勞動力以外，一無所有。所以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即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關係，是剝削和被剝削的關係，即是財產關係。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關係障礙生產力的發展，即是資本家的財產關係起着障礙的作用。這種障礙生產力發展的實例，便是資本主義國家中所發生的經濟危機。因爲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有制是和生產過程的公共性質，和生產力的性質不相適合的，所以才發生經濟危機。爲要使生產力得以順利發展，就必須打破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建立適合於生產過程的公共性質，即適合於生產力的性質的新生產關係——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這是必須由無產階級革命來實現的。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爲基礎的生產關係，則是與生產力的性質完全適合的。

有人說，理論和實踐的矛盾，實踐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它們的地位並不互相轉化。這種見解同樣是錯誤的。革命的實踐對於革命的理論，固然佔居主要地位，但革命的實踐若果沒有革命的理論做指導，就會變爲盲目的實踐，必然要遭到失敗。列寧說過：「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所以當着無產階級要實行革命而缺乏革命理論做指導的時候，革命的理論的創立和提倡，就要起主要的決定的作用了。就中國人民百多年來革命的歷史來看。從一八四〇年的鴉片戰爭開始，經過太平天國運動、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戊戌政變、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以迄「五四」運動以前爲止，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是不屈不撓、再接再厲地進行着，但因爲一直沒有建立起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革命理論，所以都沒有得到勝利。在這個期間，「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眞理。洪秀全，康有爲，嚴復和孫中山，代表了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眞理的一派人物」。「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多次奮鬥，包括辛亥革命那樣全國規模的運動，都失敗了」。（「論人民民主專政」）但自從十月革命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眞理以後，中國革命的面貌就起了變化了。毛澤東同志說：「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一百年來，其優秀人物奮鬥犧牲，前仆後繼，摸索救國救民的眞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俄國十月革命之後，才找到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這個最好的眞理，作爲解放我們民族的最好武器，而中國共產黨則是拿起這個武器的倡導者、宣傳者與組織者。馬列主義的普遍眞理一經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使中國革命的面目爲之一新。」（「改造我們的學習」）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眞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之結合，正是毛澤東思想。中國人民革命由於有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導，所以能夠從勝利走向勝利。這是革命理論對於革命實踐起着主要的決定作用之良好的例證。

又如我們要做任何一件工作（即實踐），必須有一定的方針、方案、計劃和政策，作爲工作的指導。這方針、方案、計劃和政策，對於那個工作就成爲主要的決定的東西。現在，我們新國家爲了準備大規模的經濟建設，正在製訂着偉大的經濟計劃，作爲全國人民奮鬥的目標。計劃對於建設的主要的決定作用是很明顯的。

有人說，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經濟基礎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它們的地位並不互相轉化。這種見解同樣也是錯誤的。「基礎是社會發展到某一階段上的社會經濟制度。上層建築是社會對於政治、法律、宗教、藝術、哲學的觀點，以及適合於這些觀點的政治法律等制度」。（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基礎是第一性的東西，上層建築是第二性的東西，是從基礎產生的東西。斯大林所說基礎是社會發展到某一階段上的社會經濟制度，即是和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生產力水平相適合的生產關係的總和。隨着生產力由一個階段發展到較高的階段時，生產關係也隨着發展到較高的階段，即一種社會經濟制度轉變爲較高階段的經濟制度。所以社會的經濟基礎隨着生產力的變化、發展而變化、發展的。由於社會的經濟基礎變化，那從基礎產生並適合於基礎的上層建築也隨着發生變化。上層建築是爲基礎服務的。在對抗性的社會中，上層建築是獨佔生產資料的階級爲了鞏固於自己有利的經濟制度而建立的，是它用以統治被剝奪了生產資料的階級的工具。這個統治工具分爲物質的和精神的兩種。物質的統治工具，是國家、法庭和警察之類的强制機關。精神的統治工具，是政治、法律、宗教、藝術、哲學的觀點。而那些强制機關的政治法律制度，則是與那些觀點相適合的。例如帝國主義國家，資產階級爲了統治無產階級，不但利用法庭和警察（有時調用軍隊）鎭壓無產階級的反抗；並且利用學校、書店、報館、教會、戲院、電影公司、廣播電台等等，傳播資產階級思想，企圖在精神上麻醉無產大衆，藉以維持資本主義私有制。所以資本主義社會的上層建築反映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並爲經濟基礎服務。經濟基礎對於上層建築，

佔居主要地位，這是很明白的道理。但是，上層建築雖由基礎產生並反映基礎，却並不是說上層建築對於基礎是完全被動的、消極的東西。上層建築一旦成立以後，它對於基礎就具有能動的、積極的力量。斯大林說：「上層建築是由基礎產生的，這並不是說上層建築只是反映基礎，只是消極的，中立的，對自己基礎的命運、對階級的命運、對制度的性質漠不關心的。相反地，上層建築一出現後，就要成爲極大的積極力量，積極幫助自己基礎的形成和鞏固，採取一切辦法幫助新制度來根除和消滅舊基礎和舊階級。不這樣也是不可能的。基礎之所以創立自己的上層建築，也就是爲了要使上層建築替它服務，要使上層建築積極幫助它形成起來和鞏固起來，要使上層建築積極爲消滅已經過時的舊基礎及其舊上層建築而鬥爭。」（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所以，上層建築一旦成立以後，就成爲極大的積極的力量，它能加速社會的發展，也能延緩或阻礙社會的發展。例如資產階級推翻封建社會以後，就建立了適合於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上層建築——資產階級的國家機關和資產階級的政治、法律、宗教、藝術、哲學等觀點，積極幫助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形成和鞏固，並採取一切辦法幫助資本主義的制度來根除和消滅封建主義的制度與封建階級，因而使資本主義得以向前發展。但是到了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就和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發生衝突，而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就障礙新生產力的發展，於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就發生動搖而逐漸衰亡下去。可是，資產階級却憑藉資本主義的上層建築，鎮壓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企圖保存那衰亡着的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於是，資本主義的上層建築就阻礙社會的發展。於是，在新生產力和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互相衝突的基礎上，就產生出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就動員無產階級，組織無產階級組織起來，就成爲强大的革命力量，能夠推翻資本主義的上層建築，建立起革命的政權，用强力消滅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建立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產關係，多年來障礙着新生產力的發展，可是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上層建築却竭盡全力保存着腐朽的衰亡的經濟基礎。但用毛澤東思想武裝着的工人階級及其司令部中國共產黨，組織了以工人階級爲領導、以工農聯盟爲基礎、並團結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綫，成爲强大的革命力量，終於推翻了國民黨反動政府，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消滅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經濟制度，建立了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制度，向着社會主義社會前進。由此可見，上層建築雖由經濟基礎產生，而在它產生以後，却成爲强大的積極的力量。

從上面那些說明看來，生產力、實踐、經濟基礎，一般地表現着爲主要的決定作用，這是毫無疑問的，然而，生產關係、理論、上層建築這些方面，在一定條件之下，又轉過來表現其爲主要的決定的作用，這也是必須要承認的。我們這種說法，是合乎辯證唯物論的。因爲我們承認：在總的歷史發展中，物質的東西決定精神的東西，社會的存在決定社會的意識。這就是說：承認社會的物質生活、社會的存在是第一性的現象；社會的精神生活、社會的意識是第二性的現象。精神生活是物質生活的反映，社會意識是社會存在的反映。總起來說，社會的思想、理論、觀點等是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反映。我們必須從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去說明社會的思想、理論、觀點，決不能從社會的思想、理論、觀點去說明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即是要從社會存在去說明社會意識，決不能從社會意識去說明社會存在。所以，社會存在對於社會意識具有決定作用。但是不能因此就說社會意識對於社會存在沒有反作用。在社會歷史和社會生活中，社會意識也是具有積極的反作用。在對抗性的社會裏，有舊的社會的思想、理論和觀點，也有新的社會的思想、理論和觀點。前者是爲腐朽的反動的階級的利益服務的，它們所起的反作用，是阻礙社會的發展；後者是爲新興的革命的階級的利益服務的，它們對於舊社會的反作用，是消滅舊社會，建立新社會。所以當着舊社會開始衰亡，當着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已在社會面前提出新任務時，就產生出新的社會的思想、理論和觀點，成爲新興的革命的階級的精神武器，化爲物質的力量，能夠摧毀舊的社會生活秩序，建立新的社會生活秩序。反映了中國社會發展規律的毛澤東思想一經掌握了人民大衆，便成爲强大的物質力量，所以中國的人民革命能夠從勝利走向勝利。社會意識對於社會存在的反作用，是非常重大的。

在研究矛盾特殊性的問題中，如果不研究過程中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矛盾之主要的方面和非主要的方面這兩種情形，也就是說不研究這兩種矛盾情況的差別性，那就將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體地懂得矛盾的情況，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決矛盾的正確的方法。這兩種矛盾情況的差別性或特殊性，都是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世界上沒有絕對地平衡發展的東西，我們必須反對平衡論，或均衡論。同時，這種具體的矛盾狀況，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在發展過程中的變化，正是表現出新事物代替舊事物的力量。對於矛盾的各種不平衡情況的研究，對於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爲革命政黨正確地決定其政治上和軍事上的戰略戰術方針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產黨人都應當注意的。

〔說明〕前面說過，事物的性質，主要的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單一的事物祇有一對矛盾，其性質由這矛盾佔主要地位的一方面所規定。例如就甲物撞擊乙物這件事來說，甲物是起作用的一方，如果它的力量大於乙物的力量，就向着起作用力量的方向運動。反之，就向着乙物起反作用力量的方向運動。複雜的事物，則有許多對的矛盾，其中必有一對是主要矛盾，這事物的性質就由這主要矛盾中佔主要地位的一方面所規定。例如生物的內部有許多對的矛盾，其中生的因素和死的因素的矛盾是主要矛盾，生物的生長是由於生的因素佔主要地位；反之，如果死的因素佔居主要地位，這生物便由於衰亡而至於死滅。又如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當資產階級還佔居主要地位時，社會之資本主義的性質不變；反之，到了無產階級佔居主要地位時，資產階級

便被打倒，社會主義社會便代替資本主義社會。所以在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問題時，必先分析過程中的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捉住那主要矛盾，然後更進而研究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及其互相轉化的必然性。必須這樣，才能找出解決那主要矛盾的方法。倘若有人不照這樣去具體地分析這兩種矛盾情況的差別性，而祇是作抽象的研究，那就不能具體地了解矛盾的情況，就不能找出解決矛盾的正確方法。

上述兩種矛盾情況的差別性或特殊性，都是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是不平衡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也是不平衡的。正因爲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所以事物才有變化，才有發展，舊事物才轉變爲新事物。世界沒有絕對地平衡發展的東西，若說有平衡，也祇是暫時的相對的。因此，我們必須反對平衡論，或均衡論。機械唯物論者布哈林，是提倡所謂均衡論的人。他用力學上的術語代入黑格爾的唯心的神秘的辯證法，作出了「均衡——均衡的破壞——均衡的再建」的公式，冒充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他認爲社會發展的原因不在於社會內部，而在於社會外部，在於社會和自然的相互關係中。他主張社會的發展，由社會和自然的相互關係所決定，社會和自然間的均衡和矛盾，決定社會內部的均衡和矛盾，階級的矛盾就是社會和自然的矛盾的結果。因此，布哈林主張一切經濟政策應當從設置均衡的必要出發，不許破壞均衡，而實現國民經濟的均衡。所以他對於當時社會主義的大產業和小商品的農業經濟之間的矛盾，認爲是破壞了均衡，因而主張發展小商品農業經濟，停止社會主義大產業的發展，使兩者保持均衡。這種見解顯然是反革命的。因爲小商品農業經濟時時刻刻在產生資本主義，若果要保持兩者的均衡，那就等於保持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均衡了。這種反動的均衡論，我們必須反對它。正因爲事物的矛盾中的新舊力量是不平衡的，正因爲新的力量必然地成長壯大起來，終於能夠戰勝舊的力量，新事物才能發生。所以這種具體的矛盾情況，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在發展過程中的變化，正是表現出新事物代替舊事物的力量。

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當領導革命的時候，必須善於應用事物的矛盾法則，研究革命過程中的矛盾的特殊性，從許多複雜的矛盾中，找出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研究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然後才能正確地造出革命的理論，決定政治上和軍事上的戰略戰術的方針。毛澤東同志應用事物的矛盾法則，分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人民革命過程中許多複雜的矛盾，從其中找出兩個主要的矛盾，即中華民族和帝國主義的矛盾與人民大衆和封建制度的矛盾。而解決這兩個主要矛盾的方法，是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毛澤東同志更進而指出這兩個主要矛盾，在革命過程中的各發展階段上，有時兩個主要矛盾中祇有一個佔居主要地位，其他則降居次要地位。例如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戰爭中，人民大衆和北洋封建軍閥政府之間的矛盾，成爲主要的矛盾；在一九二七年以後的十年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人民大衆與蔣介石匪幫政府之間的矛盾成爲主要矛盾；在抗日戰爭時期，中華民族與日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成爲主要的矛盾，其他則降居次要地位。又如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匪幫公開站在一個極端，中國人民大衆則站在另一個極端，於是兩個主要矛盾合成爲一個主要矛盾。毛澤東同志在領導革命的各個時期中，捉住各個時期的主要矛盾，研究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及其互相轉化的必然性，決定了不同的政治上和軍事上的戰略戰術方針。例如：在十年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同志分析了蔣介石匪幫的反動政權與人民大衆之間的矛盾，認定敵强我弱，敵據城市，我據農村，敵方顯然佔居主要地位。但「中國是一個經過了一次革命的、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國，這是中國革命戰爭的第一個特點。這個特點，不但基本地規定了我們政治上的戰略和戰術，而且也基本地規定了我們軍事上的戰略和戰術。」（「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一八七頁）由於政治和軍事上的戰略戰術方針的正確，所以革命力量逐漸發展，新的革命形勢也就逐漸接近於成熟。祇因爲後來「左」傾機會主義領導的錯誤，才使這一次革命的復興遭受了重大的挫折。其次，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同志捉住了中華民族和日帝國主義這個主要矛盾，指出了「日本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是强的，但其戰爭是退步的、野蠻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國際形勢又處於不利。中國反是，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是比較地弱的，然而正處於進步的時代，其戰爭是進步的和正義的，又有大國這個條件足以支持持久戰，世界的多數國家是會要援助中國的。——這些，就是中日戰爭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點。這些特點，規定了和規定着雙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軍事上的戰略戰術，規定了和規定着戰爭的持久性和最後勝利屬於中國而不屬於日本。」（「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四一二頁）毛澤東同志和中國共產黨基於這個主要矛盾的兩方面之具體的分析，決定了抗日革命戰爭的政治上和軍事上的戰略戰術方針，進行了八年的抗戰，建立了十九個解放區，壯大了人民解放軍，終於能夠配合蘇聯出兵東北，打敗了日帝國主義，取得了偉大的勝利，爲後來的人民民主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鞏固的基礎。其次，在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蔣介石匪幫和人民大衆之間的矛盾成爲主要的矛盾。毛澤東同志分析這個矛盾的兩個方面，認定蔣介石匪幫「軍事力量的優勢，這只是暫時的現象，這只是臨時起作用的因素；美國帝國主義的援助，也只是臨時起作用的因素；而蔣介石戰爭的反人民的性質，人心的向背，則是經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在這方面，人民解放軍則佔着優勢。人民解放軍戰爭所具有的愛國的正義的革命的性質，必然要獲得全國人民的擁護。這就是戰勝蔣介石的政治基礎」。（「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所以，從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戰爭之日起，毛澤東同志就早已斷定我們必須打敗蔣介石，而且能夠打敗他。爲了打敗蔣介石，毛澤東同志規定了十大軍事原則作爲人民解放軍打敗蔣介石的主要方法。果然解放戰爭進行了一年多，人民解放軍就已經打退了蔣介石的進攻，迫使他轉入防禦地位，而人民解放軍則由防禦轉到進攻，走向了勝利的道路。

由此可見，對於矛盾的各種不平衡情況的研究，對於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主要矛盾的方面和非主要矛盾的方面的研究，成爲革命政黨決定其政治上和軍事上的戰略戰術方針的重要方法之一。

五　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鬥爭性

在懂得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問題之後，我們必須進而研究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鬥爭性的問題。

同一性、統一性、一致性、互相滲透、互相貫通、互相依賴（或依存）、互相聯結或互相合作，這些不同的名詞都是一個意思，說的是如下兩種情形：第一、事物發展過程中的每一種矛盾的兩個方面，各以和它對立着的方面爲自己存在的前提，雙方共處於一個統一體中；第二、矛盾着的雙方，依據一定的條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轉化。這些就是所謂同一性。

列寧說：「辯證法是這樣的一種學說：它研究對立怎樣能夠是同一的，又怎樣成爲同一的（怎樣變成同一的），——在怎樣的條件之下它們互相轉化，成爲同一的，——爲什麼人的頭腦不應當把這些對立看作死的、凝固的東西，而應當看作生動的、有條件的、可變動的、互相轉化的東西。」〔一五〕

列寧這段話是什麼意思呢？

〔說明〕我們在前面，已經研究了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以及兩者的聯繫。我們已經知道：所謂矛盾的普遍性，是說矛盾存在於一切的自然現象、社會現象和思想現象的過程中，並貫串於一切過程的始終；矛盾即是運動，即是事物，即是世界。但矛盾的普遍性，寄存於一切個別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之中，是從無數的矛盾的特殊性之中抽離出來的。我們必先認識多數個別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把它們概括起來，才能認識事物的矛盾的普遍性。然後再根據矛盾的普遍性的認識，去認識新的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才能定出解決這特殊的矛盾的方法。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綜合各個歷史時代的各種特殊的階級矛盾的研究而創造的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普遍眞理；毛澤東思想是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解決中國革命過程的特殊的複雜的階級矛盾的理論與策略。這是在前面已經說到的。所以我們研究了階級矛盾的普遍性之後，必須進而具體地分析一個革命過程的特殊的階級矛盾，定出解決這特殊的階級矛盾的方法，作爲革命的總路綫，然後進而探求革命過程的發展各階段的階級矛盾的特殊的變化，具體地規定解決的方法。在研究革命過程的複雜的階級矛盾時，特別重要的是分別主要的階級矛盾和非主要的階級矛盾，研究主要的階級矛盾和非主要的階級矛盾的各方面；並且要捉住各個發展階段上的主要的階級矛盾，研究這個主要矛盾的雙方中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及其互相轉化的必然性。革命的階級，必須運用革命的方法，解決這個主要矛盾，社會才呈現出新的局面。中國人民革命，解決了中華民族和帝國主義的矛盾（就中國大陸說的）與人民大衆和統治階級的矛盾，所以出現了新民主主義社會。

在研究了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後，我們可以進一步來研究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鬥爭性的問題了。

矛盾的同一性，即是矛盾的統一性或一致性，又如說，矛盾的互相滲透、互相貫通、互相依賴、互相依存、互相聯結、互相合作，這些名詞雖然不同，而意義都是相同的。這意義包括兩個方面：第一、事物發展過程中的矛盾，形成爲對立的兩極，一極的存在以他極的存在爲前提，兩極中如果缺少了一極，就不能成爲對立了。並且，對立的兩極同處於一個統一體之中，即同處於一個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它們雖互相對立，却又互相聯繫，互相滲透，形成爲統一。第二、矛盾着的兩方面，在其發展過程中，依據於一定的條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轉化。這些就是矛盾的同一性。

矛盾的同一性問題，是辯證法的基本問題。列寧說：「辯證法是這樣的一種學說：它研究對立怎樣能夠是同一的，又怎樣成爲同一的（怎樣變成同一的），——在怎樣的條件之下它們互相轉化，成爲同一的，——爲什麼人的頭腦不應當把這些對立看作死的、凝固的東西，而應當看作生動的、有條件的、可變動的、互相轉化的東西。」列寧這個關於辯證法的定義，可以分爲三方面來理解。

一、矛盾雙方怎樣能夠是同一的？

二、矛盾雙方在怎樣的條件下互相轉化，成爲同一的？

三、人的頭腦爲什麼必須把矛盾當作生動的、有條件的、可變動的、互相轉化的東西去考察？

下面就這三個問題分別說明。

（待續）

炳靈寺石窟勘察工作完畢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和西北軍政委員會文化部所組成的炳靈寺石窟勘察團九月二十日到達石窟後，經過十天的考證、攝影和重點臨摹，於九月二十九日勘察完畢。這次勘察的結果，爲我國古代文化藝術的研究工作開闢了一個廣闊的新園地。目前已經發現的有北魏和唐代的石窟三十五孔和石龕八十七個，窟內和龕內存有許多我國古代極精美極完整的藝術創作——石雕佛像和浮雕。其中北魏的造像，富有我國民族文化藝術的高尙風格。佛龕內浮雕形象豐滿，神態生動，可稱我國唐代優秀文化的代表作。

窟內有遠自北魏、唐，近至明、清的歷代壁畫。我國著名的敦煌壁畫主要是北魏、唐代的作品，元以後的較少，炳靈寺石窟的壁畫正補充了敦煌壁畫之不足。所發現的石刻題記，以北魏延昌（宣武帝時期，公元五一三年）爲最早。此外尙有西夏文和藏文的題記，字蹟清晰可辨。

炳靈寺石窟，在甘肅省永靖縣境黃河北岸的石峽中。最高的石窟，距地面數十丈，石窟周圍，山水秀麗，在北魏和唐代，曾是我國文化藝術極爲昌盛的地點之一。

略論現實主義與主觀

蔡儀

文藝界曾流行過的主觀論，近年來顯得比較消沉了，可是由於它還自認爲是眞正的現實主義，也有不少的人還相信它才是現實主義，於是現實主義和主觀的關係問題也就還有討論的必要。我在這篇短文裏，只提出一點簡單的意見，供關心這個問題的人參考。

現實主義和別的文藝思想不同的基本精神，一般的說，是在於正確地反映現實生活的本質、規律(包括它發展的前途)。而就階級社會的文藝來說，所謂反映現實生活的本質、規律，就是反映階級鬥爭，特別是反映階級鬥爭中的政治鬥爭的性質、規律。承認現實主義的這個基本精神，就是承認文藝的一切特性基本上是由於正確地反映現實生活的本質、規律，也就是由於反映階級鬥爭、特別是政治鬥爭的性質、規律，文藝的美是如此，文藝的感人力是如此，文藝的當作精神鬥爭的武器以至社會鬥爭的武器也是如此，否則文藝不能獲得這些特性。

主觀論者的理論則是和現實主義的這個基本精神相反的。對於現實主義的這個基本精神，他們表面上也承認，而實質上是否認。他們在字面上也說現實生活、階級鬥爭，而實質上他們的說這些，是爲了引導到、歸結到他們的主觀論，他們的所謂「主觀精神」、「戰鬥要求」、「感性機能」、「原始生命力」，「一代的心理動態」，「活人的心理狀態、活人的精神鬥爭」……。例如他們說：「革命文藝底任務是要反映出這個偉大的時代底豐富的內容和火熱的渴求，在鬥爭裏面成長的堅强的性格……這正是非得在活生生的『感性的活動』裏面把握他們、創造他們不可的。這樣纔能把我們這偉大的時代底『一代的心理動態』變成火熱的『觀念之力』，吸引讀者，擴大讀者，教育讀者，改造讀者……」(胡風：「論現實主義的路」)。這裏很明顯的說明了主觀論者的文藝理論的基本精神，是在於反映「一代的心理動態」，而且也認爲文藝的特性，它的美、它的感人力、它的進行精神鬥爭、社會鬥爭，基本上是由於文藝的反映「一代的心理動態」。這種理論，也許自以爲概括了、或者說超越了階級關係、政治鬥爭的說明，而其實正是否認了、至少是模糊了階級關係、政治鬥爭的意義。主觀論的這種基本精神正是主觀論之所以爲主觀論，而和現實主義相反的地方。

現實主義不同於主觀論，却不是否認文藝創作上主觀的作用和意義。

文藝的反映現實生活的本質、規律，自然首先得通過作者的主觀。而所謂通過作者主觀的反映，也不是機械的摹寫，必須是作者的從感性到理性的意識活動才能對現實生活的本質、規律予以反映。所謂必須是由感性到理性的意識活動，就是說這個反映是要以感性認識的材料爲基礎，但不能停滯於感性認識，感性認識是低級的認識，不可能反映現實生活的本質、規律；而文藝要反映現實生活的本質、規律，就必須提高到理性認識。只有提高到理性認識，才能反映現實生活的本質、規律。

主觀意識活動、特別是理性活動是能動的，而在文藝創作過程中則是創造的。也就是由於理性的形象思惟，對於現實對象的研究、體察、分析、概括而達到充分地、完全地、具體地反映客觀現實生活的本質、規律。不過所創造的仍然是現實生活的本質、規律的反映，也就既不是沒有現實生活的根據，也不是和所根據的現實生活的本質、規律不符。如果所創造的沒有現實生活的根據，或者和客觀現實生活的本質、規律不符，那就不是我們的所謂反映，而是空想的臆造。

在反映現實生活的本質、規律的過程中，對象既是活生生的具體的現實生活，而作者又是眞切地形象地認識，也就不能不因此而發生感情。也就是說，在眞切的認識基礎上能發生感情，沒有眞切的認識不可能發生眞摯的感情。不知道這事物的可愛，就不可能眞摯地愛它，不知道這事物的可憎，就不可能眞摯地憎它。若是不知道這事物的可愛或可憎而有愛憎的感情，這感情是虛僞的，空泛的，不是眞摯的。文藝要形象地反映現實生活的本質、規律，作者在由感性到理性的認識活動過程中必然會發生感情，也就是在作品中必然的要滲透着感情。作品中的感情，主要是對於所反映的事物的愛憎之情，而且必須是眞摯的，那麼所依據的認識也必須是眞切的。由感性認識而發生的只是朦朧的感觸或感受，如一般所謂快不快之感就是；而由理性認識所發生的才可能是眞摯的愛憎之情。因此，文藝創作中的主觀感情，不僅不排除理性認識，而且要以理性認識爲依據、爲基礎。只有以理性認識爲依據、爲基礎的感情，才可能是眞摯的、正當的。

文藝要反映現實生活，在作者的創作過程中，也還有作者的所以要反映現實生活的意欲和要求這種主觀的意識活動，這也是不容否認的。這種意欲或要求，有明確的目的和意圖，不是盲然的衝動；而就其行爲表現來說，顯然是屬於社會生活範圍的，不是屬於動物性的生活範圍的，因此它也不是排除理性認識，而且要以理性認識爲依據、爲基礎的。否則它是盲目的。

總之，在文藝創作中要有作者的主觀，要有感性活動、感情活動、意志活動，更要有理性活動，也就是思想（包括形象思惟的想像）。在文藝創作的主觀意識活動中，理性的思想是主導的，而感情、意志則是從屬的，至於感性認識則是低級的；沒有理性活動，感性認識不能提高，感情及意志沒有了依據、沒有了基礎，而只是虛僞的、盲目的。因此，理性、思想是不能忽視的，忽視理性就無異於忽視文藝的反映現實生活的基本特點，也就是基本上是反現實主義的。

主觀論者的重視文藝創作中的主觀，不是爲了反映現實生活，而所重視的作者的主觀，也不是理性的思想。他們說：「文藝創造是從對於血肉人的現實人生搏鬥開始」，「在對於血肉的現實人生的搏鬥裏面，被體現者被克服者，既是活的感性存在，那末體現者克服者的作家本人底思想活動就不能夠超脫感性的機能」，「一定得化合爲感性的機能」（胡風：「逆流的日子」）。「從對於客觀對象的感受出發，作家得憑着他的戰鬥要求突進客觀對象，和客觀對象經過相生相尅的搏鬥，體驗到客觀對象底活的本質的內容，這樣纔能『把客觀對象變成自己的東西』而表現出來」（「論現實主義的路」）。從這兩段簡單的文章裏，至少我們知道了他們所重視的作者的主觀，是感受、感性機能、搏鬥要求等，至於思想活動不能超脫感性機能，而且一定要化合爲感性機能。在別的文章裏，我們還可以看到，他們所要求的主觀，是强烈的感情、是精神突擊力或生命力，總之不是理性、思想，據說理性是冷冰冰的、無血無肉的，而感性的什麼則相反是有血有肉的，所以文藝中縱然有思想，這思想不能停止在邏輯的概念上，或者說不能是邏輯公式平面上的「思想」，要化合爲感性機能云。

主觀論者的這種理論，很顯然的是認爲文藝創作中的作者的主觀精神，理性思想不是主導的，而是感性或欲求或其他什麼爲主導的。這種主觀精神，不是要認識對象，而是要突擊對象，或者說是要和對象搏鬥，然而它首先就是盲目的，分不出方面，看不見道路，不管它是怎樣的强烈，決不是正常的、健康的。而且這種主觀精神的理論，無論在哲學上或文藝理論上，都是早已有之，並不是什麼新鮮的貨色，柏格森、尼采等的思想、直觀主義和表現主義等的理論，便可以說是它的老祖宗；至於和辯證唯物論與現實主義却是沒有姻緣的。

文藝的反映現實生活的本質、規律，自然是要由於反映社會生活主體的人和其具體生活，也只有人和其具體生活是社會生活的本質、規律的體現者。雖然每個人都是社會的主體，每個人的生活都體現着社會生活的本質、規律，却不是同樣地、平均地體現着社會生活的本質、規律，在這裏就有比較豐富地完全地體現着社會生活的本質、規律的人和其生活，於是有所謂「典型情勢中的典型的性格」，其中主要是表現社會發展、歷史動向的代表人物，和他們推進社會發展、歷史動向的重要行爲。這是現實主義的所以反映社會生活的本質、規律的道路。這條道路在我們今天的文藝來說，正是工農兵的方向所要求的。我們今天的人民文藝，按現實主義的道路也就是要描寫工農兵，特別是勞動模範、戰鬥英雄和他們的模範行爲、英勇戰鬥。現實主義的道路和工農兵方向是一致的，現實主義正是貫徹工農兵方向的創作方法。

文藝的反映社會生活究竟是要具體而生動，要重視體現着社會生活的本質、規律的主要人物及其重要行爲，也就要在紛紜的社會生活的現象之中、社會生活的關係之中，社會生活的變化之中去表現他，去表現他必要表現的各種感應、各種活動和各種變化。使他這個人物是生動的、他的生活行爲是眞實的，否則這作品就會成爲概念化、公式主義的東西，這是不用說的。

社會生活中的人有他們的精神生活、精神鬥爭，創作中也要具體而生動的人，就必須表現他們的精神生活、精神鬥爭。只是他們的精神生活、精神鬥爭，如果不是指動物性的原始的衝動的話，又必然是他們的社會生活、社會鬥爭的反映，是在他們的社會生活、社會鬥爭的基礎上形成的。社會生活、社會鬥爭，在階級社會裏主要是階級鬥爭，特別是政治鬥爭。文藝中表現他們的精神生活、精神鬥爭，必須是當作階級鬥爭、政治鬥爭的反映，是在階級鬥爭、政治鬥爭的基礎去表現。只有這樣，他們才可能是眞正社會的人、階級的人，而不是自然的人。只有這樣表現他們的精神生活、精神鬥爭、才可能有社會的意義，而不是動物性的東西。只有這樣表現他們的精神生活、精神鬥爭，才可能反映現實生活的本質、規律。若是不在階級鬥爭、政治鬥爭的基礎上，當作階級鬥爭、政治鬥爭的反映，而徒然强調主觀精神鬥爭，或主觀鬥爭精神，既不明白這鬥爭精神的根源，也無從明白這精神鬥爭的方向，更不可能明白這鬥爭精神或精神鬥爭的內容，這樣的鬥爭精神或精神鬥爭就是神秘的東西。這是和現實主義的基本精神相反的。

主觀論者的理論正是這樣的一種理論。他們强調文藝中要表現主觀鬥爭精神，却不是把它在階級鬥爭、政治鬥爭的基礎上作爲階級鬥爭、政治鬥爭的反映來看的。他們的所謂主觀鬥爭精神就是神秘的。雖然他們在有的地方也說到

它和階級鬥爭、政治鬥爭的關係，然而是不明確的，而且基本上是否認主觀精神鬥爭和階級鬥爭、政治鬥爭的這種正確關係。

由於他們的重視主觀精神主要是在於重視感性、欲求，而忽視理性、思想，他們的所謂主觀精神是盲目的、原始的；所以他們的所謂主觀鬥爭精神，也就不是階級鬥爭、政治鬥爭的反映，也就不是有階級鬥爭、政治鬥爭的基礎，於是這個主觀鬥爭精神的根源，只有找到他們的所謂「生命力」或「原始生命力」，它是上帝賦予的，或者是母胎裏帶來的。他們的理論就只能是神秘論。

他們的強調文藝中要表現主觀鬥爭精神，不僅不是爲了反映階級鬥爭、政治鬥爭，相反的，而是爲了輕視階級鬥爭、政治鬥爭。因爲他們認爲文藝創作的對象是「活的人、活人的心理狀態、活人的精神鬥爭」。在他們看來，政治號召之類則是文藝之外的。作者若是爲外來政治號召所吸引，這就是所謂「客觀精神的泛濫」，結果很難看到文藝家自己，自然是不行的。

而且他們認爲「階級是在活的個別的階級成員裏面」，「感性的世界又是活在人底『活的感性全活動』裏面的，這樣，人就成了具體的人，成了『感性的活動』。一個人是一個世界」（「論現實主義的路」）。於是文藝要是表現了一個人，表現了「感性的活動」，表現了「他的主觀的感性的要求」，就是表現了世界、就是表現了階級。這樣的理論固然不用說什麼描寫「典型情勢中的典型的性格」，也不用說什麼描寫工農兵了。這就是主觀論和現實主義相反的地方，也是和工農兵方向相反的地方。

文藝的反映現實生活的本質、規律是由於表現具體的人及其具體的生活（包括他的精神生活和精神鬥爭）；並滲透着作者的思想感情，以影響讀者的思想感情乃至於社會生活，於是文藝的任務是從事精神鬥爭，這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如上所述，文藝中的表現具體的人及其具體生活以至思想感情，主要是在於反映社會生活的本質、規律；而作品中的滲透着作者的思想感情，主要是在於正確地反映現實生活的本質、規律。因此文藝的進行精神鬥爭，就是以正確地表現的人物及其生活與思想感情，正確地反映的現實生活的本質、規律，叫讀者認識了這些，從而認識了他自己及其生活的現狀與前途，或者說應有的樣子，並且因此而感動、而憧憬，而戰鬥。於是文藝的進行精神鬥爭，就不單是要強調作者應有強烈的鬥爭精神，倒是首先應強調作者要有正確的思想、正確的觀點、正確的立場。作者要有強烈的鬥爭精神是對的，但是沒有正確的思想、觀點、立場作爲前提，那種強烈的鬥爭精神，不僅是無用的、而且是有害的。文藝的進行精神鬥爭，也不單是要強調表現對象的強烈的精神鬥爭，倒是首先應強調表現他的實際鬥爭。因爲讀者的理解作品中的人物，猶如理解實際生活中的人物一樣，不單是要看他的精神，更要看他的行爲，要看他在怎樣的生活環境中發生着怎樣的實際動作。精神鬥爭本來有它現實生活的根源，若是不表現這種精神鬥爭的現實生活的根源，只表現怎樣的精神鬥爭，讀者也就不了解他爲什麼有這種精神鬥爭，也就不容易引起什麼鬥爭精神。這又猶如不知道一個人爲什麼哭，而只知道他怎樣的哭，我們是不會哭的；不知道他爲什麼笑，而只知道他怎樣的笑，我們是不會笑的一樣。因此文藝的強調對象的精神鬥爭，而不強調他的社會鬥爭、階級鬥爭，同時也就是不強調他精神鬥爭的根源、基礎，這樣文藝的進行精神鬥爭，要收到應有的效果，是決不可能的。而這樣的理解文藝的精神鬥爭的任務，也是和現實主義的基本精神相反的。

本來文藝所進行的精神鬥爭，原可以說是社會鬥爭、階級鬥爭的一種表現；但是精神鬥爭並不是社會鬥爭、階級鬥爭的最主要的鬥爭形式，而政治鬥爭才是階級鬥爭、社會鬥爭的最主要的鬥爭形式，因此文藝的精神鬥爭得服從於政治鬥爭，而現實主義，就不是強調文藝的精神鬥爭的獨自性，相反的，強調文藝和政治鬥爭相結合，強調文藝爲政治鬥爭服務。由於現實主義的文藝的這種基本特點，我們得以要求文藝有明確的階級性和黨性。魯迅先生這位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他初期的思想認爲與其由身體方面醫治民族的衰弱，不如在精神方面醫治國民的痲木；與其苟安於形式上的「咸興維新」，不如奮勇地從精神上作啓蒙運動，他是以文藝爲政治服務，絲毫也沒有輕視政治鬥爭。更由他後期的寧可放棄原來適宜於描寫「活人的心理狀態」的小說，而主要從事於政論性的雜文，表現這種精神就更顯然了。

然而主觀論者的理論則是相反的，如上所述，他們認爲文藝要表現的精神鬥爭，並不要它有社會鬥爭、階級鬥爭的基礎；同樣文藝要進行的精神鬥爭，也不要有社會鬥爭、階級鬥爭的基礎。而且他們認爲政治號召會使文藝家看不見自己，因爲文藝鬥爭有着複雜的性質和曲折的過程，而特別是要表現「活的人——感性的活動」，「從他的『現實的生活過程』形成起來的心理狀態或精神鬥爭」。如果不能夠描寫這樣的一種心理狀態或精神鬥爭，而要表現政治事件，那就會只是複述着平庸的表面現象，沒有精神鬥爭的力量。而且認爲不描寫那種「心理狀態或精神鬥爭」，而反映政治鬥爭的文藝只是所謂「政治事件」的文藝，如果重視這種文藝就是「和尙主義」（「論現實主義的路」）。這種理論和現實主義者魯迅先生的道路，也是顯然相反的。

至於他們所要求表現的活人的心理狀態或戰鬥精神究竟是怎樣的呢？就有路翎的作品爲標準，誠然是注重描寫了心理狀態、戰鬥精神，然而那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歇斯特里性的善感易怒。由此也可以看出主觀論者的文藝理論，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這種精神的關係了。

關於蘇聯司法幹部的訓練

蘇聯法學專家　H·Г·蘇達里可夫

H·Г·蘇達里可夫是應聘來華的蘇聯法律專家，他是蘇聯科學院的候補院士。本文是他在今年六月中央政法委員會所召集的全國政法幹部訓練會議上的講話，對於蘇聯司法幹部的情況，作了很有系統的介紹，現在將它發表出來，對於我國正在進行着的司法改革運動，有着很大的現實意義。

——編　者

蘇聯法院和蘇聯檢察署，都是在十月革命以後，完全重新建立起來的。舊的沙皇法院連同舊的反動法制已被徹底地消滅了。

雖然，在蘇維埃政權的初期，根據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頒行的關於法院命令第一號，暫時仍命舊的法官留在原崗位上，但是事實告訴我們，其中大多數都是不願爲勞動人民的國家忠誠服務的，因此，很快就把他們從蘇維埃機關中驅逐出去了。當時祇是極少數願意爲蘇維埃政權忠誠服務的舊法律家才享有在法院工作的機會。當然，他們要受到監督，並且照例是担任技術性的次要職務。

因爲舊的法院被革命摧毀了，於是就發生了建立新的眞正的人民法院和新的眞正的人民法制的必要，這樣，也就提出了選拔和教育新的司法幹部的任務。

蘇聯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大胆地果斷地提拔了一批忠於革命事業和蘇維埃政權的工人、農民及其他勞動人民到新的司法機關。使勞動者親自參加審判工作的方針，是早在蘇維埃政權成立初期即已採用並一貫實行了的，而且直到今天仍然實行着。現在可以引用一些關於人民審判員成份的材料加以說明：從審判員的階級成份看來，在我國人民審判員中，工人和農民是佔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例如：到一九二八年七月一日爲止，蘇聯人民審判員的成份如下：

工人	佔百分之三六
農民	佔百分之三一
職員	佔百分之三三

到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爲止，則是：

工人	佔百分之五三·二
農民	佔百分之二五·八
職員	佔百分之二二

與吸收工農參與審判工作的同時，蘇維埃政府也提拔了大批婦女爲審判員。例如：在一九三一年，人民審判員中有百分之一八·五是婦女。而現在，婦女審判員的數目是大大增加了。

爲了從勞動者中間培養審判與檢察的工作人員和一般幹部，自蘇維埃政權成立最初幾年起，蘇聯便爲工農及其子女升入中等學校和高等學校（其中包括法律學校）創造了一切條件，這就有可能來解決由勞動人民當中培養新的審判與檢察幹部的任務。

由於工人與農民及其子女在沙皇的反動統治下，不可能受到中等教育，也就使他們升入高等學校感到困難，——因此蘇聯政府通過了一項在各高等學校裏附設工人學院的決議，這種工人學院是預備性質的學校，在這裏畢業之後，不經過考試就可以直接升入大學。

工人學院也有附設在高等法律學校裏的。它們起了極大的積極作用，使成千成萬的工人、農民及其子女有了受到高等教育的可能。

在蘇維埃政權成立之初，也曾廣泛地採用過訓練班的方式來訓練幹部。各部（各人民委員部）和各主管機關成立了爲期六個月到一年的各種短期訓練班，這種訓練班爲國家培養了大批幹部。由於高等學校與中等學校的大量發展，用訓練班訓練新幹部（尤其是領導幹部）的方式，雖然早先在蘇聯曾廣泛地發展過，而現在幾乎已不採用了。

在蘇維埃政權成立的初期，就開始將原先存在的培養高級司法幹部的制度予以根本改組。它將曾屬於各大學的法律系，改組爲兩種獨立的高等學校——蘇維埃高等建設學校與高等法律學校。

爲了使其接近於實際司法活動的任務起見，高等法律學校乃由教育人民委員部移歸司法人民委員部以後，改歸司法人民委員部管理，而蘇維埃高等建設學校則移歸中央執行委員會管理。

高等法律學校移歸司法人民委員部管理以後，起了很大的積極作用，並且

使培養高級司法幹部事業大大地予以擴充與改善了。還應當指出的，就是其他各高等學校也實行了專業化的方針，這些學校大部分已移歸有關的國家機關——人民委員部（現在稱部）管理。

從蘇維埃政權成立以來，雖然關於訓練司法幹部的方式和方法曾經有所變更，雖然法律學校的體制和隸屬關係也有所變更，但是必需指出，在所有這些年代裏，培養新司法幹部的工作始終沒有停止過一天。甚至在我國最艱難的時期如一九一八—二〇年的內戰時期和一九四一—四五年的偉大衛國戰爭時期，也沒有停止過這一工作。

我們着重指出這一情況的重要性，就是因爲有些人甚至有些得到高等學位的人主張說：由於蘇維埃政權已經確立和建立社會主義的總路綫已經制定，就無需進行法律教育及廣泛訓練司法幹部了，他們甚至主張國家本身連同法院、檢察署和其他的國家機關也將很快消亡下去了。這不祇是錯誤的見解，而且顯然也是有害的見解，因爲這種見解是想削弱我們的幹部，破壞蘇維埃國家機關的穩固性，從而也就動搖蘇維埃政權的穩固性。

蘇聯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無論過去和現在，曾經常不斷地指出：必須竭力鞏固和改進蘇維埃國家機關的一切紐帶，鞏固作爲鞏固勞動者政權之重要工具的蘇聯法院與檢察署，因而對那些培養熟練的和思想上有鍛鍊的蘇聯司法幹部的事業，也必須加以擴大和改善。

我們不想來研究蘇聯法律教育發展歷史上的各項問題，只想在下邊簡略地談一談目前蘇聯培養司法幹部的制度究竟是怎樣建立起來的。

在蘇聯，一切種類的高等教育，都得到了最廣闊的發展。

在下一新學年（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三年度），蘇聯各高等學校將招收新生三十七萬人，大約有九百所高等學校在工作着。在這些高等學校裏學習的，將有一百四十一萬六千個大學生和二萬四千個研究生。去年春季，我國各高等學校一共培植出來二十二萬青年專家和二千二百個科學工作者——科學博士和科學碩士。

培養新的高級熟練幹部的規模就是這樣。法律教育也屬於高等學校的整個體制之中，它是年復一年地發展着和改善着。現時在我國各個規模較大的大學裏，都設有法律系，其學習期間爲五年。在這些法律系裏培養着各方面的法律專家，不僅培養審判員和檢察員，而且也培養律師，法律顧問，國家監察工作人員，蘇維埃執行委員會法律處顧問等。

除了大學法律系之外，蘇聯還有專修法律的高等學校——即高等法律學校，在這種學校裏，主要是培養充任審判員、檢察員與偵查員的法律專家。這些學校的學習期限爲四年。在教學計劃上，高等法律學校關於國家和法律的歷史、國際關係的歷史和羅馬法等等科目的研習時間，較其他大學法律系爲少。

在莫斯科還設有高等函授專門學校——蘇聯高等函授法律學校，並在全國各大都市裏設有二十七所分校。單是在這一所函授學校裏學習的，就有一萬人以上。

由此可見，高級熟練的司法幹部，都是由大學法律系和專門的高等法律學校來培養的。這些學校都是招收十年制中學畢業的學生。

中級司法幹部，即法院執行員，法院書記員，公證工作人員，檢察機關的偵查員等——都是在中等專門學校——中等法律學校來培養的。這種法律學校都設在各最大的省會。它們的學習期限是二年，這種學校通常是招收受過普通中等教育的（即十年）、以及受過不完全中等教育（即七年）而在審判檢察機關作過實際工作的。所有這種法律學校，都附設有函授班，以組織法院、檢察署工作人員的函授學習，這些人員作過長期審判檢察工作，已有豐富的經驗，但過去却沒有受過法律教育。

除去這些培養高級的和中級的新司法幹部的學校之外，蘇聯還有使司法幹部深造，提高他們理論水平的學校。審判檢察工作，要求工作人員經常地提高業務水平，並要求對於審判實踐經常地作理論上的總結，司法幹部進修班，就是爲這個目的服務的。

在莫斯科設有審判檢察機關法律專家高級進修班。這些進修班的學習期限爲一年。在這種進修班裏學習的有：各加盟共和國及自治共和國最高法院院長及審判員、省法院院長及審判員、各共和國和邊區及省的檢察長及副檢察長。

審判檢察工作人員在這些進修班裏提高自己的理論知識，因爲他們過去雖已受過高等法律教育，但他們從高等學校畢業後已經過了七八年，大量的實際工作經驗，需要在理論上總結與提高。

除了高級進修班以外，還在八個最大的省城和邊區城市設有九個月的進修班。區人民審判員、區檢察員和偵查員在這些進修班裏來充實自己的理論知識，而這些人過去也受過高等或中等法律教育。

所有同一種類的法律學校，無論設在那裏，都是按照經中央核准的統一學習計劃和講授提綱進行工作。

由於法律教育如此廣泛的發展，我們國家絕大多數的審判員和檢察員都曾受過高等法律教育，其餘的，也都受過中等法律教育，並且具有大量的實際經驗。

廣大的法律學校網，要求着每年充實大批師資，蘇聯法律學校的師資是經過各法律系和高等法律學校的研究生來培養的。研究生制度就是把一部分最優秀的高等法律學校畢業生留下來，在各相當的教研室裏進行科學研究三年。

研究生在教研室進行科學研究期滿以後，應當參加碩士學位的考試，並提出法學碩士學位的論文。

現在法律學校的大多數教員，都獲有法學博士或法學碩士的學位和教授或講師的稱號。

法律科學研究工作的中心是：蘇聯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和蘇聯司法部附設的法律科學研究所。在這些科學研究機關裏，研究蘇維埃社會主義的法律科學問題，對審判和檢察實踐進行科學總結，爲高等和中等法律學校編纂教材和參考資料。

現時在蘇聯的法律學校和法律科學研究機關的體系就是這樣的。

這一切都表明蘇聯對於法律教育和法律科學的發展是如何重視。並且，這種發展是十分自然的、合於規律的。

現在我國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社會，我國人民在蘇聯共產黨的領導之下，正着手建設共產主義，但這絲毫也不是說，審判和檢察機關已經喪失其意義了，已完全無須有法律知識的幹部，而法律教育可以收縮了。

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一九四六年十月通過了一項非常重要的決定，即「關於擴充和改進全國法律教育」的決定，在這個決定裏，重新强調了培養司法幹部具有全國性的重大意義，並指出在蘇聯進一步鞏固法律教育和發展法律科學的具體辦法。同時，我們還可指出中央和黨的領導機關在一九四六年前後所頒佈的許多指示中，曾不斷指出審判檢察機關的重要意義，並着重指出鞏固法制和提高司法幹部理論與思想水平的意義。現在最大的注意力是集中於用一切方法來提高法院工作的質量。

我們的黨和政府爲什麼對於鞏固法院和檢察署，對於提高審判檢察工作人員的知識、文化、和理論思想水平如此關心呢？

首先，這是因爲法院和檢察署在蘇維埃政權存在的全部期間，始終是鞏固勞動人民政權與敵人作鬥爭的最鋒利的工具。法院和檢察署所負的使命，是與一切犯罪、各種違法行爲和資產階級的思想及資產階級餘毒的表現，作堅決的鬥爭，因爲這些東西阻礙我們實現偉大的共產主義建設計劃。法院和檢察署還和其他國家機關一起，同帝國主義國家派到我國來的間諜、軍事破壞分子、暗害分子、恐怖分子作堅決的鬥爭。

階級鬥爭的規律是這樣：隨着蘇聯共產主義建設的節節勝利，階級敵對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的反抗不是減少，而是加强和尖銳化。我們國內所殘存的階級敵對分子根據外國反動集團的指示而活動，企圖採取新而又新的方式來破壞我們國家和社會的制度，危害我們的國家和人民。因此我們的懲罰機關，也應該更加機巧、更加堅決地及時地揭發敵人的破壞活動、揭露犯罪的陰謀，予敵人以致命的打擊。我們不僅要根除犯罪，而且還要預防。

關於階級鬥爭的這種規律，斯大林同志曾經不斷地促使蘇聯人民注意。他在一九三九年聯共（布）黨第十八次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曾尖銳地駁斥了那些包括所謂「理論家」在內的某些人們，因爲他們進行着有害的空談，說什麼我們的國家和法律將要消亡，說這些東西很快就要放到古物陳列所去了。當時斯大林同志曾經這樣號召：必須盡力揭穿此種空談的危害性，因爲此種空談使我們解除武裝，並渙散我們的警惕性。他還指出，在資本主義國家包圍的條件下，就是進行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階段，我們的國家和法律還要保存着。

斯大林同志的這些指示，是進一步鞏固和改進國家機器一切環節的綱領，這中間，當然也包括法院和檢察署在內。

蘇維埃國家的審判檢察機構不僅要執行鎮壓階級異己分子和犯罪分子的任務，同時還是以新的、前進的、社會主義的守法精神來教育勞動羣衆的重要工具和手段。

列寧還在蘇維埃政權成立的初年，即在新的蘇維埃法院剛剛建立的時候，就說過這種任務是蘇維埃法院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在蘇維埃法院發展的各個階段上，教育任務始終是它的特徵。這種任務在一九三九年所通過的法院組織法上也曾特別予以指出。在這個法律上規定「蘇聯法院採取刑事懲罰辦法，不僅爲懲罰犯罪人，而且還具有矯正與改造犯人之目的」。法院以共全部活動教育蘇聯公民忠於祖國與社會主義事業，確切不移地遵行蘇維埃法律，愛護社會主義財產，遵守勞動紀律，誠懇履行國家的與社會的義務。

爲了有成效地執行這雙重的任務，就是鎮壓階級異己分子及犯罪分子的任務和以嚴格遵守法紀和紀律的精神教育全體蘇聯公民的任務，便要求每一個蘇聯審判員和檢察員具有很大的本領，熟悉黨和政府的政策及蘇維埃國家的一切法令，並且要有一定高度的文化水平。

由於我們國家社會主義建設在各方面的勝利，與犯罪作鬥爭的任務和教育羣衆的任務不是更加簡單，而是日益繁難，對於審判員、檢察員工作的要求不是減低，而是日益提高。

由帝國主義派入我國的敵對分子和其他腐敗的犯罪分子，由於他們活動的基地逐年逐月地被壓縮，因而他們進行破壞活動的方法也就越來越狠毒越狡猾了。敵人正採取各種新而又新的方法和手段以圖反抗，因此對這些敵對分子進行鬥爭，也更應熟練和提高警惕。

不僅偵查和審理刑事案件的任務是複雜化，就是民事法律糾紛的內容，也是顯著地趨於複雜了。隨着蘇聯公民法律意識的提高，對於民事法律糾紛的審理，也必須越來越精鍊細緻。

在實踐中運用自己知識的眞正技能和高度熟練，絕不僅是工程師、技師、醫生和農業家所需要的，就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審判員、檢察員、監察機關和公安機關的工作人員也同樣需要。所有這些國家機關的工作都是直接與人們有關係的，千百萬人民羣衆常常依據國家機關公務人員的工作如何來評價整個國家政權，來評價其法律是否公平，因此每一個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必須深刻地瞭解政府的政策，並且要正確地執行它。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還必須熟悉蘇維埃政權的法律，並且善於把它們運用到極複雜的和各種各樣的社會現象中去。把通常永遠具有抽象性、一般性的法律，運用到各種具體的生活現象中去。這不是技術性的工作，而是高度政治性的工作。因此，要求法院和檢察署的每一個工作人員，要善於及時地揭露和防止一切敵對的犯罪行爲，不論這些罪行是怎樣巧妙地僞裝掩蓋起來的，不論敵人是怎樣狡猾地企圖逃避罪責的。

每一個蘇聯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不僅應該知道他是爲誰服務，他是人民的勤務員，並且還應該知道他應該怎樣爲人民服務才能使自己的活動對人民羣衆最有益、最有效用。

在我國，就是本着對蘇聯國家機構每一環節及其每個工作人員的這些不斷增長的要求，來進行選拔培養和訓練司法幹部的事業。

在我們蘇聯，中學畢業的青年們對於研究法律有着很大的興趣。這一點可由志願報名入大學法律系和高等法律學校的人數予以證明。根據往年的經驗，高等法律學校的每一個空額通常總有四、五個人報名。審判——檢察機關的實際工作，也享有同樣的聲譽和威望。這些工作，被視爲極其重要的國家建設工作之一。蘇聯的人民審判員和檢察員受到人民最高的信任，蘇聯憲法賦予他們以廣泛的權利和職能，同時也使他們肩負很重大的責任。因此，審判——檢察工作，能給予獻身這種工作的每一個人以深刻的充分的精神上的滿足。

政治經濟學批判之導論（下）

馬克思原著　郭大力譯

三　政治經濟學的方法

我們從政治經濟方面考察某一個國家時，我們會由它的人口，他們在階級間的分佈，在城市、農村、海上的分佈，在各不同生產部門間的分佈，輸出與輸入，年生產與年消費，物價等等着手。用現實前提中的現實事項與具體事項開始，例如在經濟學上，用人口——那是全社會生產行爲的基礎和主體——開始，好像是正確的。不過，更精密地考察一下，那就證明了是錯誤的。例如，如果我把人口由以構成的階級丟開，人口就是一個抽象。階級也是一個空洞的字，如果我不認識形成階級基礎的各種要素，例如工資勞動，資本等等。而這些又把交換、分工、價格等等當作前提。例如，沒有工資勞動，沒有價值、貨幣、價格等等，就不會有資本。所以，假設我是用人口開始罷，那是一個混沌的關於全體的觀念；由於更精密的規定，我才分析地愈益得到更簡單的概念，而由觀念上的具體物，進到愈益微妙的抽象物，以至得到各種最簡單的規定。從這裏，再回頭走，最後再進到人口，不過這時那已經不是一個混沌的關於全體的觀念，而是一個包含多種規定和關係、並有豐富內容的全體了。第一條路是經濟學在它的成立過程中歷史地採取過的道路。例如十七世紀的經濟學家，總是用活着的全體，人口、民族、國家，多數國家等等開始，但總是這樣做結局，即由分析，找出一些有規定作用的、抽象的、一般的關係，如分工、貨幣、價值等等。這些個別要素或多或少地固定下來，抽象出來以後，由像勞動、分工、需要、交換價值那樣簡單的事項，一直上升到國家、各國貿易、和世界市場的經濟學體系就開始了。後一個方法，顯然是科學上正確的方法。具體物是具體的，因爲它是多數規定的總結，從而是複雜物的統一。在思想上，那是表現爲總結的過程，爲結果，而不是表現爲出發點，雖然它是現實的出發點，從而也是直觀和觀念的出發點。照第一條路，是完全的觀念被分解爲抽象的規定；照第二條路，就是由抽象的規定，引出具體物在思惟中的再生產。黑格爾曾因此陷入錯覺，以致把現實界當作會自行總結、自行深刻化、自行運動的思惟的結果來理解，實則由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只是思惟的方法，只是佔有（aneignen）具體物，在精神上把它當作一個具體物來再生產的方法。那無論如何不是具體物自己的發生過程。最簡單的經濟範疇，譬如交換價值，就是以人口，在一定關係內從事生產的人口爲前提，也以某種家族、共同體、或國家等等爲前提。除了當作一個已經給與的具體的和活着的全體之抽象的片面的關係，決不可能有什麼交換價值存在。

但當作範疇，交換價值包含有一個洪水期前的存在。哲學的意識既然是這樣規定的，以致在它看來，理解着的思惟才是現實的人，被理解的世界才是現

實的世界，所以，對於意識，範疇的運動就表現爲現實的生產行爲——可惜只有從外部受到刺激——而以世界爲其結果了。並且，這是正確的（不過在這裏，我們又是有了一個同義異語），如果具體的總體，當作思惟的總體，當作思惟具體物，實際上是思惟、理解的產物；但又決不是在直觀和觀念之外或在其上進行思惟並且會自行生出什麼的概念的產物，而只是直觀和觀念成爲概念的加工。全體，在它是在頭腦中表現爲思惟的全體時，就是思惟的頭腦的一個產物。這個思惟的頭腦，會依照它唯一可能的方法來把世界佔有，和美術地‖宗教地‖實踐地‖精神地佔有這個世界是不同的。現實的主體，依然在頭腦之外，有它的獨立存在——頭腦不過思辨地，理論地活動者。所以，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方法上，主體、社會、必須要當作前提不斷在觀念中浮現出來。

但是，這些簡單的範疇，不是在各種比較具體的範疇之前，也有獨立的歷史的或自然的存在麼？這種情形是有的。例如，黑格爾就正確地，用佔有，當作主體最簡單的法律關係，來開始他的法律哲學。是的，在有家族或支配服從關係——更具體得多的關係——前，是沒有佔有的。不過，要是說有種家族或氏族全體還只有佔有，沒有所有權，却多分是正確的。這個較簡單的範疇，因此，就表現爲簡單的家族或氏族社會在所有權關係上的關係了。在早期社會內，它是表現爲一個發展了的有機體的比較簡單的關係，但比較具體的基礎——佔有就是它的關係——總是當作前提。我們可以想像一個個別的未開化人也會佔有。不過，這時候，佔有就不是什麼法律關係。說佔有歷史地發展成爲家族，是不對的。佔有總是以「更具體的法律範疇」作爲假定。無論如何，簡單的範疇，總是比較更不發展的具體物還沒有安上具體範疇精神地表現出來的多面聯系或多面關係時所藉以實現的各種關係的表現，而更發展的具體物，又總是把這些範疇當作次要的關係保持着。

在有資本存在以前，有銀行存在以前，有工資勞動等等存在以前，貨幣是能夠存在的，並且已經歷史地存在了。所以，從這方面看，可以說，比較簡單的範疇，能夠把各種在一個比較更不發展的全體裏面起支配作用的關係，表現出來。〔這各種關係，〕在全體向一個更具體的範疇所表現的方向發展以前，就已經歷史地存在了。在這限度內，由最簡單向複雜上昇的抽象思惟法則，是與現實的歷史過程相符合的。

另一方面，又可以說，有某種極其發展但歷史地說是更不成熟的社會形態，在其內，比方說，已經有協作、發展的分工等等最高的經濟形式發生，但還沒有貨幣，例如秘魯。

就斯拉夫族的公社組織說，貨幣與引起貨幣的交換，在個別公社內，也還沒有或很少出現，却不過在交界的地方，在它和別的公社的交易上出現。把交換當作原始的構成要素，安到公社上面去，一般說是錯誤的。開始的時候，交換就更不是發生在同一公社內各個成員間，而更加是發生在不同諸公社的關係上。並且：雖然貨幣很早就起着作用並且全面起着作用，但在古代，它也不過在某一些片面規定的民族，商業民族，才當作支配的要素出現；甚至在最開化的古代民族，例如在希臘人、羅馬人間，它的完全發展，近代資產階級社會當作前提的事情，也只出現在它們走向沒落的時期。所以，這個非常簡單的範疇，在社會最發展的狀態中，歷史地說，方才帶着完全的內容表現出來。決不是一切的經濟關係都是永遠存在的；例如，在羅馬帝國最發展的時期，實物稅和實物供應就依然是基礎。在那裏，貨幣制度，嚴格說只在軍隊裏面才已經完全發展，未曾掌握工作的全部。

所以，雖然簡單的範疇，歷史地說，可以在比較具體的範疇以前已經存在，但它的完全的內部的和外部的發展，只能屬於複合的社會形態；而比較具體的範疇却已經在一個更不發展的社會形態內完全發展了。

勞動是一個十分簡單的範疇。勞動的觀念，在這個一般性上——當作勞動一般——也是極古老的。但經濟學在這個簡單性上理解的「勞動」，也是一個近代的範疇，和這個簡單的抽象由以生出的各種關係一樣。例如，貨幣主義就還是完全客觀地，把財富當作是在貨幣上出現的東西。和這個觀點相反，工業主義或商業主義把財富的源泉，由對象物移到主觀的活動——商業的和工業的勞動——上面時，是一個大的進步。但這種活動自身，還只是在這個有限性上，當作賺錢的活動來理解。和這個體系相反的重農主義㊃四，則把勞動這一種確定的形態——農業——當作創造財富的東西來理解，並且對象物自身也不再在貨幣的假裝中，但當作生產物一般，當作勞動的一般結果來理解。但這個生產物，適合於活動的有限性，總只是自然規定的生產物，是農業所生產的，特別是土地所生產的。亞當•斯密有一個異常大的進步；他拋去了生產財富的活動的各種限定性——而單是說勞動，不說工業勞動，不說商業勞動，也不說農業勞動。不說這個，也不說那個。有了創造財富的活動之抽象的一般性，我們也就有了當作財富來定義的對象物的一般性，有了生產物一般，或者說也有了勞動一般，不過是當作過去的對象化了的勞動。這個進步是困難的並且是巨大的，這可由下述一點看出：亞當•斯密自己也時時回到重農主義體系去。看起來，好像由此發現的，只是最簡單最原始的關係的抽象表現，在這種關係內，人不問是在什麼社會形態內，總是以生產者的資格出現。從一方面說，那是對

㊃四 考茨基版在這下面補上幾個字：「是更向前的一個進步」，用括弧括着。——譯者。

的。從另一方面說，那不是對的。

要把一定種類的勞動視爲一樣，就要各種現實的勞動，已經形成一個非常發展的總和，在其中，再沒有任何一種，對於一切是佔統治地位的。所以，最總括性的抽象，一般要在有最豐富的具體發展，其中有一點爲許多事所相同，一切事所共有的地方，方才會發生。要這樣，它才不能只在特殊的形式上被思考。另一方面，勞動一般這個抽象，又只是勞動一個具體總和的結果。把各種一定的勞動視爲一樣的看法，是適合於各個人都容易由一種勞動轉到別種勞動，勞動的種類對於他只是偶然從而也是一樣的社會形態。在這裏，勞動不只在範疇上，並且在現實上，也已經成爲創造財富一般的手段，而不再在一個特殊性上，當作規定，和個人結合在一起了。這樣一種狀態，在資產階級社會最近代的存在形態北美合衆國內，是最發展的。而「勞動」範疇的抽象，「勞動一般」，無限制的勞動，近代經濟學的出發點，也在這裏方才實踐地成爲眞實的。這個最單純的抽象——近代經濟學把它放在最高點，把它表現爲一種自古已有、對一切社會形態都適用的關係——也只是在這種抽象中，當作最近代社會的範疇，方才表現爲實際上眞實的。人們也許會說，在北美合衆國當作歷史的產物出現的東西——把一定的勞動視爲一樣——比方說，對於俄羅斯人，——就表現爲自然發生的素質。不過，野蠻人有在一切上面被使用的素質，和文明人會把自己用到一切上面去，其間有可怕的區別。並且，就俄國人來說，和這種把勞動性質視爲一樣的情形相適應，還實際上有傳統地固守着限定一種勞動的狀態；他們從這種狀態脫離，只是由於外來的影響。

這個勞動的例，適切地指出了，各種最抽象的範疇，儘管因爲是抽象的，所以，對於一切時期是適用的，但甚至在這個抽象的規定性上，它們也還是各種歷史關係的產物，它們也只對這各種關係，並且在這各種關係內，方才是完全適用的。

資產階級社會是歷史上最發展最複雜的生產組織。表示它的關係的範疇，它的制度（Gliederung）的理解，同時就引起了對於一切過去社會形態的制度和生產關係的認識。資產階級社會，就是建立在這些過去社會形態的碎片和元素上面的，在它裏面，一方面還有過去社會的未被克服的殘餘在蠕行着，另一方面，某一些單純隱藏着的東西，則已經發展成爲十分明顯的東西。人的解剖，對於猿的解剖，是一把鑰匙。但低等動物對於高等動物所暗示的東西，要到高等動物被認識的時候，方才是可以理解的。資產階級經濟，爲古代經濟等等提供了一把鑰匙。但這決不是照經濟學家們的方法做的，因爲他們抹殺一切歷史的區別，把一切社會形態看爲都是資產階級的社會形態。我們認識地租的時候，我們就能夠認識進貢制度和什一稅等等。但我們決不要把它們看爲是一樣的東西。

並且，因爲資產階級社會只是一個包含着對立性的發展形態，所以，以前各種形態的關係，往往不過十分萎縮地或完全變形地出現在它裏面。例如共有權。所以，就令資產階級經濟的範疇，眞的對於其他一切社會形態都是眞的，那也只有在適當斟酌以後才可以接受。資產階級社會能夠在這各種關係已經發展，或已經萎縮，或已經改頭換面的情形下包含着它們，但其中總有本質上的區別。所謂歷史發展，一般是以這件事爲基礎：最後的形態，把過去各種形態當作它自己的階段來看，總是片面地去理解它們，因爲它很少能夠，並且要在完全限定的條件下面方才能夠進行去批評自己——這裏說的，當然不是這樣的本來就是當作衰亡時期出現的歷史時期。基督教要在它的自我批評已經在一定程度內成熟，主動化以後，對於以前各種神話的客觀理解，方才能有所幫助。資產階級經濟學，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自我批評開始時，方才來理解封建的，古代的，東方的社會。只要資產階級經濟學不會神話化到這個程度，以致把自己看爲純然與過去相一致，它對於前期的，特別是封建的〔社會〕——它還直接要和它作鬥爭——的批評，就和基督教對於異教的批評，布洛推斯坦教對於加特力教的批評，是相似的。

總之，在經濟範疇的進程上面，像在每一種歷史的社會科學上面一樣，應當牢牢記着：像在現實上一樣，在頭腦中，主體——這裏就是近代資產階級社會——是已經給予；所以，各種範疇，總是表現着這個限定了的社會、這個主體的存在形態，存在規定性，並且，屢屢只是它的個別方面；並且，「經濟學」科學地說，決不是在它以這個資格現在成爲問題的地方才開始。要牢牢記着這點，因爲這件事對於如何分篇的問題，直接有決定的重要性。

例如，好像從地租開始，從土地所有權開始，是再合乎自然沒有的了，因爲那是和土地，一切生產和存在的源泉，結合在一起的，和一切多少定居的社會的最初生產形態（農業）結合在一起的。但要是這樣做，那就是再錯誤沒有的。在一切社會形態中，都有某種生產，對一切生產居優越地位，從而，它的關係，對於一切其他，會起決定作用和影響。㊅㊄ 有一種普遍的光，在其內浸着一切別的顏色；它就按照它們的特殊性，使它們發生變化。有一種特殊的以太，一切在其中成立的存在物的比重，都由它規定。

讓我們拿畜牧民族來做例（單純的獵獸民族或捕魚民族，是在現實發展的開始點以外）。在他們中間，有某種耕作形態出現了，不過還是零星地出現。土地所有權就是由此規定的。那是共有的；在這個民族還多少固守於他們的傳

㊅㊄　考茨基版在這裏分了段。——譯者。

統時，這個形態也會跟着或多或少地保持下去。斯拉夫族的土地所有權，就是例子。在古代社會封建社會那樣有農業佔統治地位的定居農業民族——定居已經是一個大進步——工業、工業組織、和適合於它的所有權形態，都多少有土地所有權的性質；〔社會〕或是像古代羅馬一樣全然依靠農業；或是像中世紀一樣，在城市，在城市的各種關係上面，模仿着農村的組織。資本自身——只要不是純粹的貨幣資本——在中世紀，當作傳統的手工器具等等，也有土地所有權的性質。

資產階級社會內的情形，是相反的。農業是愈益變成一個單純的產業部門，而完全由資本去支配。地租也是如此。在土地所有權支配着的一切形態內，自然關係還是佔優勢的。但在資本支配着的地方，社會的、歷史創造的要素，就成了主要的。沒有資本，地租是不能理解的；但沒有地租，資本還是一樣可以理解。資本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支配着一切的經濟力量。它必須是出發點和終結點，要在土地所有權以前被說明。而在二者都已分別考察之後，又必須考察它們的相互關係。

要讓各個經濟範疇依照它們在歷史上成爲決定事項的次序來排列，也許是做不到的，錯誤的。它們的次序，要由它們在近代資產階級社會相互持有的關係來決定。那正好和像似符合自然或符合歷史發展程序的關係相反。這裏要問的，不是各種經濟關係在不同各種社會形態的繼起序列中，歷史地，佔有怎樣的地位。更不是它們「在觀念中」的次序（蒲魯東 Proudhon），那不過是一種關於歷史運動的糊塗觀念。這裏要問的，只是它們在近代資產階級社會內的位置。

商業民族——腓尼基人，迦太基人——在古代世界所表現的純粹性（抽象的規定性），正是由農業民族的統治地位給予的。資本，正是在資本還不是社會支配要素的抽象中，表現爲商業資本或貨幣資本。隆巴特人，猶太人，對於中世紀經營農業的社會，是佔有相同的位置的。

如下一點，可以作爲進一步的例，來說明相同的範疇，會在不同的社會階段佔有不同的位置：資產階級社會的最後形態之一，股份公司，當初也是當作享有特權和獨佔權的大商業公司出現的。

國民財富的概念，是照這樣的方法，鑽進十七世紀經濟學家腦中的——這個觀念，在十八世紀經濟學家腦中，還是部分地繼續下去：——財富只是爲國家而創造，但國家強弱是與這種財富成比例。財富自身和財富的生產，就是在這個不自覺的騙人的形態上，當作近代國家的目的來宣告，而近代國家也只是當作財富生產的手段來看。

顯然應當這樣分篇：起先是一般的抽象的規定，它們是在以上解說過的意義上，或多或少地，爲一切的社會形態所有。第二，是這些範疇；它們構成資產階級社會的內部組織，並且各個基本階級就是站立在它們上面。資本；工資勞動；土地所有權。它們的相互關係。城市和農村。社會上三個大階級。他們間的交換。流通。信用制度（私的）。第三，是資產階級社會在國家形態上的總結：就其自身來考察。「不生產的」階級。課稅。國債。公的信用。人口。殖民地。移民。第四，是生產的國際關係。國際分工。國際交換。輸出與輸入。匯兌。第五，是世界市場與危機。

四　生產，生產資料，與生產關係。生產關係與交換關係。就生產關係與交換關係看到的國家形態與所有權形態。法律關係。家族關係。

關於要在這裏說到而不能忘記的各點，附帶提出摘要如下：

（一）戰爭比和平是更早展開的：怎樣由於戰爭，某一些經濟關係，如工資勞動，機器等等，在軍隊等等裏面，是比在市民社會內部，發展得更早。生產力和各種交換關係的關係，也特別明白地可以在軍隊裏面看出。

（二）歷來唯心論的歷史記述和現實歷史的關係。特別是所謂文化史，古代宗教史，和國家史。

就這個機會，可以說一說歷來各種不同的歷史記述方法。所謂客觀的。主觀的。（道德的與其他等等的）。哲學的。

（三）第二義的與第三義的。一般說是各種派生的，轉化的，不是原始的生產關係。這裏〔要考察〕各種國際關係的影響。

（四）關於這種見解的唯物論所提出的各種責難。對自然主義唯物論的關係。

（五）關於生產力（生產資料）和生產關係這兩個概念的辯證法，一個要確定它們的限界但不廢止現實區別的辯證法。

（六）物質生產的發展例如對藝術生產的不平衡關係。一般說，進步的概念，是不能在普通的抽象中把握。藝術等等上面的這種不平衡，沒有政治社會關係內的不平衡那樣重要而難於理解，例如北美合衆國對歐洲的文化關係。但眞正困難的點，要在這裏說明的是：各種生產關係當作法律關係怎樣會有不平衡的發展。例如羅馬私法對現代生產的關係。（就刑法和公法說，情形就更不是如此）。

（七）這種見解是表現爲必然的發展。但承認偶然。雜述（自由及其

他）。（交通工具的作用）。世界史不是常常存在的；當作世界史的歷史是結果㊀㊁。

（八）出發點當然是自然規定性；主觀的和客觀的，種族，人種等等。

關於藝術，大家承認，它的某一些繁盛時期，決不是與社會的一般發展相比例，從而，也不是與物質基礎即社會組織的骨骼系統的發展相比例。例如可以拿希臘人，乃至涉士比亞，來和近代人比較。拿某一些藝術形態，例如史詩來說，可以說誰都承認，只要藝術生產是當作藝術生產來做，它們就會永遠不能在它們的劃分世界時期的古典形式上被生產出來；在藝術範圍內，某一些重要的藝術形式，也只有在藝術發展中一個未發展的階段，方才是可能的。如果藝術範圍內各種不同藝術的關係已經如此，整個藝術範圍對社會一般發展的關係會是如此，就更加不令人驚異了。困難只在對於這各種矛盾的一般的理解。只要它們詳細被列舉出來了，它們就已經被說明白了。例如，我們可以拿希臘藝術對現代的關係，然後拿涉士比亞對現代的關係來說。大家承認，希臘神話不僅是希臘藝術的寶庫，並且也是它的園地。對於希臘人的幻想，從而對於希臘人（的藝術）當作基礎的關於自然和社會關係的看法，和自動織布機，鐵路，火車，和電報，有可能結合在一起麼？對著洛伯德公司，「烏爾剛」（Vulkan）有存在餘地麼？對著避雷針，「鳩庇特」（Jupiter）有存在餘地麼？對著動產信用（Credit mobilier），「赫爾麥士」（Hermes）有存在餘地麼？一切神話，都是在想像中，通過想像，來征服自然力，支配它，把它形像化的。所以，有了對於自然力的現實的支配，一切神話就只好跟著消滅了。在印字房方形廣場旁邊，華馬（Fama）神成了什麼呢？希臘藝術是把希臘神話當作前提的。那就是說，自然和社會形態，已經通過民衆幻想，依一種不自覺的藝術的方式，被加工過了。這就是希臘藝術的材料。當然，並不是任何一種神話都是，也不是任何一種不自覺的對於自然（這裏包括著一切客觀的事物，所以社會也包括在內）的藝術加工都是。埃及的神話就不能是希臘藝術的園地或母胎。但無論如何是一個神話。所以，決不是這樣一種社會發展，那種社會發展會把一切對於自然的神話化關係排除掉，從而，會要求藝術家有一種和神話無關的幻想。

另一方面：「亞基爾士」（Achilles）可能和火藥子彈結合在一起麼？或者一般說，伊里亞德（Iliad）可能和印刷廠及印刷機在一起麼？詩歌傳奇和文藝女神，不是必然會跟著排字架消滅，從而史詩的必要條件也必然會跟著消滅麼？

但困難還不在於，應怎樣去瞭解，希臘的藝術和史詩怎樣會和一定的社會發展形態結合在一起。困難是在於：它們對於我們還會給與藝術的享受，並且在一定的關係上，還是當作規範和不可及的模本。

一個成人不能再變成兒童，除非他變得兒稚氣。但是，兒童的天眞樸素不是還使他喜悅麼？他不是總是要在一個更高的階段，把兒童的眞實性再生產出來麼？不是在每一個時期，在兒童天性中，都有它的特有的性格，在它的自然眞實性中復活着麼？爲什麼人性最美麗地展開的社會幼年時期，不應當當作一去不返的時期，發出永久的魅力呢？世間有一些沒有教養的和早熟的兒童。有許多古代民族是屬於這一個範疇。希臘人却是正常的兒童。他們的藝術對我們所有的魅力，和它由以生長的未發展社會時期，是並不矛盾的，却寧可說是它的結果，寧可說是不可分離地和這件事結合在一起：希臘藝術在其中成立並且只能在其中成立的未成熟的社會條件，是一去不能復返了。〔原稿中斷〕。

㊀㊁ 考茨基版這一句是：「世界史在歷史上本來不當是當作世界史（性質）的結果」。——譯者。

蘇聯大量出版有關我國的書籍

蘇聯人民一直關心中國的文學作品。從蘇維埃政權建立以來，蘇聯以十六種民族語言印行的我國三十二個作家的著作，共達四百三十餘萬册。爲了滿足蘇聯人民的要求，莫斯科近來出版了我國九位作家的短篇小說集十五萬册。莫斯科文藝出版局還準備印行魯迅選集和魯迅作品的四卷集。「三國演義」的俄文譯本也即將出版。

同時，蘇聯科學家們研究中國的語文和歷史，也獲得了卓越的成果。蘇聯歷來最大的一部包括九千漢字的「中俄辭典」正由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準備出版中。東方學研究所還準備出版該所的會報「中國選集」。蘇聯的漢學家們正在把許多以斯大林語言學的觀點來討論中國語言問題的文章編成一部專集。

蘇聯大批科學家獲得學位和教授稱號

蘇聯高等教育部總結了過去一學年授與科學學位和稱號的結果。大約五百個人得到了科學博士學位。絕大多數的論文是工藝、醫學、生物學、物理數學和農業科學方面的。

四百八十四位科學家得到了教授的稱號，二千一百九十五位科學家得到了講師的稱號，七百五十二個人得到了先進科學工作者的稱號。在榮膺科學學位或稱號的人們中，差不多蘇聯各民族的人民都有。

評介幾種米丘林學說的主要著作

葉篤莊

米丘林選集	華北農業科學研究所譯	人民出版社出版	五二四頁　定價六萬元
米丘林遺傳學原理	沃羅比耶夫著　傅子禎譯	中華書局出版	三一四頁　定價一萬六千元
農業生物學	李森科著　農業生物科學研究室譯	新農出版社出版	五五六頁　定價六萬五千元
農業原理	威廉士原著　奚元齡重譯	新農出版社出版	一八六頁　定價一萬二千元
大地花開	薩方諾夫原著　陳燕孫重譯	新農出版社出版	三九七頁　定價二萬六千元

一

生物科學是研究生物界發展規律的科學。我們之所以要掌握生物界的發展規律，是爲了在農業實踐上指導植物、動物乃至於微生物向着有利於人類的方向去發展。

生物科學在它的發展過程中，是經歷着尖銳的思想鬥爭的。在這裏表現了唯物論反對唯心論、科學反對玄學的鬥爭；而這種鬥爭乃是階級鬥爭的表現和反映。

今天，生物科學有兩個不可調和的方向，一個是前進的、唯物的米丘林方向，一個是反動的、唯心的孟德爾—摩爾根方向。這兩個方向的鬥爭是圍繞着生物學上的一個老問題而進行的：即是植物和動物在發育過程中所獲得的性狀是否可以遺傳，植物和動物的本性變化是否決定於它們的生活條件。

米丘林方向的工作者們主張：有機體在它們發育過程中所獲得的性狀，可以而且必須遺傳，因此他們把生物科學變成爲能夠主動地、有定向地支配植物和動物的武器，日新月異地爲人類謀福利。而孟德爾—摩爾根方向的代表者們，則以基因學說反對有機體本性的變化是決定於它們生活條件的，當然他們也否認有機體的獲得性可以遺傳；所以在他們的試驗研究中，便充滿了果蠅的染色體，「使耳朵搧動的能力」等把戲。

但是，在這一鬥爭中，無可爭辯地米丘林學說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它宣佈了孟德爾—摩爾根學說的死刑。當然，這就大大地激怒了資產階級的所謂「正統派的遺傳學者」們，在這一偉大的眞理面前，他們只有卑鄙地玩弄那一套資產階級所慣用的手法—造假試驗紀錄、謾罵……乃至於偷竊。

另一方面，還有一些人，在無數事實的證明之下，不敢公然反對米丘林學說，便企圖調和這一鬥爭；本質上還是爲了舊遺傳學的「復辟」。這一類人在國外並不少，在我們國內也未嘗沒有。如張宗炳教授在「蘇聯的新遺傳學」（羣衆書店出版，八八頁）一書的序言裏曾經寫道：「新遺傳學一定有眞理，舊遺傳學也並非全是錯的，蘇聯生物學家斯托列托夫來這裏講演過一次，大致意見也是如此。」（我也聽過斯托列托夫的講演，我却沒有聽到他講過這樣的話。）又說：「我們的態度也不應太過份，認爲一切眞理全在新遺傳學，而舊遺傳學是完全反動的根本不能要的。」像這種不正確的和有害的思想情況，在目前我們的生物學界裏還佔有一定的地位，這是值得我們警惕的！

不管怎樣，在這一鬥爭裏，舊的必將死亡，並且正趨死亡；新的必將成長，並且正在成長。

二

「人類能夠而且應該比自然更好地創造出新的植物品種。」

「我們不能等待自然的恩賜，向自然爭取才是我們的任務。」

這就是偉大科學家米丘林的基本工作態度。米丘林在開始他的事業的時候，就爲自己提出了一個勇敢的任務，就是有定向地改變植物的本性—把南方的果樹推廣到北方去。

但是，米丘林在沙皇時代的工作道路並不是平坦的。關於這一段經歷，他寫道：「在革命以前我的全部道路上鋪滿了嘲笑、忽視和輕蔑。」「在革命以前，我一再被無知之徒的非議所輕蔑，他們說我的一切工作都是無用的，只不過是『幻想』和『胡鬧』而已。農業部的官吏向我叫囂說：『你胆敢胡來！』官方科學家們宣稱我所培育的雜種不合理。僧侶們恫嚇我『不要犯褻瀆神靈之罪！不要把上帝的花園變爲妓院』！」

然而米丘林却不顧一切，爲實現他的目的，奮鬥到底。

在一九一一——一九一三年之間，美國農業部知道了米丘林的卓越工作成就和經濟困難的情形之後，曾數次以金元誘惑他去美國，甚至答應給他一隻汽輪作爲搬家之用。但是米丘林嚴肅地予以拒絕了。一年三萬二千美元的薪給並不能動搖米丘林對於祖國的無限熱愛和爲祖國人民服務的堅强意志。

十月革命成功之後，首先注意到米丘林工作的就是列寧，蘇維埃政府在成立最初的幾個月內，就開始給予米丘林以必要的補助。加里寧主席曾二次參觀他的園場。當米丘林科學活動的六十週年紀念日，斯大林還曾馳電致賀。

米丘林在蘇維埃政權下又工作了十三年，這十三年是他一生當中最有意義的時期，蘇維埃政權保證了他的工作順利開展、飛躍前進。他曾寫道：「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現已給了我所需要的一切——一個從事試驗工作的人爲他的工作所期望的一切。」

在「米丘林選集」的第一部份——「自傳資料」裏充分表達了上述的一切。「米丘林選集」的第二部份——「原理和方法」，是全書中的重要的一部份，其中包括「四十七年工作總結」和「六十年工作總結」二主要部份。在這裏叙述了：對於孟德爾定律的批判；環境條件對於雜種的影響；獲得性的可以遺傳；雜種苗木的選擇；種內雜交；遠緣雜交（種間和屬間雜交）；無性雜交；預先無性接近法；蒙導法；媒介法；混合授粉法；……。

該書的第三部份爲「米丘林品種的培育程序和菓樹學的描述」，這也是很重要的一部份，具體地叙述了米丘林品種的育成過程。其中有蘋果（二七個品種）、梨（七個品種）、榅桲（一個品種）、唐棣（一個品種）、花楸（五個品種）、酸櫻桃（一一個品種）、賽拉帕都斯櫻桃（三個品種）、甜櫻桃（三個品種）、李（七個品種）、杏（五個品種）、扁桃（一個品種）、小菓類（五個品種）、葡萄（一個品種）、獼猴桃（五個品種）。當然這只是米丘林品種的一部份，他自己所創造的，大約有三百個菓樹新品種。

全書最後的一部份爲「雜文」，共有十八篇。從這些文章裏，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米丘林研究工作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他說：「唯有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學說的基礎之上，科學才能得到充分的改造。」「只有無產階級才能持久地和主動地去影響和改造大自然。」從他寫給工人、青年、兒童的幾篇文章裏，更可以知道米丘林對於祖國和蘇維埃政權的熱愛，和他對於青年和兒童的循循教導。

讀過全書之後，使我們深深感到，米丘林學說之所以在科學歷史上創造了劃時代的豐功偉績，是因爲社會主義制度爲它的發展創造了一切必要的條件；是因爲米丘林嚴肅地執行了科學導師斯大林的指示：「不要和人民隔絕起來，不要把自己保持得距離人民太遠；而要準備爲人民服務，準備把一切的科學提供給人民，科學爲人民服務，不是强迫地，而是自願地，熱心地。」（斯大林：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七日在克里姆林宮接見高等教育工作者時的講話。）

「米丘林選集」中譯本第一版是一九五一年八月出版的，目前在訂正再版中。爲了更深入地體會和瞭解這一科學巨著，似可先行閱讀以下各書。

一、「米丘林遺傳學原理」——本書有系統地叙述了米丘林學說的基本理論；全書以遺傳學發展簡史開始，然後有步驟地介紹了遺傳及其變異的概念，植物的個體發育，遺傳性在生活條件影響下的變化，遺傳及其變異與植物生殖的關係，雜交下的遺傳及其變異，無性雜交，最後以「米丘林學說的勝利」一節終結。全書結構謹嚴，取材豐富而簡鍊，條理清楚易讀，應當是初學者必讀的一本好書。

但葛羅施維斯基曾在俄文雜誌「自然」（一九五一年九月號）對本書有所評論，指出其中一些缺點，譯文見「中國植物學雜誌」第六卷第四期，詳細內容不再多贅。然而批評者的結論，還是肯定了本書的價值：「這本書總不失爲以相當通俗的和科學的手法來介紹米丘林遺傳學原理的第一部嘗試著作。」

二、「米丘林育種方法圖說」（周邦立譯，商務印書館出版）——本書附有彩色圖表，在蘇聯是爲中學九年級的學生學習「達爾文主義基本原理」時用的。其主要特點爲作者用了清楚的語句、簡短的篇幅，概要地叙述了米丘林育種方法的全貌；除舉出實例外，在育種原理方面也有簡要的叙述。此外復配以彩色圖表，更可以幫助讀者的理解。但譯文不妥之處較多，斯銓同志在「農業科學通訊」一九五二年第七期裏，對此書譯文曾有所評論。

另一譯本是由北京農業大學俄文翻譯室翻譯的（中華書局出版），對照閱讀之下，這個譯本似覺忠實而流暢，但美中不足的是沒有附上彩色掛圖。

三、「植物無性雜交的理論與實踐」（日查維津著，梓丁、奮炎譯，一五八頁，中華書局出版。）——無性雜交是米丘林學說中的一個主要部份，無性雜交是控制植物有機體的發育和改變它們本性的有效方法。同時無性雜種的獲得，徹底地粉碎了孟德爾—摩爾根的遺傳理論，因爲他們認爲雜交只能是有性的，而不能是無性的。

本書的特點在於以簡短的篇幅，對無性雜交提出了一個廣泛的、完整的概念；舉如無性雜交學說的發展，獲得無性雜種的方法，無性雜交的實踐意義等，在本書中均有扼要的叙述。其中尤以獲得無性雜種的方法一章對我國農業科學工作者將會有很大的幫助。著者曾指出，本書的對象是「廣大的科學工作者、生物學教師、農業學校學生和實驗家」。

關於植物無性雜交的另一本書，是李景華編譯的「植物的無性雜交」（中華書局出版，一一七頁）。這本小册子主要是根據格魯森科（Грунченко）所著

的Вегетативная Гибридизация Растений(一九四八年)一書編譯而成的。原著在蘇聯是有關無性雜交的一本主要著作，似應全部譯出爲妥。書末附有植物無性雜交的參攷文獻（俄、德、英文）數百種，對於研究工作是有很大方便的。

三

傑出的蘇聯科學家李森科院士進一步發展了米丘林學說。他的偉大發現，就是關於植物的階段發育。根據這一理論，他指出了植物的生長與發育之間的區別。他認爲「生長」是植物體的「量」的增加，而「發育」則是植物體的「質」的變化。例如把冬種作物的種子在春季播在田間，則它們會不斷地增長體積，但不會結實，它們始終停留在發育的初步階段上；因爲春季和夏季的高溫不能使冬種作物發生春化的變化，所以不能進入次一發育階段。如果把「短日照性」的植物（如黍、大豆）在不斷日照的條件下進行栽培，縱使有適宜的溫度條件，它們還是不能結實；因爲它們缺少黑暗（夜的延長），所以不能完成另一個發育階段，但是它們始終可以繼續生長。李森科說：「生長是植物發育的特性之一，生長這個特性根據植物的本性，根據周圍的外界環境條件，並且根據植物的發育階段，可能有不同程度的表現。」（見「農業生物學」，中譯本，第二〇頁）

目前已經發現的，植物有兩個發育階段，即溫期發育階段（春化）和光期發育階段。在前一發育階段，溫度是最主要的條件，但也需要適當的濕度和空氣；在後一發育階段，光照的長短便成爲主要條件了(當然也需要適當的溫度、濕度和空氣)。不同的發育階段要求不同的外界條件。各發育階段是獨立的，但又是互相聯繫的；溫期發育階段沒有完成之前，光期發育階段就不能開始。

植物的階段發育理論，不僅告訴我們植物爲完成發育必須通過那些階段，並且指出了每一發育階段需要那些外界條件。因此，我們就可以控制植物的發育，改造它們的本性，使其朝着有利於人類的方向去發展。

保守和落後，永遠是革新和進步的死敵。就在一九二九年的全蘇遺傳學大會上，李森科這一天才的發現遭到了保守派的攻擊和敵視。在六卷的大會紀錄裏，李森科的發言僅僅佔了五頁！然而這一發現是發生在社會主義的國土上，蘇維埃政權決不允許任何一粒有利於人民的種子落在不毛之地上。

由於聯共和蘇聯政府的大力支持，由於他本人的不折不撓的鬥爭，這一粒種子很快地就在蘇聯的廣大土地上開花結實了。一九三四年，根據階段發育理論所產生的春化法，已在各集體農場廣泛地推行開來。根據統計的結果，播種經過春化處理的穀物種子，每公頃平均可以增產一公担，一九三七年即增產一千萬公担之多。

然而，還不止此，烏克蘭的棉花生產問題，南方馬鈴薯的退化問題……都根據這一理論，迎刃而解了。並且根據這一理論，李森科敢於在一九三三年一月提出在二年半之內，爲敖德薩地區育成一個最早熟的小麥新品種。確定期限，按照計劃育出一個新品種，在摩爾根主義者看來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情，然而李森科却如期完成了既定的任務！

卓越的著作「農業生物學」一書就以「春化作用的理論基礎」開始，此外尚有二十三篇論文和報告，最後附以「一九二三——一九四七年作者的基本科學著作及論文」表。

除去階段發育理論之外，李森科並在書中介紹了「自花授粉植物的種內雜交」，這一理論揭發了舊育種學的「純系」的誤謬。更重要的是，如李森科所說的「在二、三小時可以教會男女集體農莊莊員掌握這個方法」(一四六頁)。這一方法大大豐富了作物的遺傳基礎，使作物獲得更高的生活力、更大的抵抗力，因而就可以獲得更多的產量。

李森科認爲種間有鬥爭，種內有互助；這又是與資產階級生物科學截然不同的說法。他根據這一理論研究出樹木種子的叢播法，這在防護林帶的種植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時橡膠草的叢播法，也使這種作物的產量提高到六至十倍。我國正在推行的蘇聯先進經驗——「密植」，也和這一理論有關。

書中更重要的一部份，是李森科不但明確地指出了孟德爾—摩爾根主義的輭弱無能，並且充分地說明了研究生物科學的正確立場、觀點和方法。全書充滿了政治性、思想性和戰鬥性。

從書末「作者的基本科學著作及論文」裏，我們可以看出李森科在蘇聯的偉大衛國戰爭期間的科學活動是何等令人敬佩。在這段期間，他解決了由於馬鈴薯栽培而積的擴大而形成的栽培材料不足的問題（利用地塹頂部作爲栽培材料），解決了戰時的橡膠供應問題（橡膠草的種植成功），解決了西伯利亞和更北地區的穀物種子發芽問題，並且解決了西伯利亞冬種小麥的栽培問題。這一切足可說明李森科的研究工作是緊密地與實踐聯繫一起的。

李森科的工作之所以能有如此輝煌的成就，正如他自己所說的：

「常常有人問我的父母是怎樣的人，我一貫答以父母自一九二九年以來便是集體農莊莊員。然而事實上我還有另外的雙親——聯共黨、蘇維埃政權、集體農莊，把我教養成人。」

本書的翻譯大部份是採取口述筆錄的方式進行的，初版係分册印行，譯文中有不少錯誤，此後曾經校訂，交「新農」出版，已大見改善。唯行文艱澀晦暗以及名詞不統一的地方還不少，書後未附譯名索引也是一個缺點。再有書中錯字和標點不當的地方也很多，希望再版時，能重新加以整理，以便使這一部

不朽的著作，在中國生物科學界裏放出更燦爛的光輝。

四

李森科在經聯共中央委員會批准的「論生物科學現狀」的歷史性報告中曾說道：「蘇維埃農業生物學的基礎是由米丘林和威廉士所奠定的。他們總結了並發展了科學和實踐在過去所積累下來的一切精華。他們的工作，使我們對植物和土壤的本性認識、對農業的認識，增加了許多在原則上完全新的東西。」

我們知道：威廉士的偉大貢獻，就是在辯證唯物論的基礎上，創造了土壤統一形成過程的完整理論。並且在這一理論基礎上，提出了「特來沃頗利」輪作制的著名學說。這就爲蘇聯改造自然的偉大計劃在科學上提供了可靠的條件。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三日蘇聯部長會議和聯共中央所頒佈的富有歷史性的決議——「關於栽植防護林帶、推廣特來沃頗利輪作制、建立池塘和蓄水庫，以便在蘇聯歐洲部份的草原和森林草原區域中，保證穩定高產量的計劃」，就是以這個學說爲基礎的。

「農業原理」一書是他一生的最後著作，是爲一九三九年全蘇農業展覽會而寫的。他在這本書的序言裏寫道：「我把自己的全部科學工作獻給他們，是因爲我的一生不論過去和現在，除了爲人民服務之外，並沒有其他的目的。我一向都希望使農業科學成爲廣大羣衆的財產，使它成爲土地肥力創造者的眞正助手。」

威廉士在完成這部著作不久之後，便與世長辭了。

本書深入淺出地叙述了有關土壤和耕作方面的諸問題，很適宜於一般讀者閱讀。但現有的中譯本係根據G. V. Jacks的英譯本重譯的，而英譯本却有不少誤漏的地方，讀者必須注意。最近已有人根據俄文本將全書譯出，並附有李森科院士在一九五〇年七月十五日眞理報所發表的對於威廉士學說某些錯誤觀點的批評（這一批評的另一譯文，曾載第二卷第一期的「科學通報」），不久將由中華書局出版。

關於威廉士學說的中譯本，尙有以下幾種，值得推薦：

一、「威廉士的生平及其學說」（斯米爾諾夫著，梓丁譯，二二二頁，中華書局出版）——本書扼要地叙述了威廉士的一生歷史及其學說，富有思想性和政治性，爲一般讀者的良好讀物。

二、「威廉士的土壤學說及其發展近況」（孫渠編譯，二四六頁，中華書局出版）——本書主要根據孫渠教授在中國科學院和北京農業大學的講演稿編成的，有系統地介紹了威廉士學說及其發展近況，並結合中國的農業實際情況加以說明，每章附有學習提綱。在目前來說可充作大學的參考書，亦不失爲一個良好的課本。

三、「威廉士學說的理論及其成就」（華北農業科學研究所編委會編，一八二頁，中華書局出版）及「特來沃頗利輪栽制及其應用」（綏吉納教授講演之二，北京農業大學俄文翻譯室譯，三七頁，中華書局出版）二書，亦宜作參考閱讀之用。

五

最後，我願介紹一本生物科學的傑出著作——「大地花開」。

這一本獲得一九四九年斯大林獎金的偉大作品，極其生動地叙述了米丘林生物科學在怎樣劇烈鬥爭的情況下，獲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正如作者在該書開始的一節——「偉大的鬥爭」裏所說的：

「鬥爭是在環繞着生物學的最基本問題而進行的。我們知道，新的對抗舊的、活的對抗死的、唯物主義的對抗唯心主義的這種鬥爭，在以往也曾進行過，並且貫穿了生物學的整個歷史；但是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不妥協地鬥爭過，而在新的方面取得了如此的勝利；同時也從來沒有如此廣泛程度的實踐參加到理論的論爭裏去。」

「我們，斯大林時代的蘇維埃人民，在自然科學歷史上所進行的最巨大的思想鬥爭裏，已經看見了一種具有無比力量的科學是怎樣誕生的，並且看見了這種力量怎樣賦與人類以征服自然的無限威力。昨天還被宣稱爲不能克服的一切障礙，都在這種力量之前崩潰了。」

「這是生命之科學，它教導人類如何去改變周圍的世界、如何去改造生物界。這是蘇維埃的米丘林農業生物學。它的特色是空前的。它是人民的科學。」（英譯本第一二——一三頁）

全書就以這樣的戰鬥姿態出現，而以「歷史性的大會」——一九四八年七月三十一日至八月七日的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會議——作爲結束。書內穿插了達爾文、季米里亞則夫、米丘林、李森科以及道庫契耶夫、柯斯狄奇夫、威廉士等的戰鬥事蹟及其對於人類幸福的偉大貢獻。並且叙述了布爾班克(Luther Burbank)的發現爲什麼在美國不能成長，而魏斯曼—孟德爾—摩爾根的形式遺傳學在資本主義世界裏反能如此猖獗。此外指出了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以及在斯大林領導下蘇聯人民改造大自然的輝煌成果。同時還告訴我們，理論一經與實踐結合之後所發揮出來的無比力量。全書取材豐富，筆鋒犀利，應該列爲農業科學工作者必讀之書。

本書中譯本係根據莫斯科外文出版局一九五一年出版的「Land in Bloom」重譯的。但譯文艱澀難懂，用語不當之處甚多，最主要的是不能很好地表達原著的精神。爲了使這一部科學作品正確地介紹到我國來，我希望能有更好的中譯本出現。

學術論文提要

偉大的列寧斯大林黨的第十九次代表大會

「布爾什維克」雜誌社論

無論在和平建設時期或戰爭年月裏，共產黨總是蘇聯人民的領導力量。在衛國戰爭時期，斯大林同志領導下的共產黨乃是反對法西斯匪徒的全民鬥爭的鼓舞者和組織者。在和平的條件下，黨號召蘇聯人們爲恢復和進一步發展國民經濟而進行忘我的勞動。我們的一切勝利都不是自行到來的。這一切勝利是在與困難作鬥爭中、由於共產黨在羣衆中經常不斷地進行組織和思想教育工作而得到的。

我們已在經濟和文化的各部門中獲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列寧斯大林黨教育下的蘇聯人民是不會自滿的。他們把已得的成果當作爭取新成就的階梯。共產黨現正號召廣大的勞動羣衆，起來完成更艱巨的經濟與文化建設計劃。

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關於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五年蘇聯發展的五年計劃的指示草案，打開了社會主義經濟、文化的新的强大高潮和我國新的繁榮的遠景。這一計劃保證了國民經濟各部門的進一步的發展和人民物質福利與文化水平的提高。

新五年計劃的順利完成，是以盡力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經營方法爲前提的。這一個計劃的完成，將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前進一大步。新的五年計劃將進一步鞏固蘇聯和整個和平、民主及社會主義的國際陣營的威力，並將更加鞏固蘇聯的和平政策。我們國民經濟的新高潮，將促使波蘭、捷克等國的人民勝利地向社會主義前進。同時，蘇聯不懈地向共產主義前進，也鼓舞着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人民。

在黨章的修正草案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文件中，體現了布爾什維主義的組織原則。共產黨——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是根據具體情況、根據我國每個發展時期向蘇維埃國家和黨所提出的政治任務來規定其組織形式和工作方法的。黨章的修正草案發展了並具體化了適合於達成共產主義新任務的基本組織原則。在黨章的修正草案中，明確地規定了由於共產黨的偉大任務而賦與黨員的崇高義務。同時也規定着黨員的權利。

黨章的草案宣告黨組織結構的指導原則——民主集中制——是堅定不移的原則。同時，還規定了一些必要條件，執行這些條件，就可以護衛黨而不致讓反黨分子濫用民主，就可以指望黨內民主有利於事業，而不致被利用來損害黨和工人階級。

修正過的黨章更加强了黨組織的戰鬥力，黨的隊伍的團結和組織性，及黨員在爲實現黨的政策鬥爭中的積極表現。馬克思主義教導說，所有資產階級國家都是壓迫勞動人民的機器，是少數剝削者鎮壓多數被剝削者的機器。沒有無產階級革命，不打碎和摧毀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便不可能剝奪資產階級的政權。

在這部著作裏，列寧一再地强調說：馬克思主義的主要的和基本的東西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而馬克思主義的敵人一向所集中攻擊的，而且現在還在集中攻擊的，也正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列寧不僅是維護了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而且進一步發展了這個學說，把它運用到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條件中，並且以新的光輝的結論和論點豐富了馬克思主義。

蘇維埃國家的偉大的經驗，以及人民民主國家革命性的社會經濟的變革，再一次證實了列寧的下述結論的深刻而正確：即資產階級國家並不像一切機會主義者在過去、甚至現在仍然主張的那樣會自行消亡，而是必須用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來摧毀它。

列寧在他的著作當中，認爲無產階級專政是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階級聯盟的一種特殊形式。無產階級專政，如果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就不能夠完成它的改造社會的歷史使命。

列寧完全恢復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的眞面目，並進一步發展了這個學說。斯大林同志根據自己在建設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方面親身體會的豐富經驗，進一步發展了列寧的學說而創造了一個完整的關於社會主義國家的學說。

斯大林同志對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作了深刻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並闡發了有關蘇維埃國家的發展階段和職能的問題。斯大林同志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證明即使在共產主義社會，如果資本主義國家的包圍繼續存在，國家還是必須保存的。

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關於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五年蘇聯發展五年計劃的指示，進一步具體地證明了列寧—斯大林關於國家的學說具有無往而不勝的力量。這個學說已經被英勇的列寧—斯大林黨領導下的蘇聯各族人民具體表現在生活中了，這個學說已經變成國際工人階級運動的指南針。

列寧關於國家與革命的輝煌著作，向人民民主國家指

創造性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

（列寧著「國家與革命」三十五週年）

「國家與革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最偉大的經典著作之一。它標誌着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與革命的學說的獲展的新階段；它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爲共產主義而奮鬥的戰鬥綱領。

在「國家與革命」這部著作裏，列寧粉碎了資本主義辯護人的謬論，指出了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

（摘自「學習譯叢」一九五二年第九號）

（江偉珊譯）

出了勝利地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這部著作有着巨大的動員和鼓舞力量，它是全世界共產黨和工人黨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是一個熱烈的戰鬥號召，號召人們採取行動，進行勇敢而堅決的鬥爭來反對帝國主義和戰爭。

（摘自「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中文版第一六二期）

三年來中國經濟戰綫上的偉大勝利

薛暮橋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後在財政經濟工作方面的第一個偉大的成就，就是從一九五〇年三月起，停止了通貨膨脹，穩定了金融物價。我們除平衡財政收支外，還完成了兩件重要工作。第一是由國營貿易機構來掌握與調撥各種重要物資，充分供給市場需要。第二是由國家銀行實行現金管理。

中央人民政府並提出了調整工商業的方針，以幫助私營工商業克服經濟改組中的困難和改善經營管理。爲着進一步調整工商業，於一九五〇年冬及一九五一年上半年又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城鄉物資交流運動。使農民多餘的農產品和土產品得到了銷路，城市工業品也立刻找着了廣大的市場，加速了城市工商業的進一步的好轉。

由於土地改革、鎭壓反革命和抗美援朝三大運動的偉大勝利；在工礦企業中進行民主改革、合理化建議和增產節約運動，在農村中進行愛國豐產運動，而獲得了同樣偉大的成就。今年上半年的「三反」「五反」運動，更替我們今後的經濟建設創造了極爲有利的條件。由於以上情況，使我們能夠在不到三年的時間中，達到財政經濟情況的根本好轉。

三年來中國的農業生產總值增加了一半上下，一般已超過抗日戰爭前的水平。農業生產迅速恢復的重要原因，首先是土地改革，這使全國的貧苦農民都分得了土地。農民的生產情緒大大提高。其次是政府供給農民貸款、肥料、新式農具、改良種籽、殺虫藥品，特別是大規模的水利建設，和以合理價格收購農民各種剩餘的農產品和土產品，這些措施在發展農業生產上起了極重要的作用。同時，各地農民開始按生產互助組和生產合作社的方式組織起來，合理使用土地、耕畜、農具和勞動力，這也顯著地提高了農業的生產效率。

三年來中國的工業生產總值增加了一倍以上，除個別產品外，均已超過解放前的最高水平。在交通運輸事業方面，三年來也有顯著的進展。特別是鐵道的恢復和修建，更以驚人的速度在進展着。工業生產和交通事業所以能夠如此迅速發展，是各級人民政府和廣大工人階級共同努力所得到的結果。由於工業生產和交通事業的迅速恢復，工人的生活已得到了顯著的改善，嚴重的失業現象亦正逐漸消滅。

三年來我們的國內貿易是在新的基礎上重新建立起來了，這新的基礎就是國營貿易、合作社和私營貿易的分工合作。不但國營貿易和合作社貿易大大發展，私營貿易也得到了相當的發展。我們的國際貿易在以美國爲首的封鎖禁運政策的限制下，仍然是繼續發展的。美國封鎖禁運的結果是在我們的進出口總值中資本主義國家所佔比重大大降落，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所佔比重大大增長；後者已在進出口總值中佔百分之七十上下。其次是我們從七十餘年的入超轉爲進出口的平衡。

解放後，我們取消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允許外資企業在服從中國政府法令的條件下仍然繼續經營。隨着帝國主義特權的消滅，外資企業因經營腐敗大部分感到難於維持。在美國對我封鎖禁運並凍結我們的國外財產以後，美帝國主義的在華企業大部分已受我政府管制；其它外資企業也因封鎖禁運而遇到更大的困難。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時代，顯然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其次，現在我們已在四億二千萬以上人口的地區完成了土地改革，除少數民族地區外，土地改革可在今冬明春全部完成。兩千餘年來統治中國的封建制度即將全部消滅。

最後，官僚資本主義經濟已被全部沒收下來，變爲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雖然國營經濟有了巨大發展，但私營工商業在國營經濟的領導和幫助下，也是在恢復和發展着。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則正以合作社的方式組織起來，通過合作社而得到政府和國營企業的領導與扶助。

三年來我們已經勝利地完成了國家經濟恢復和改造的工作。全國的大規模的經濟建設不久即將開始。我們的經濟制度是進步的，但我們在技術上還是落後的。要使我們的國家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變爲一個先進的工業國，還要經過全國人民相當長時期的努力。首先我們必須利用我們豐富的資源，大規模地發展重工業，以樹立工業化的基礎。我們必須以發展重工業爲重心，圍繞這個重心來發展各種經濟文化事業。

（摘自「學習」一九五二年第七期）

論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

喬治烏—德治

在過去四年中，我國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在實行國有化以後的四年中，社會主義工業的生產量幾乎增加到了原來的三倍；今天它在整個工業中已佔了百分之九十六點五的比重。在農業方面，國營農場逐漸鞏固，機器拖拉機站的數目不斷增加。約有一千五百個集體農場和一千一百多個農業合作社，已在自願的基礎上組織起來。商業中的社會主義成份也增加了，現在已在整個商業中佔有百分之七十六的比重。

我們社會的階級結構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地主階級由於土地改革已被消滅。工業中的資產階級也由於國有化而遭到了同樣的命運。無產階級已變成國家中的統治階級。集體農場數目雖然還不多，但由於它們的榜樣，鼓勵了更多的農民羣衆去從事社會主義農業生產。從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中湧現出來的新知識分子，正在加强知識分子的隊伍。在舊知識分子中，把他們的創造精力貢獻給勞動人民的事業的人，也愈來愈多。在政權建設方面，選舉勞動人民代表會議，標誌着建立人民民主國家道路上的一個重要階段。爲勞動人民服務的人民軍隊，新的國家機器、新的立法機構等等，都已經建立了。

所有這些經濟和政治的變化，已鞏固了工人階級的地位和工人階級與勞動農民的聯盟——人民政權的基礎。新憲法中反映了這種事實，是非常自然的。同樣無可否認的是社會主義成份的存在，以及這種成份在共和國國民經濟中的領導作用。新憲法中也反映了這個歷史事實。同時必須記住社會主義還沒有完全勝利，我們現在是生活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時期中。新憲法草案中的許多條

文都反映了目前這個時期的性質。

我國新憲法的主要特點之一，就是所有勞動人民享受的權利與自由，都受到保障，實現這些權利與自由的物質條件都有保障。憲法草案裏也有關於民族間題的重要規定。使少數民族得以享受平等的權利，並保證各民族得到全面發展的最有利的條件。

我們社會的顯著特點是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的協調。爲了鞏固人民民主國家的利益，每一個勞動人民必須能夠鄭重其事地完成他對國家的責任，並且能夠認識到完成責任應成爲一切公民所應遵守的法律。

人民民主國家是建設社會主義的主要工具。在這一個意義上，它進行着巨大的創造性工作。

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的憲法，第一次體現了我們黨在全國政治生活和國家生活中所起的作用。黨的政策是人民民主制度的重要基礎。全體勞動人民都承認黨的領導作用。

憲法宣佈：羅馬尼亞人民民主國家的外交政策是一個保衛和平的政策，一個主張與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友好和聯盟的政策，一個主張與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保持和平和友好的政策。

我們的新憲法强有力地宣佈：我們要與偉大的蘇聯友好和聯盟，並且宣佈由於蘇聯的無私的兄弟般的支持和援助，才使我們的國家的獨立和主權有了保障，使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的發展和繁榮有了保障。

新憲法將加强我國的人民民主制度，並成爲在我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强有力的武器。羅馬尼亞人民——建設新生活的偉大的人民——有權利以我國的新憲法自豪，因爲它反映了偉大的社會主義經濟的成就。

新憲法的偉大的動員與組織力量的源泉，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是勞動人類的偉大天才斯大林同志的思想。

（摘自「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中文版第一六四期）

蘇維埃政權初期的商品貨幣關係

卡爾戈諾夫

消滅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制和人剝削人的制度，以及生產資料和生產工具的社會公有制之代替私有制，是資本主義商品關係的性質改變爲社會主義商品關係的性質的基礎。

土地收歸國有，是蘇維埃政權在財產關係方面的第一個措施。它是要在農業中消滅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和建立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前提。實行了土地的社會主義國有化的結果，這些土地就不再是商品了。因此，消滅了關於土地買賣和土地抵押的資本主義的商品關係。

國營工廠、鐵路和水運變成了社會主義國家的財產，即變成了全民的財產，因此，已經不再是商品流轉的對象了。工業和銀行的社會主義的國有化，消滅了資本家的較大的私有財產並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發展打下了基礎，因此，這也就爲特殊的商品生產（社會主義時代的商品生產）的發展打下了基礎。

在當時（指蘇維埃政權初期），生產資料的私有制並沒有完全消滅，而且也不可能完全消滅。因此，私有者之間的商品關係也要保存下來。但是，在社會主義國營經濟和小商品農民經濟結合的基礎上所產生的社會主義工業和小商品生產的農村之間的商品關係，已不同於私有者之間的商品關係了。

在一九一八年下半年開始的國內戰爭的條件下，蘇維埃國家不得不採取軍事共產主義的政策。整個掌握了人民的全部消費品的供應事業。禁止了私人商業。國家的採購應該成爲供應城市以所需農產品的主要來源。農民必須按照固定價格把全部餘糧交給國家。供給農村的工業品，或者採取發放實物的形式（主要是發給貧農），或者以農產品直接交換工業品。

向居民分配糧食，主要是按照定量免費發給居民，在初期是通過蘇維埃零售商店與合作社的零售商品，後來主要是通過合作社。當時也有貨幣工資，但是它的比重不斷下降。從形式上看，商品貨幣關係並沒有廢除。但實際上全部分配關係是帶着實物性質的。

在經濟管理方面，管理局制是軍事共產主義時期的特徵。各企業按照管理局的指示進行工作，全部產品，由管理局統一分配。企業所收進的原材料也是直接地免費取得的。國營工業的生產管理完全通過統一的行政關係進行，並不利用商品貨幣關係。在人類歷史上，這是第一次以生產資料的社會公有制爲基礎，建立了統一地、有計劃地管理社會生產的制度。雖然在軍事共產主義時期以實物分配制代替了商業，但當時已經明確地認識到了，決不可立即取消貨幣。這種需要貨幣的要求，在整個內戰時期裏一直是存在的。所有這些要求貨幣的需要，國家祇能用發行新幣的辦法去滿足，因爲在採用實物供給制和徵實辦法的情況下，國庫收入的貨幣是很少的。

經濟聯繫的通過貨幣，引起了兩個極重要的問題：即實行幣制改革和組織短期貸款。一九二一年十月，由全蘇中央執行委員會常會所創立的蘇聯國家銀行就是辦理短期貸款和調整貨幣流通的中央機構。一九二二—一九二四年，蘇維埃國家實行了幣制改革，因此，建立了金本位的穩固的蘇維埃盧布。

新經濟政策是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期中無產階級國家的唯一正確的政策。其目的在於：在無產階級國家掌握經濟命脉之同時，允許資本主義因素存在，使社會主義因素和資本主義因素進行鬥爭，鞏固社會主義經濟因素使之徹底戰勝資本主義因素。

蘇聯的商品關係，已經由國營社會主義經濟和私人的農業小商品經濟之間的聯繫形式變成了社會主義城市和集體農莊之間的聯繫形式。這種商品生產的基礎，不是生產資料和生產工具的私有制，而是分爲兩種形式的社會公有制——國家財產和合作集體農莊財產，這裏已經消滅了大資本家和小資本家。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工具和勞動力已不再是商品了。因此，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價值法則的作用範圍也是有限度的。（姜毓田譯，梁天校）

（摘自「計劃經濟」第四十三期）

美英資本家是太平天國起義的絞殺者

巴拉羅夫斯基

太平軍起義是人類歷史上最壯大的農民起義。民衆熱烈參加起義軍。一八五三年太平軍進距北京不遠，滿清皇朝感到瀕於滅亡了。

美國、英國和法國的資本家來挽救滿清皇朝的顚覆了。他們懂得中國起義農民的勝利威脅到不列顚帝國本身

的存在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在東方的殖民利益。

英國資產階級在太平天國起義之初，採取了觀望的態度。英國打算利用中國的內戰來擴廣自己在該國的陣地。不過，英國很快破壞了自己維持中立的諾言。對滿清予以黨助，干預太平軍與滿清間的軍事行動。

英國對太平天國「嚴守中立」的聲明，只不過遮掩了它對中國農民的敵對行動。實際上，一八五三年在上海和法國人共同參加鎮壓「小刀會」的起義，已經破壞不干涉中國內政的諾言。一八六〇年當太平軍進攻上海時，英國又復破壞對太平軍的諾言了。

太平天國起義之初，在華若干美國外交家建議自己的政府承認太平天國政府，可是這種建議並未得到華盛頓方面的支持。一八五七年，美國駐華公使理德正式表示美國對華政策得與英法的政策一致。儘管正式宣佈過自己的「中立」，一八六〇年美國却組織由外國人組成的大規模軍隊，對太平軍作武裝的鬥爭。軍艦也參加了反對太平軍的行動。僱傭的外國軍隊即以中國農民的劊子手美國人華爾爲首。華爾被太平軍擊斃後，「常勝軍」由另一美國冒險分子白齊文担任主將。

華爾和白齊文的軍隊殺害了所有和平人民的男子；婦女和小孩則出賣作奴婢。中國人民的絞殺者，美國的冒險之徒，姦淫婦女，焚燒人烟稠密的地點。美國軍對於無辜的人們實行血腥的屠殺，委之於兵火。尤其是美國劊子手對於俘虜所作的殘酷行爲。

一八六三年三月，在美、英、法各國協調之下，英國人戈登被派爲外國志願軍統領。在一年半中間，戈登扮演了鎮壓起義的重要角色。實際上，他是太平軍的主要劊子手。

一八六四年，由於南京和杭州的失陷，太平軍是失敗了。南京街上的屠殺繼續了三天三夜，結果死亡了十萬人。英、美劊子手和中國的反動派得到了勝利。中國農民沒有無產階級的領導，遭受了失敗。

據外國作者的估計，干涉者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的結果，死亡了近三百萬人。中國農民爲祖國的自由獨立而鬥爭中，被英美資本家打敗了。（黎子耀譯）

（摘自「歷史教學」一九五二年九、十月號）

蘇聯高等學校的教學工作

付　克

蘇聯高等學校的教學工作有它一套完整的科學體系。從教學目標到教學內容，從教學組織到教學方法都有它明確的目的性和計劃性。

一、教學計劃和教學大綱：教學計劃是根據下邊幾個原則製訂的：1、學校性質的不同。2、各個系性質的不同。3、各專業性質的不同。4、高等教育部對各種課程時間教學方式和成績考查的規定。教學計劃均經高等教育部部長批准執行，教學計劃決定了整個教學過程的形式及其內容。至於教學大綱，則貫穿着三個原則：1、必須貫穿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和方法。2、必須根據培養人才的計劃和國家建設的要求。3、必須具有先進的科學及理論根據。教學大綱均由高等教育部統一頒佈。同一種教學大綱，根據學校性質的不同，內容的多寡、深淺和要求也有所不同，各個學校可酌量增減；教師對部頒教學大綱不滿足，自己還可以重編，經過校長批准即可採用。

二、教學方法和教學過程：總括起來，大體分爲這幾種：1、講授。2、課堂討論和練習。3、課外習題。4、實驗。5、實習。6、課程設計。7、考試：分爲平時成績考查、口試、測驗、學期或學年考試等四種。8、畢業論文（或稱畢業設計）。從整個教學過程來看，學生是經過一個十分複雜的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過程；同時，始終是在教員的直接指導下進行各種活動的。

三、教學組織和領導：蘇聯高等學校領導教學的是校長和負責教學工作的副校長，整個工作是通過各教研室主任來進行的。教研室分爲兩種：一種是公共必修課的教研室，另一種是專業性的教研室。蘇聯高等學校對於教研室的組織和領導是十分重視的。每個學校經常有幾十個教研室。同時，通過教研室的工作，教師可以不斷提高自己的教學水平。

四、教學工作的主要優點：首先，有明確的教學方針，即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方針（或叫做學用一致）。任何高等學校的教學方針均明確規定培養出既有理論又有實際的專家，也就是說，高等學校的畢業生一定要符合社會主義各種建設的需要。其次，蘇聯高等學校的任何課程，均貫穿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和方法。編寫任何教材和教學大綱，都必須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神和原則指導下來進行，而馬克思列寧主義各種課程又規定爲高等學校的必修課程，不但學生要學習，而且教師們也必須學習。第三，整個的教學工作表現了高度的計劃性和嚴密性。這種計劃性從校長對整個學校的領導，各系、各教研室、各部門以及每個人的工作都充分表現出來。蘇聯高等學校的任何一件工作，都是爲了保證教學計劃的完成，而各種工作的進行都是有計劃的，組織也都是十分嚴密的。第四，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的不斷提高，是一個集體研究、集體創造的過程。蘇聯高等學校經常鼓勵教師們進行個人的創造和研究，但是他們更注意集體創造和發明，以發揮集體的智慧和能力，用集體的力量爲國家建立功勳。最後，在教學上還有一個顯著的優點，就是各種課程的主要內容和問題，均在課堂上解決。此外，在教學上運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以改進教學，充分發揮人力與物力的作用以及完整的檢查教學工作的制度等等，也都是蘇聯高等學校教學工作中的優點。

（摘自「人民教育」一九五二年十月號）

斯大林關於語言學的著作及其對於自然科學的意義

Д·М·特洛申

斯大林同志關於科學的繼承性，以及關於妥善地利用科學遺產的指示，對於自然科學有着巨大的意義。

當研究自然科學發展史時，有時造成了這樣的印象，即某一種科學僅僅是在一定的時期被創立起來。認爲科學如同一條孤單的水流那樣平穩地、沒有鬥爭地被發展起來，這是錯誤的。這種想法也是反馬克思主義的。事實上，科學本身就是激烈的階級鬥爭的舞台。科學不僅僅是某一種基礎上產生的結果，它是一種長期歷史發展的過程。這是它與基礎以及上層建築之間的重要區別之一。

科學不隨着某一基礎的消滅而消滅。當舊的基礎消滅時，科學擺脫奴役，擺脫它的奴隸身份，擺脫舊的基礎與

上層建築的桎梏，更好地與更完善地爲新的基礎與新的上層建築服務。同時由於新的進步力量的影響，科學上昇到更高的水平，日臻完善與發展起來。這是科學與上層建築第二點最重要的區別。

第三，眞實的科學與科學眞理永遠反映客觀世界即自然界與社會。從不知到知，從不完全的知識到較完全的知識——這種科學發展的過程，只有在「科學在其歷史發展中有繼承性」這樣一個基礎上，才成爲可能。斯大林同志關於科學繼承性底指示是天才的綜合科學全部發展歷史的結果。

科學還有一個特性是這樣的：科學祇有在嚴格的繼承性的基礎上，批判地改造前代獲得的一切知識總和，才能夠被發展與完善起來。

自然科學與技術彼此間不可分隔的聯繫着，他們緊密地互相交錯着。科學上的發現立即會引起技術上的變化或改善，而後者影響到生產與勞動生產率。這樣一來，技術就成爲必需的環節，通過了它，科學才影響生產。在這個聯繫中，原始的基礎是生產。但是科學，在生產的影響下被發展起來，却也對生產的發展起着直接的影響。這是區別科學與上層建築的特徵之一。

雖然科學與生產緊密聯繫，上層建築對它仍然表現有巨大影響。上層建築能夠促進科學的發展，相反地，也能引入歧途，而延緩它的發展。科學有很大的程度依存於上層建築。這種依存性表現在下列方面：統治着生產的階級，也統治着科學。階級統治着科學也就決定着科學的方向。科學對階級的依存性也表現在下列方面：即科學家們永遠是與一定的階級相聯繫着的。因此，他們總是把自己的努力用在發現能夠鞏固這一階級及其經濟與政治的那些規律上面。在對抗性的社會裏，科學永遠是激烈的階級鬥爭的舞台。

在階級對立的社會裏，統治思想就是統治階級的思想，每一個科學發現在它的理論部分都要適應於這種思想。這常常造成與科學眞理相違背。在社會主義國家，科學成爲全民的科學。科學工作者與生產者的友誼合作，鞏固了理論與實踐的聯繫；使他們面向着同一個偉大目標——共產主義建設。由於這種特殊作用，也決定了它的特殊內容：即無論構成研究方法、構成理論上的結論與綜合，都是徹底地採用了辯證唯物論的原則。（王萬里、王爵瀾譯，吳鈞燮校）

（摘自「科學通報」第三卷第七期）

反對量子力學中的唯心主義

M·Э·奧密里揚諾夫斯基

一切科學之基礎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在研究非生物自然界的部門，在物理學部門中，也同樣是行動的指南。

我們必須在辯證唯物主義的基礎上仔細分析量子力學的實驗基礎及其原則原理的根據，研究它所應用的新概念，尋求量子力學的適用界限（超過這個界限它就不能正確地反映自然，而得出物理學和哲學的荒謬結論）。

在量子力學的哲學基礎這個問題上，一個辯證唯物主義者應該以承認下列這些原理爲出發點：微觀現象是客觀地存在着的；客觀物體和微觀物體是運動的物質的統一鍊條的各個環節，但同時又是互相區別着的；在微觀現象和宏觀現象之間並不存在形而上學的墻壁；而微觀物件的所有性質可以這樣或那樣表現在宏觀現象中；對微觀現象的認識是沒有任何界限的。

把現代量子力學作爲一種統計系綜的理論爲量子力學提供了一個根本的基礎，它保證了微觀現象理論循着唯物主義的道路前進。統計系綜理論提出了這樣一個原理，就是：現代量子力學的結構不是建立在個別過程的理論基礎上，而是依據和經典統計力學不同的量子統計系綜；這一理論摧毀了並協觀念認爲現代量子力學是個別微觀物體的理論的偏見。因此，這一理論推翻了唯心主義的並協觀念的各個原理，如狀態是「儀器範疇」，微觀物體和宏觀儀器同格，「根本上不可控制性」等等論調。

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起來的蘇聯科學家們決定性的打擊了現象的不可認識性、測不準主義、宇宙有限「理論」的唯心主義觀念以及其他反科學的意見。他們有着一切條件來在這樣的方向上發展量子力學及其他現代物理理論，就是使物理理論正確地、唯物地解釋在自然界發生的各種現象和過程，使在這些理論中沒有唯心主義的虛構，也就是說，使這些理論建立在唯一的科學的宇宙觀——辯證唯物主義的基礎上。（吳鈞燮、郭挺章譯）

（摘自「科學通報」第三卷第八期）

關於詩的構思、詩的思想性

M·伊薩科夫斯基

詩人可以採用任何的主題，包括別人已經利用過的主題在內。但是，他只有在這種情形之下才可以採用它：如果他會用新的方式去表現它，用新的、自己的內容去裝滿它；如果他能夠從某一個新的方面去說明它，能夠從另一種性質和另一種意義中去顯示它，這種性質和意義自然要和過去已經用來表現過它的不同。

在每一次同樣的場合中，詩人都可以發現某種特殊的、與衆不同的、新鮮的東西，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描寫它，都可以表示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感情，而不必去複述他在書本中讀過的東西。這樣一來，這個主題就會從已經利用過的舊主題變成新的主題，變成有獨立精神的主題。

每一個初學寫作的詩人，應當培養自己成爲高度思想性的和高度藝術性的作品的創造者。爲了實現這一點，他應當徹底理解什麼是文學的思想性。

然而在理解這個問題上，不但某些初學寫作的詩人還缺乏相當的認識，甚至於某些報紙的編輯部也是如此。他們有時把詩的思想性理解得過於狹隘和簡單，以爲它不過是表現當前的迫切問題，是詩人對某一個政治事件或某一種措施的直接反響。

從這種觀點來看，如果一個人寫了一篇關於集體農場春耕的詩，那麼，這就是說他寫了一篇有思想性的作品。如果他寫了一篇描寫故鄉大自然的詩，那麼，這篇作品就被認爲是沒有思想性的作品，或者至少是思想性很低的作品。

一篇詩的思想，就是詩人的基本的構思，就是詩人想用他的作品說明的那種主要的東西，就是詩人爲了它的原故而寫作的那種主要的東西。

當然，我們說到文學的思想性的時候，我們所指的是我們這時代的思想，我們的人民的思想、我們的共產黨的思想。

有時，詩的思想是直截了當、毫不隱藏地表現出來

的。但是，詩的思想常常不是直截了當地表現出來的，常常不是以詩人直接表示的方法，而是以間接的方法表示出來的。它是獨立出現的，它彷彿跟作者的意志無關，而是從作者在自己作品裏所採用的生活材料中自然而然、合情合理地產生的。

當然，思想（在社會意義上）愈重大，它在詩的構思中體現得愈鮮明和愈眞實（在藝術上），一篇詩也就會更好。如果沒有思想，沒有構思，也就沒有詩可言，那不過是些押韻的句子的機械的排列，這些句子既沒有任何的意義，也不爲任何人所需要。這樣的句子可能在兩種場合出現在詩人的筆下：如果詩人沒有什麼事情可以告訴自己的讀者，或者如果他雖然有事情要告訴讀者，但是他還不善於把他想表現的事情用詩的形式表現出來。（孫瑋譯）

（摘自「人民文學」一九五二年十月號）

關於繼承民族音樂遺產問題

李　凌

「繼承民族音樂遺產」問題，已引起各有關方面的注意，這是很使人興奮的。但應指出，音樂工作者對這問題的認識，還是混亂的。

有些是盲目崇拜西洋，也盲目輕視民族藝術；有些是用國粹主義的態度對待國樂；有些則全部否定國樂。這些不正確的態度，都足以妨礙中國新音樂的發展，也妨礙我們正確地對待民族的音樂遺產。

民族音樂遺產最主要的有兩方面：

第一、民間音樂，包括民歌、民樂及地方戲曲等，這是民族音樂遺產最主要的一面。民間音樂，雖然也有很少數是封建統治者麻醉人民的東西，但是，民間音樂基本上是廣大人民的思想生活的反映。我們正確地認識民間音樂的人民性、健康性，基本上對封建統治的革命性和它的藝術性是非常必要的。可是，當我們作爲遺產來學習它的時候，也要看出它的不足，批判和揚棄它的軟弱性、陰晦性，接受其優秀的部分，發揮擴大它的健康開朗的部分，使之發展成爲能表現今天革命現實的思想情感，和生活需要的新東西。

第二、我們通常所說的國樂，是指從「雅樂」演進而來的，基本上是從封建士大夫階級的「雅樂」一脈相承而來的東西。國樂中有一部分是歌功頌德或粉飾太平的東西，不少是吟風弄月的作品。不過國樂中也有不少是來自民間的，多少還帶有人民性的東西。因爲「雅樂」本有許多是源自民間的，封建統治者採集了一些民間音樂，改變「發展」成爲他們自己的享樂品。這些東西漸漸乾涸了，殭化了，封建統治者不能不常常向民間吸取滋養，重新加以「發展」。中外古代所謂「正統」音樂，實際上是以民間音樂爲主要泉源的。

我們知道，民間音樂，由於歷代的音樂家的採集、整理、加工，在音樂藝術的彫琢上才比較工整、細緻。這裏面保有着的寶藏，是非常貴重的。還有，有些古曲世代相傳，其中有些是封建社會興旺時期多少帶有積極性的東西，有些是在音樂形式上帶有革新因素的東西。這其中也有值得借鑑的東西。

（摘自「人民週報」，一九五二年第三十八期）

（上接57頁）

匈牙利　匈牙利的一些語言學家曾經在語言形態學的問題上重複了馬爾派的錯誤。有一位匈牙利語語法的著者索性說，形態學是不需要的。在語文教學上，對於形態學的重視也不夠，近年來匈牙利語的語法教科書只是在「造句法的基礎上」編寫的。因此匈牙利的語言科學曾經處於停滯狀態中。斯大林的語言學著作的發表才給匈牙利的語言學帶來了科學的方法基礎。

一九五一年俄國大辭典的出版，是匈牙利科學院的一件大事，它標誌着匈牙利民族語的標準化向前邁進了一步，尤其是關於蘇維埃事物的表達，俄語詞彙的意譯，以及跟匈牙利國內社會主義發展有關的概念的詞的造詞法等等方面。在辭典出版以前，各種名詞極不統一，甚至在同一報章上出現同一概念的不同名稱。應該指出，這部辭典選擇詞彙很愼重，區別細微的詞義很下功夫，並且靈活地運用了俄語的辭典。

羅馬尼亞　羅馬尼亞文拼音法的不一致引起了拼音改革的要求。彼得羅維茨院士和格勞爾教授提出了新拼音方案。彼得羅維茨的方案有二十四點，他建議把現行同音不同寫法的ⓐ和ⓐ合併爲ⓐ，調整ia的拼法，分別s和z的發音，用羅馬尼亞語的發音來翻譯外來語等等。這些方案的自由討論可以幫助拼音改革的實施。這種改革將在高度的科學水平上進行，而廣大人民羣衆將能夠接受。

捷克　斯大林的語言學著作發表以前，語言學的「結構論」（Strukturalismus）支配着捷克的語言學理論。這是索緒爾所提出的關於語言的唯心觀念的發展，它跟反馬克思主義的馬爾派理論有幾點不謀而合，例如認爲兩種語言交配產生新的語言和誇大語義學的作用等等。斯大林的語言學著作發表後，「創造」雜誌展開了關於結構論的辯論。有些結構論者還說結構論跟馬克思主義的語言學理論完全一致，但它的唯心論的本質終於被揭露了。結構論者認爲，語言的機能在各種不同的「表現」中各有不同，例如文藝語言跟普通交際用的語言有不同的機能。這樣的劃分就會使文學語言脫離人民的語言，把語言、習慣語和「階級」同行語混爲一談，促使文學中的形式主義滋長，使人醉心於咬文嚼字而危害了內容。

（王一平摘譯自蘇聯「語言學問題」雜誌一九五二年第三期及第四期馬祖爾等五人所寫的五篇「外國的語言學」）

訂正

本刊九月號及十月號有個別錯字，特訂正於下：

九月號頁	欄	行	誤	正
一〇	上	二一	十二分之一	十分之一
一三	下	二		漏加「註㈠㈧」
一四	上	二八	二十二日破	二十三日破
一六	上	二	Gauncy	Jauncy
一六	下	八	祇是書	祇是當
一六	下	一四	楊	吳
一六	下	一七	美人數千人	美女數千人
十月號				
五	下	一	這二者已無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並無對抗性的矛盾。	這兩種經濟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並無對抗性的矛盾。
一五	上	三五	自爲	自在
一九	上	三二	兩萬萬	三萬萬

國外期刊重要學術論文介紹

這裏，我們在最新出版的各種國外期刊中，分別選出一二篇重要的學術論文，予以摘要譯出，作爲重點介紹。

——編者

對於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的偉大貢獻

蘇聯「眞理報」社論

斯大林同志的著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是對於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的偉大貢獻。斯大林同志的這篇新的理論著作是一個生動的範例，它證明革命理論與革命實踐是有着牢不可分的統一的。這篇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極爲重要的科學著作具有巨大的國際意義。

斯大林同志以其對於當代根本問題的精湛研究，總結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和國際革命運動的經驗，不斷地以新的科學原則和結論豐富着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理論。斯大林同志的這些著作向蘇聯人民指出了走向共產主義的完全勝利的道路，它們鼓舞各人民民主國家的勞動人民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創造光輝的業績，它們號召全世界勞動人民爲和平、民主與社會主義而鬥爭。

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這篇著作中，斯大林同志從各種角度闡釋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問題，他分析了社會主義經濟法則的性質——這種分析，在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中還是第一次——確定了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法則，並說明了從社會主義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主要前提。斯大林同志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學說，給予各種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以致命的打擊，並批判了某些經濟學家的錯誤論點。

斯大林同志發現了社會主義經濟法則的性質和作用，這些法則都是反映了不受人類意志控制的經濟發展過程的客觀規律。人們可以發現自然界和社會的規律，可以認識它們，研究它們，可以在自己的活動中考慮到這些規律，可以利用這些規律爲社會服務，但是人們不能改變或取消這些規律。因此，認爲在社會主義條件之下，人們可以取消經濟法則、隨意創造新的法則或者「改變」這些法則的觀點是十分錯誤的。

斯大林同志發現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法則，這是極爲重要的事。

斯大林同志教導說：「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法則的主要特點和必要條件可以大致規定如下：通過在優越的技術基礎上進行的社會主義生產的不斷發展和不斷趨於完善，保證社會所有成員的不斷增加的物質和文化要求得到最大限度的滿足。」

這個定義說明了社會主義的最根本的實質及其性質。它着重指出了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並指出了達到這個目的的方法。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法則，表明了社會主義對於資本主義的偉大優越性。

斯大林在闡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要問題時，透徹地說明了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爲市場的生產的顯明特點。他作出了下面這個重要的科學結論：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有一種特殊的爲市場的生產，一種沒有資本家的市場生產，在這種市場上交易的東西基本上是所有社會主義生產者的貨物。這種市場生產的範圍僅限於個人消費品。

偉大的科學界領袖、共產主義的天才建築大師斯大林同志十分注意確定從共產主義第一階段過渡到共產主義第二階段的法則。斯大林同志在談到共產主義的科學定義時指出：列寧的公式「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政權加上全國電氣化」是唯一正確的公式。

斯大林同志把從社會主義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條件加以具體化，這是他對於科學共產主義的理論又一個卓越的貢獻。

斯大林同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這篇著作中對於目前資本主義的主要問題也作了深刻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

斯大林同志教導說，目前資本主義的基本經濟法則的主要特點和必要條件是：「通過對某一個國家的大多數人民的剝削，並使其破產和窮困，通過對其他若干國家、特別是落後國家的人民的奴役和有系統的掠奪，最後通過用來保證最大利潤的戰爭和國民經濟的軍事化，保證最大限度的資本利潤。」

斯大林同志指出了目前階段的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惡化並着重指出：應該把一個無所不包的世界市場的分化認爲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重要的經濟結果及其在經濟方面的後果。這就決定了世界資本主義的總危機的進一步惡化。

斯大林同志指出，世界資本主義制度正在經歷着經濟和政治的多方面的危機。這個危機的根本原因是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分化日益劇烈，和從資本主義制度脫離出來的各國——蘇聯、中國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的力量日益壯大。資本主義的削弱加深了資本主義的內部矛盾，並使帝國主義强盜們之間的鬥爭更加尖銳。

斯大林同志教導說：黨的主要任務之一是以有關社會經濟發展法則的已知的知識來武裝我們的幹部。

斯大林同志的著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的最高階段。它的出版是黨和蘇聯人民思想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具有眞正的歷史意義。斯大林的著作對先進的蘇聯科學的發展將發生巨大的影響，它將幫助我們的幹部更深刻地了解社會發展的法則，並且在思想上武裝其他國家的共產黨和工人黨的工作中將起巨大的作用。

馬克思「資本論」中對立物鬥爭規律的研究

蘇·M·M·羅津達里

「資本論」是科學社會主義的最偉大的著作。社會主義從烏托邦變成了科學，主要地是歸功於「資本論」。「資本論」科學地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規律，指出了社會主義並不是憑着人們的願望，而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所以，沒有「資本論」，就沒有科學的社會主義。

馬克思應用辯證法的發展規律分析資本主義時，以具體的材料提供了關於矛盾的問題之全面的研究。列寧把這個關於矛盾的問題叫做辯證法的核心。在「哲學筆記」中他特別注意「資本論」的這一方面。馬克思指出：一切辯證法的發展的源泉，是矛盾，是矛盾的發展，矛盾的克服。恩格斯在評述馬克思所著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時，指出了馬克思是怎樣分析矛盾的。

我們知道，馬克思是從商品開始分析資本主義的生產。爲什麼從商品開始？馬克思的回答是：因爲資本主義社會的財富是龐大的商品的集成，而個別商品則是它的細胞。在商品的細胞中，在單純的交換形式中隱蔽着資本主義生產所有的秘密，隱蔽着資本主義一切矛盾的萌芽。不分析商品，就不能明白貨幣、剩餘價值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切結構，就不能明白資本主義的歷史的過渡的性質。

商品是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兩種對立物的統一。創造商品的勞動，本身也有內部的矛盾，它是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個人勞動和社會勞動的統一。勞動所含有的這些矛盾，表現出以私有財產制度爲基礎的商品生產的無政府的性質。在商品與勞動的矛盾中包含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所以，只有分析這些矛盾，才能揭穿資產階級社會發生、發展與滅亡的眞實的規律。

商品本身的矛盾，只是商品生產矛盾運動的開始，商品分裂爲商品與貨幣，並不是表示矛盾的消滅，而是矛盾的加深，矛盾的尖銳化。商品矛盾進一步運動的形式，是商品與貨幣之間新發生的對立。貨幣把買賣統一的行爲分化爲兩個獨立的行爲。從商品到貨幣的交換，不能引起立即使貨幣變爲商品。交換的統一過程分化爲兩個對立的部分：「商品——貨幣」和「貨幣——商品」。照馬克思的指示，經濟危機的可能性就在這裏。但這還只是一種可能性。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創造了變危機的可能性爲眞實危機的條件。馬克思說，在危機的時期，商品及其價值形態——貨幣之間的對立，「發展成爲絕對的矛盾」。馬克思分析了單純商品生產的矛盾後，便進而分析資本的矛盾，分析資本增殖的矛盾。我們在這裏便接觸到了馬克思著作的中心，接觸到了剩餘價值的分析，也就是接觸到了新的矛盾——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矛盾的分析。馬克思指出單純商品流通最後的產物是貨幣，貨幣同時又是資本出現的最初形態。單純商品生產，是創造使用價值的生產，是用貨幣爲媒介進行商品與商品的交換。而資本主義商品的生產，却是爲了資本家發財的價值增殖的生產，即生產剩餘價值。到這時也就是工人階級和資本家階級間矛盾的分析。馬克思更闡發了絕對剩餘價值和相對剩餘價值產生的方法。他描述資產階級對工人殘酷剝削的實際情況，說明了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馬克思在講到一般的資本主義積累的規律這一章裏及其他地方，指出了工人階級和資本家階級間的矛盾是日益增長和日益加深。資本主義再生產的過程，是資本主義諸關係伴隨着資本主義一切的矛盾在擴大的基礎上再生產的過程。擴大的再生產，就是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矛盾進一步的擴大和加深。資本積累的過程，引起資本的可變部分相對的縮減。資本集中和生產集中的結果，一方面——在資產階級方面，集中了大量的財富，而另一方面——在無產階級方面，是工人階級絕對的貧窮化，產生產業後備軍。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矛盾，就是生產的社會性質和資本家私人佔有形式之間的矛盾。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關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作的天才的分析，完全是科學的，其可貴的地方在於馬克思教導我們對現實問題的革命的看法，照斯大林的話說，是不彌縫階級矛盾，不否認反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而是把鬥爭進行到底，進行到無產階級完全取得勝利。

（石光摘譯自蘇聯「哲學問題」雜誌第四期）

卓越的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文獻

（爲斯大林對第一屆美國工人代表團談話二十五週年而作）

蘇·P·達陀金

一九二七年九月七日黨與蘇聯人民的偉大領袖斯大林和第一屆美國工人代表團談話後，已經二十五年了。這個談話發展了並豐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許多最重要的原理，指出這些原理的世界性的歷史意義，闡明社會發展的規律和前途以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運命。斯大林發揮的那些論點武裝了並正在武裝着黨的、國家的和國際革命運動的幹部，而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寶庫是種無可比擬的貢獻。斯大林發表這篇談話的時候，正當蘇聯工業化獲得了偉大成就，工業方面「誰戰勝誰」的問題，早已決定是有利於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引起帝國主義營壘中瘋狂的仇恨，資產階級國家認爲蘇聯的加强，就是對資本主義制度存在的威脅。於是帝國主義者採取種種措施，企圖從經濟上和政治上孤立蘇聯。國際反動派甚至直接幫助托洛茨基派、季諾維也夫派和社會主義的其他兇惡的敵人。但是蘇聯人民以忘我的勞動爭取社會主義勝利，而博得全世界勞動人民的信任。好多外國工人代表團來到蘇維埃國家，以便親眼看看工人怎樣趕走剝削者，而建立了社會主義新社會。蘇聯社會主義的宏偉建設對資本主義國家工人，發生了巨大影響。斯大林在談話中指出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及其遠景。他說，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既不能和馬克思主義分開，更不能和馬克思主義對立。斯大林極明晰地描述了列寧如何創造性地應用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證明了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有機的統一，列寧對馬克思主義寶庫的新貢獻。這些新貢獻涉及科學共產主義的許多極其重要的理論問題：壟斷資本主義問題和作爲資本主義新階段的帝國主義問題；無產階級專政問題；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時期在資本主義包圍的國

家內勝利地建設社會主義制度的形式和方法問題；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民族殖民地問題，最後，還有無產階級政黨的問題。談到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時，斯大林認爲生活在前襲斷資本主義統治時期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祇能揣測資本主義發展的新條件。而列寧才根據「資本論」的基本理論，對帝國主義做出了論證性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在斯大林著作中獲得進一步的全面發展和論證。斯大林揭露了帝國主義不平衡發展規律的內容和決定意義，指出這個規律對瓦解資本主義制度的作用。列寧的社會主義革命論，就是以帝國主義時期資本主義國家不平衡發展的規律爲出發點的。列寧根據這個規律得出結論說，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新條件下，社會主義革命完全可以在單獨一個國家內勝利，而不能同時在全世界或大多數文明國家內勝利。斯大林在談話中深刻論證了工人階級先進部隊共產黨對蘇維埃社會的領導和指導作用，共產黨之所以領導政府乃是因爲它獲得了大多數工人與勞動人民的信任，並有權代表這大多數人領導政府機關。斯大林在談話中也說到蘇聯與資本主義國家間合作的問題，並且說明根據兩種制度可能和平共存的蘇聯對外政策的原理。兩種對立制度的並存，就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和平競賽，蘇聯人民不怕這種競賽。他們深知和平的經濟競賽，日益證明社會主義制度無可比擬地優於資本主義制度。正因如此，帝國主義者才害怕這種競賽，而不自量力地竟圖藉助於軍事冒險來扭轉歷史的車輪。

（從周節譯自蘇聯「經濟問題」雜誌九月號）

社會主義生產是蘇聯人民幸福生活的源泉

蘇·Г·沙羅金

聯共第十九次代表大會討論的關於第五個五年計劃指示草案，保證着社會主義生產的新高漲與蘇聯人民生活的進一步改善。

列寧與斯大林一再指示我們說：黨與政府的首要任務，就是關心人民的生活。因爲，正如斯大林同志所指出，社會主義並不意味着個人需要的縮減，相反地却是它的增加；不應該限制或拒絕滿足勞動人民在文化水平日益提高以後而逐漸增加起來的各種需要，而應該最大限度地滿足這些需要。事實上也正是如此。三十多年來的歷史說明：蘇聯人民的生活一天天改善，人民的各項需要也隨着一天天增加起來了。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追求更大的利潤是從事生產與擴大生產的唯一動機。而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剝削階級與生產資料的私有制根本消滅了。一切生產資料都屬於全民所有。因而，生產的最基本的動機，就只能是求最大限度地來滿足全社會的日益增加着的各種物質的與文化的需要。同時從另一方面來說，爲滿足這些社會需要所作的努力，也給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開闢了空前廣闊的發展前途。

社會主義生產是蘇聯人民幸福生活的源泉。生產一天天發展，巨大數量的生產品滿足着人民的各種需要，提高着人民的物質生活與文化生活。而在物質與文化方面提高了的生活的基礎上，需要也必然隨之提高。於是，它又推動着社會主義生產進一步向前發展，它成了發展社會主義生產的主要的推動力。

在蘇聯這社會主義國家裏，生產不斷地以驚人的速度向前發展。國民收入增加的情況很清楚地標誌出社會主義生產迅速發展的程度。戰時，雖然蘇聯的生產設備遭受了德寇的嚴重破壞，但是經過一個五年計劃，在一九五〇年國民收入與一九四〇年相比，就已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四。而按照第五個五年計劃的規定，到一九五五年時，國民收入更將增加到一九四〇年的兩倍半。

國民收入在各階級間的分配情況，是各該階級物質與文化生活水平的決定性的標誌。在資本主義國家內，資產階級佔有了整個國民收入的一半以上。而在蘇聯，全部國民收入都屬全社會所有，根據人民的利益有計劃地加以分配。其中絕大部份直接用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另一部份則用來擴大生產，間接地提高了人民將來的生活水平。

必須强調指出：爲了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必須迅速地不斷地發展社會主義生產，而要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就不僅要在量的方面努力，即不僅要增加工廠數目，擴大裝備，而且，還要在質的方面努力。只有不斷地改進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社會主義生產的發展，才算獲得了根本的保證。

（錦棠摘譯自蘇聯「布爾什維克」雜誌第十七期）

蘇維埃刑事程序理論問題

蘇·M·C·斯特羅左維奇

蘇維埃刑事程序理論方面的問題，自從斯大林同志兩年前發表了天才著作「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以後，有了極大的啓示。因此，蘇維埃刑事程序理論，有了幾本好的著作。例如A·Я·維辛斯基所著「蘇維埃法律的審判證據理論」，以及別的幾本好作品。但不能不指出：斯大林同志發表語言學問題以來，這二年間，對於別的社會科學都比蘇聯法權科學的發展要大得多。當然，這裏面存在着若干問題，本年「布爾什維克」雜誌第七期，M·摩羅卓娃等所寫的「提高法學著作的政治思想水平」一文，指出了在許多闡述法權理論的文章中，發生嚴重的錯誤。法學家們寫的文章，有一些缺乏政治指導性，或者是與目前社會發展脫節的文章。並且對論文的錯誤的發表，缺少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精神。

法學理論學家們，寫蘇維埃刑事程序理論時，作爲上層建築的主要部門，作爲科學來看待，都是不夠全面的。斯大林教導我們說：「社會現象，除了這共同東西之外，還有着自己的特點，這些特點，使社會現象互相區別，而且這些特點對於科學最爲重要。而上層建築的這些特點，就是它以政治、法律和其他觀念替社會服務，並且替社會創造相適應的政治、法律等制度。」

蘇維埃刑事程序就是社會主義司法——具體的和犯罪作鬥爭所採的必要措施。社會主義司法，國家的活動即體現在蘇維埃法庭和檢察機關手裏。所以它的地位極其重要，值得學者們注意，並加强刑事程序理論的研究工作，在研究這個問題上，蘇聯法學家們，對蘇維埃刑事程序的本質和性能是不夠清晰的。很顯然，它的內容和形式表現了社會主義的本質，眞正民主主義的，爲社會主義基礎忠實服務的蘇維埃刑事程序。還有一點應該說明，蘇維埃刑事程序理論的全部，都是以辯證唯物主義原則作爲主要根據的。

蘇維埃刑事程序這鬥戰鬥性的科學，必須揭穿以美帝國主義爲首的反人民的、卑鄙的「刑事程序」的醜惡面貌。蘇聯人民應該緊緊地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大斧，用

布爾什維克的精神，克服一切不純思想的侵蝕。斯大林同志諄諄教導我們說：「沒有不同意見的爭論，沒有自由的批評，科學是不可能發展，不可能進步的。」希望法學理論家們能在最近展開一次學術性的批評會議，用思想討論來解決一些存在着的問題，使得政治思想水平能經過這次會議提高一步。

（祖慶摘譯自「蘇維埃國家與法律」雜誌第八期）

蘇聯消滅城鄉的對立

蘇・Π・H・戈波奇卡

蘇維埃人民在列寧——斯大林的黨領導之下，達到了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勝利。斯大林教導說，隨着蘇維埃社會主義制度的鞏固，城市與鄉村的對立也因之而消滅。城鄉的對立，是社會分爲敵對階級的必然的結果。資本主義使城鄉對立達到極端尖銳化的程度，在城市的資產階級和鄉村的勞動大衆之間劃了一條鴻溝。資本主義的城市殘酷地剝削着鄉村，剝削着農民勞動大衆。資本主義工業自發的發展，也決定了資產階級的城市自發的發展，城市人口的增加，比城市面積與住房的增加迅速，因而發生人口過剩和住房困難的問題。資產階級在城市中造成貧民窟，造成各種社會災難。資產階級造成的災難，不僅在城市中，而更厲害的是在鄉村中，對農民的剝削。資本剝削的結果，是農業落後於工業，城市剝削鄉村，所以農業不能採用先進的技術，不能利用科學的成就。帝國主義時代城鄉的對立，更明顯地表現在工業國和農業國、宗主國和殖民地之間的對立中。帝國主義把世界分爲世界的鄉村——殖民地和世界的城市——宗主國。帝國主義者在殖民地和附屬國中人爲地阻止城市工業的發展和提高。譬如印度的城市居民一共只佔百分之二十二點八，錫蘭——百分之十五點四，比屬剛果——百分之十五點八，而英國的城市居民，則佔百分之七十九點二。

資產階級的學者一直肯定說城鄉的對立將永久存在，說農業的落後是自然界的賜與，是「土地效用遞減律」的結果，是人口過剩的結果。馬克思列寧主義揭穿了馬爾薩斯的謬論，科學地證明了只有消滅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只有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上才能消滅城鄉的對立。馬克思列寧主義不僅在理論上研究了消滅城鄉對立的問題，而且實際上，在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蘇聯，已經證明了消滅這種城鄉對立是可能的。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消滅了地主資產階級的政權、建立了新型的國家後，便在我國根除了城鄉對立的階級的基礎，並樹立了城鄉之間新的友誼的關係。城市已不再是剝削、壓迫鄉村的堡壘了。蘇維埃的城市，給予鄉村以政治上、經濟上和文化上的援助。工人階級和農民勞動大衆的聯盟，是城鄉之間新的相互關係的基礎，是消滅城鄉對立的基礎。社會主義就是在生產資料社會化的原則上使工業和農業正確結合的經濟組織。爲了建設社會主義，必須把鄉村引導到社會主義發展的道路上去。

蘇聯在消滅城鄉對立的方面，文化革命起着很大的作用。文化革命最重要的結果，是從工人階級、農民、蘇維埃職員的隊伍中出現了大批新的、人民的、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我國蘇維埃知識分子，不僅是從城市中、而且也是從鄉村中產生的，因而反映出蘇維埃人民文化的普遍提高。蘇維埃的城市不僅引導着鄉村向前發展，而城市本身也向前發展，變爲前進的社會主義的城市。

消滅城鄉之間本質上的差別這個問題，是我國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根本問題之一。城鄉之間、工業和農業之間本質上的差別，主要地是在城市中、在工業中生產資料和生產品屬於全民的財產，而在鄉村中、在農業中則不屬於全民的，而是屬於集體農莊的財產。由於兩種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存在，所以決定着按勞取酬社會主義分配原則的不同的形式。城鄉之間還存在着一種性質上的差別，就是農業的物質生產的基礎，還沒有發展到趕上工業的物質生產的基礎。但集體農莊在農業生產機械化的方面業已達到了顯著的成就，現在正順利地進行着集體農莊綜合的機械化的工作。在改造鄉村的方面雖然已經有了巨大的成就，但還不能完全消滅農村人口的分散性，集體農莊的鄉村還沒有達到社會主義城市的文化水平。對於順利地克服城鄉間的差別。工人階級和農民的團結一致和利害的共通性，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在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過程中，集體農莊所有制將逐漸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因而統一的共產主義所有制，統一的共產主義的生產，也隨着時間確立起來。

（石光摘譯自蘇聯「哲學問題」雜誌一九五二年第四期）

科學與工業相結合

蘇・B・克魯格洛夫

「科學與工業相結合」這句話，在斯大林格勒各種生產和科學會議上是常說的。該地各報紙天天都有關於科學家與工人合作的報導。政府對於科學家結合生產進行研究工作也特別重視。

該地加里寧工學院的科學工作者從前與生產毫無聯繫，研究出來的科學成果工人也無從知道。科學家不了解工業生產中的困難；工人則嘲笑科學家是在「製造理論」、「架空懸想」。但，這已是過去的事。現在，工人和科學家都已充分認識到，大家聯合起來工作，共同解決問題，對彼此都有好處，對生產和科學都有利益。

該院現正配合工廠的生產任務進行極廣泛的研究工作，渦輪、發電機、生產上先進技術的介紹與推廣、快速切削……這大多是跟當前建設水電站和運河的偉大工程有直接關係的。

爲了在伏爾加河建立一七〇萬基羅瓦特電力的斯大林水電站和二〇〇萬基羅瓦特電力的古比雪夫水電站，斯大林鋼鐵廠需要製造幾十個從一〇八、五〇〇到一二六、〇〇〇基羅瓦特電力的水力渦輪。每個渦輪重達一、六〇〇噸、總載重達三、五〇〇噸。製造這樣巨大的渦輪時，選擇合理的設計和節省原料是十分重要的，因爲稍微減輕一點，就可節省大量的鋼鐵。尤其重要的是機械的效率問題，如果能夠在效率上增加百分之一，僅就古比雪夫這一個水電站來說，就要增多二〇萬基羅瓦特的電力，因此，提高機器效率比單純的加大機件體積重要得多。總之，渦輪的每一部分及每一製造過程都是需要深刻的科學分析的。加里寧工學院和其他幾十個科學研究機構一樣，正爲製造這個偉大共產主義工程中精良的水力渦輪模型進行研究工作。

按斯大林鋼鐵廠水力渦輪車間原有的設備，是無法完成這樣巨大的生產任務的。該院科學家根據該廠研究室所

積蘗的豐富經驗加以研究，提出了解決這一問題的具體計劃。計劃中包括機器製造中新技術的採用，創造新式機器以及改裝設備等。

該院對基洛夫製造廠也有具體的幫助。如該廠有一個混合組織的合作隊，其中有該隊的創始人、快速旋力切削法教授薩威奇，加里寧工學院講師斯邱果列夫和廠內幾個工程師。大家合作的結果，把鑄造工作中最新的科學成果介紹到生產中去，並給旋力切削機設計出新的機件和裝置，使旋力切削機工人的生產率提高兩三倍。該廠因此節省了四百萬盧布。

加里寧工學院與工業有緊密聯繫，給工廠許多具體的幫助。在這種密切合作當中已獲得顯著的成績。

在科學和工業這種創造性合作的基礎上爭取技術的進步，已成爲蘇聯工程師和科學家的主要任務。科學家和工人創造性合作的結果，已成爲蘇聯技術進步的基礎。因此，科學工作者和生產工作者的愛國主義合作運動，對於蘇聯是有重大意義的。

這種正與蘇維埃制度的性質相符合的運動，將使工人階級的文化和技術水平不斷提高，因而也就使得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距離逐漸縮小，加速了國家向共產主義勝利地前進。

（金摩摘譯自蘇聯對外文化協會公報第七十四號）

爲軍國主義和戰爭服務的資產階級經濟學者

蘇·H·布留明

資本主義壟斷集團爲了掠奪別的國家，爲了獲得最大的利潤，挑撥着新的世界戰爭。所以，美英帝國主義者戰後的一切對內對外政策，都是服從於準備新的世界戰爭這一任務的。美英戰爭挑撥者及其僕從奴才們，爲了對人民羣衆進行新世界戰爭的思想準備，曾廣泛地採用他們從德國法西斯武庫裏面所剽竊得來的各種方法。新戰爭製造者首先是想克服人民羣衆對於帝國主義戰爭的憎恨。華爾街的御用學者們爲了達到這個目的，就千方百計地混淆戰爭的原因和本質問題，掩飾戰爭的階級性，模糊各種戰爭——正義的、解放的戰爭和非正義的、掠奪的、帝國主義戰爭之間的區別。他們極力掩蓋現代戰爭和帝國主義的內在關係，力圖推卸帝國主義對戰爭所負的責任。

資本主義制度的辯護者否認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最高階段，他們認爲帝國主義只是具有各種社會經濟結構的某種政策，有時他們還把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對立起來。例如，美國的溫斯洛（E. Wenslow）在他的著作「帝國主義的模型」一書中說道：「現代帝國主義就其起源來說，並不是經濟上的或資本主義的東西，而是一種老的强有力的行爲法則，這種法則可以應用到任何經濟制度中，無論是資本主義也好，或者集體主義也好。」這樣，他就可以得出一個與資本主義壟斷集團有利的原則，似乎帝國主義不是內在地與資本主義發生聯繫的。從而也不是與資本主義壟斷發生聯繫的，那末，它當然也就與帝國主義戰爭沒有任何關係了。資產階級的作家們反對用經濟的因素來說明戰爭，而力圖以他們捏造的「心理的因素」來解釋戰爭發生的原因。例如美國作家康特里（H. Cantril）和厄爾邦（Urbana）的著作：「緊張局勢招致戰爭」，鄧恩（F. Dunn）的：「戰爭與人們的意識」，英國歷史學家湯英比（A. Toynbee）的：「戰爭與文明」等就是如此。有些資產階級經濟學者，如英國的霍特里（R. Hawtrey）和羅濱斯（L. Robbins）更在他們的著作中，把壟斷資本跟國家及軍閥集團對立起來，企圖爲壟斷資本和金融寡頭推卸戰爭的責任。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不僅隱瞞帝國主義戰爭的眞正原因和眞正禍首，而且還替美帝國主義戰爭的眞正原因和眞正禍首，而且還替美帝國主義者奴役其他國家和人民的侵略政策辯護。他們以世界主義「理論」作基礎，認爲戰爭的發生是由於有國家主權的存在。他們拚命地宣傳國家主權乃是封建時代的產物，它現在已「不合時宜」，已不適合於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例如美國經濟學者鮑爾丁（K. Boulding）在「和平經濟學」一書中曾說：「戰爭發生於民族獨立的意圖」。里夫斯（E. Reves）、莫爾頓及其他許多美國資產階級經濟學者也都和他一樣，用這種資產階級的世界主義來替美帝國主義做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思想準備工作。

最有系統地替現代帝國主義經濟的軍國主義化作辯護的是凱恩斯的學說。它現在是道地的「戰爭挑撥者的政治經濟學」。它斷言爲了使資本主義制度能「正常地」起作用，資產階級國家必須採取種種措施，保證工業方面能有許多的國家軍事定貨，其數額足以抵補居民需要的大量降低。凱恩斯的黨徒里夫斯（E. Reves）更無恥地露骨地說：「現在浪費時間去找尋經濟生活的規律是徒勞無益的。我們的世界中只有大砲可以調節生產、貿易和消費。」

總之，「吃人主義乃是自然的規律」這句話可以作爲一切現代帝國主義辯護者的工作的寫照。從他們所說的話中完全反映出現代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已經退化和墮落到了極端的地步。

（延棟譯自蘇聯「經濟問題」雜誌第九期）

人民民主國家的幾個語言學問題

蘇·К·Н·馬祖爾 С·Б·伯恩施坦 等著

·朝鮮·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語文方面最重大的一件事情是各種報刊廢除了象形的漢字，改用純朝鮮字母。這樣一來，廣大的勞動羣衆就有機會接觸報刊了。

由十二人組成的特別委員會編輯的「朝鮮語語法」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出版。它的特點是用現代朝鮮偉大的作家李箕永、韓雪野等人的作品做例子，來說明語法現象；它詳細研討了語音學、詞彙、造詞法特別是名詞的造詞法。但是它有一些方法上的缺點，就是沒有把形態學的現象和句法的現象明確劃分界限；它也沒有對朝鮮語語法現象作一歷史的敘述。

·保加利亞· 斯大林確定了語言現象各方面的不平衡發展的法則，可是保加利亞有些語言學家却沒有把這一點解釋得很正確。有一位教授在一篇文章裏說，保加利亞語的語法構造比其他斯拉夫語言的語法構造「發展得更快一些」。（按：保加利亞語的名詞變格消失了。）這種說法會再度把這個毫無根據的錯誤理論從墳墓中掘出來：「綜合語必定會演變成爲分析語，而分析語似乎是語言結構的較高級和進步的類型。」蘇聯語言學家已經證明這種理論的反科學性。分析性只是保加利亞語的特徵之一，完全不是因爲保加利亞語趕過了其他斯拉夫語言。

（下轉52頁）

國內期刊重要學術論文索引

（一九五二年七—九月）

本刊資料室

題目	作者	登載刊物	卷期數
馬克思列寧主義			
論邊沁和功利主義	馬克思	新建設	九月號
從斯大林的語言學著作看科學共產主義理論的幾個問題	蘇・斯傑潘尼揚	新建設	七月號
再論中國共產黨與馬克思主義	王亞南	新建設	八月號
爲什麼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運動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相結合的產物	王朗超	學習	第五期
斯大林的經典著作——論蘇聯偉大衛國戰爭	米丁	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	一四八期
斯大林的預見的偉大力量—斯大林同志與第一次美國工人代表團談話的二十五週年	勞圖	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	一六一期
創造性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列寧著「國家與革命」三十五週年）		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	一六二期
學習斯大林關於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學說	劉大年	新華月報	七月號
學習毛澤東思想			
學習「『共產黨人』發刊詞」	許邦儀	學習	第五期
讀「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	榮孟源	新建設	七月號
讀「斯大林是中國人民的朋友」	朱劍農	新建設	七月號
讀「五四運動」	金克木	新建設	八月號
讀「大量吸收知識分子」	李達	新建設	八月號
讀「新民主主義的憲政」	張明養	新建設	九月號
讀「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	陳元暉	新建設	九月號
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科學性和革命性	胡繩	學習	第六期
「矛盾論」與工農聯盟問題	吳江	學習	第六期
從「矛盾論」中學習運用正確的工作方法	張雲瑩	學習	第六期
「矛盾論」解說（一—三）	李達	新建設	七—九月號
「矛盾論」與經濟科學	沈志遠	新建設	八月號
「矛盾論」與文藝學	黃藥眠	新建設	九月號
學習「矛盾論」認識思想改造的眞義	童書業	文史哲	總八期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	蘇・尤金	人民週報	第三七期
哲學			
發展即對立的鬥爭	M・羅森塔爾	學習譯叢	第六—八號
社會主義思想體系的基本特徵	Ф・康士坦丁諾夫	學習譯叢	第六號
美帝國主義者的思想體系是吃人者的思想體系	Г・阿歷山大羅夫	學習譯叢	第六號
實踐在認識過程中的作用	И・安得列也夫	學習譯叢	第七號
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社會發展規律的自覺運用	Г・格列則爾曼	學習譯叢	第八號
形而上學在歷史上的估價問題	馬特	新建設	七月號
羅素—新世界戰爭哲學化的挑撥者	E・波莫葛耶娃	新建設	八月號
歷史			
一種狡猾而庸俗的歷史觀	穆文甫	新史學通訊	七月號
論史學工作中黨性與科學性的統一	黃元起	新史學通訊	八月號
略論中國封建社會長期性問題	郭曉棠	新史學通訊	九月號
春秋時代中國經濟的主要發展	劉堯庭	新史學通訊	九月號
斯巴達卡斯起義的歷史意義	C・烏特欽柯	新建設	八月號

關於歷史人物評論中的若干問題 翦伯贊 新建設 九月號
太平天國初期英國的侵華政策 嚴中平 歷史教學 七月號
中國水車歷史底發展 程潤洛 歷史教學 九—十月號
美英資本家是太平天國起義的絞殺者 巴拉羅夫斯基
馬克思怎樣分析法國第二共和時期的歷史？ 趙儷生 文史哲 總九期

地理

關於自然地理的對象與方法 Д·С·庫茲涅佐夫 地理知識 七月號
偉大祖國地理的新面貌 鄒知白 地理知識 七月號
爲美帝國主義服務的種族主義 丘維柯夫 地理知識 八月號
帝國主義怎樣摧殘與浪費自然資源 程鴻 地理知識 九月號
亞洲及太平洋區域的新形勢 王興樞

政治·法律

論資產階級的兩面性 沈志遠 新建設 七月號
學習共同綱領，學習毛澤東思想 華崗 新建設 八月號
共同綱領是我國現時的根本大法 張志讓 新建設 九月號
從法律的階級性談肅清舊法觀點 陶偉 新建設
肅清反人民的舊法觀點 李光燦 人民週報 第三五期
反人民的舊法律和人民革命政權絕不相容 李劍飛
中國共產黨在解決民族問題上的成就 陳傳綱 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一六〇期
論黨工作中的布爾什維克作風 Д·斯列波夫 學習譯叢 第七號

財政·經濟

論經濟與政治的相互關係 П·伯洛夫 學習譯叢 第七號
論社會主義國民經濟的計劃發展 И·格拉特科夫 學習譯叢 第八號
計劃經濟的政治基礎與經濟基礎 格拉特果夫 計劃經濟 第四〇期
統計理論的若干問題 索包利 計劃經濟 第四〇期
蘇維埃商業的本質 奧布洛瓦茨基 計劃經濟 第四〇期
改進基本建設的計劃工作 蘇·「計劃經濟」社論 計劃經濟 第四一期
關於流動資金週轉速度計算方法討論總結 蘇·「經濟問題」 計劃經濟 第四一—二期
如何編製區經濟計劃 彼達耶甫斯基 計劃經濟 第四二期
論國家銀行的利率政策及三年來的市場利率情況 韓雷 中國金融 第七期
國家銀行執行國家預算出納業務中的若干問題 孫韋其 中國金融 第一一期
保加利亞幣制改革的重大成就 安奇羅夫 中國金融 第一三期
論現階段的銀行工作 鄭伯彬 經濟周報 第二六期
戰後美帝的貨幣擴張政策 曉寒 經濟周報 第二八期
人民幣的主要特徵 王靜然 經濟周報 第三〇期
「五反」運動後的勞資關係 施復亮 經濟周報 第三一期
三年來我國財政收支走向平衡的過程 朱庭祝 經濟周報 第三三期
向財經工作中的保守傾向作鬥爭 江錚 經濟周報 第三五期
迎接全面的勞動就業 依·吉洪諾夫 經濟周報 第三七期
論資本主義總危機 蘇·卡茨 人民週報 第三〇期
美國勞動人民貧困加劇的眞象 新華月報 八月號

文化·教育

關於作爲社會現象的教育的專門特點的爭論總結 Н·И·包德列夫等 人民教育 七—八月號
高等學校的「專業」設置問題 曾昭掄 人民教育 九月號
蘇聯高等教育的改革 А·А·福民 人民教育 九月號
對於學習革命理論應有的認識 徐懋庸 新建設 八月號
反對以形式主義的態度對待批評 蘇·「眞理報」社論 人民週報 第二八期
在中國科學院研究人員學習會上的講話 陳伯達 人民週報 第三七期
斯大林關於語言學的論文對於中國學術工作的意義 胡繩 新華月報 七月號
人民教師必須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 吳玉章 新華月報 七月號
師範大學教學工作的種種形式 蘇·波波夫 新華月報 八月號
思想改造中的根本問題 華崗 文史哲 總八期

一般自然科學

斯大林關於語言學的著作及其對自然科學的意義 Д·М·特洛申 科學通報 三卷七期
列寧的辯證法和數學 А·Д·亞歷山大洛夫 科學通報 三卷七期

「哲學問題」雜誌編輯部關於M·A·馬爾科夫「論物理學知識底性質」一文討論的總結　科學通報　三卷八期
量子理論發展中的幾個問題　Я·П·切爾列茨基　科學通報　三卷八期
反對量子力學中的唯心主義　M·Э·奧密里揚諾夫斯基　科學通報　三卷八期
批判對量子理論的唯心主義的理解　Д·И·布洛欣采夫　科學通報　三卷八期
物質世界的統一性　Н·Ф·奧欽尼柯夫　科學通報　三卷八期
英美物理學的唯心論爲宗教和反動勢力服務　南　恩　科學通報　三卷八期
跟着中國科學翻了身的地質學　李四光　人民週報　第三九期
反對「物理學的」唯心論變種——現代「唯能論」　A·維斯洛波可夫　學習譯叢　第六號
巴甫洛夫的生理學說對於蘇維埃教育科學的意義　蘇·包曼等　新華月報　八月號
巴甫洛夫關於條件反射的學說　艾拉斐建慈　文史哲　總九期
論科學與生產相結合　林　平　新建設　八月號
唯物論的細胞學說　O·Б·勒伯辛斯卡婭　蘇聯農業科學　九月號
爲堅持生物科學的米丘林方向而鬥爭　人民週報　第二八期
米丘林農業生物科學在中國應用的初步成果　盧森科　新華月報　九月號
對於目前中國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研究　北京農業大學農業經濟學系　新建設　七月號
保加利亞農業上的鉅大變革　西蒙·科拉諾夫　中國農報　第一四期

語　文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語言與思惟的關係　A·福斯特利可夫　學習譯叢　第八號
斯大林關於語言學的著作發表以來的中國語言學　Б·Г·穆德洛夫　新建設　九月號
爲什麼我們需要拼音文字　草　憑　中國語文　七月號
民間文藝的語言　老　舍　中國語文　七月號
半拼音呢，還是全拼音呢？　曹伯韓　中國語文　七月號
談談語音構造和語音演變的規律　丁聲樹　中國語文　八月號
從歷史上看中國文字改革的條件　羅常培　中國語文　八—九月號
現代漢字及其改革的途徑　丁西林　中國語文　八月號
語言學的對象和任務　羅常培　中國語文
語言的分化和統一　T·C·沙拉澤尼澤　中國語文　八月號
統一民族語的形成過程　邵榮芬　中國語文　九月號
推行速成識字法與文字改革運動　張世祿　中國語文　九月號
論漢語（上）　蘇·康拉德　中國語文　九月號
斯大林的著作「論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中的問題」對匈牙利科學發展的影響　匈·浮加拉西　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一五〇期
斯大林同志關於語言學的著作與波蘭文字研究問題　波·饒關斯基　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一五〇期
從斯大林的語言學說談中國語言學上的幾個問題　羅常培　科學通報　三卷七期
斯大林論語言學的著作給研究少數民族語言的指示　羅季光　科學通報　三卷七期

文學·藝術

蘇維埃文學發展的幾個問題　蘇·蘇爾科夫　人民週報　第三〇期
關於繼承民族音樂遺產問題　李　凌　人民週報　第三八期
論目前電影劇本創作中的主要問題　黃　鋼　文藝報　第一三號
藝術的眞實　塔拉森柯夫　文藝報　第一三號
爭取生活底眞實　索弗羅諾夫　文藝報　第一四號
中國文學中從古典現實主義到無產階級現實主義的發展的一個輪廓　馮雪峯　文藝報　第一四—一七號
高爾基論描寫新舊的鬥爭　潘科夫　文藝報　第一六號
論形象與感受　秦　策　人民文學　九月號

爲新中國奮鬥

宋慶齡著　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九月初版
二五開　三三〇頁　定價（平裝）一八、〇〇〇元

本書收集了作者自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五二年之間所發表的重要演講、論文和聲明等，共六十三篇。按照不同的歷史背景，本書分爲五個部分：第一部分是作者在一九二七年國民黨背叛革命後爲斥責這個背叛而寫的，共十一篇。第二部分都是爲反對法西斯恐怖統治和保衛人民權利而作的，共四篇。第三部分代表作者對於一九三一年中國被日本侵入後的政治局勢的意見和作者在這種局勢中所作的促進中國人民一致抗日的努力，共八篇。第四部分是在抗日戰爭以後至愛國自衛戰爭期間所寫的，共十二篇。第五部分都是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發表的，共二十八篇。本書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寫的「反映了歷年以來的革命潮流，反映了人民力量的消長，反映了人民的力量最後衝破一切，取得勝利」。這是一本義正詞嚴的傑出的政論集；同時，也是中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以來人民鬥爭的一部分寶貴史料，它對於我們學習新民主主義革命史，是有幫助的。

甲骨文字研究

郭沫若著　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九月初版
一六開　一六八頁　定價八〇、〇〇〇元

本書原是著者一九二九年在日本寫成的。一九三一年曾在上海出版，因印數不多，現在已不易得到。最近經著者重新整理後，以手稿影印出版。原書本是十七篇，這一次刪去了九篇，另外又添上了一篇，共九篇：釋祖妣、釋臣宰（附：土方考）、釋繇、釋勿勿、釋繇言、釋朋、釋五十、釋歲、釋支干。著者在「重印弁言」中說明對甲骨文字考釋的目的，「是想通過一些已識未識的甲骨文字的闡述，來了解殷代的生產方式、生產關係和意識形態」。

著者又指出：「甲骨文字的研究，經過其後的安陽小屯的科學發掘，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殷代社會的眞實情況，比起二十幾年前也更加明瞭了。殷代是青銅器時代和奴隸社會，已經是毫無疑問的事。」在這裏，著者糾正了他二十幾年前把殷代當做金石並用時代和原始共產社會的末期的錯誤看法。正文前有「序錄」一篇，說明做考釋時所用的研究資料和參考書籍。在鄭重文化建設高潮的今天，本書的重印是值得重視的。

「共產黨宣言」名詞解釋

范若愚編　青年出版社一九五二年八月初版
三二開　九六頁　定價三、四〇〇元

本書主要內容，是解釋「共產黨宣言」這一經典著作中的一些比較重要的名詞。也包括德、俄、英、意等各種文字的版本序言在內。

在「名詞解釋」的前面，編者摘錄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對「共產黨宣言」所講過的一些話。另外又從蘇聯科學院歷史院所編的「近代史教程」中，摘錄了有關「共產黨宣言」的一段介紹文字。這對我們學習「共產黨宣言」是有幫助的。至於註釋的主要名詞，一共有六十四個。編者引用的材料相當豐富，而且簡明易懂。

編者在「前言」中指出，「初學『宣言』的人，若是缺乏一定的社會科學知識，尤其是世界近代史知識，是會感到許多困難的」；而編輯本書的目的，「就是想幫助初讀『宣言』的人，解決這方面的一些技術上的困難」。在這方面，著者是盡了努力的。

十九世紀美國對華鴉片侵略

紹溪著　三聯書店一九五二年十月初版
三二開　一一〇頁　定價三、六〇〇元

中美通商開始於一七八四年到一八〇五年，美國侵略者就從土耳其販運鴉片來中國。本書指出，美國侵略者歷年販運的數量誠然不及英國侵略者，但在一八一七和一八一八兩個年度，美國鴉片販子已成爲東印度公司的勁敵。一八三八年十二月，廣州人民八千或一萬人，由於痛恨美國侵略者和英國侵略者的猖狂販毒和蠻橫暴行，曾包圍美國「夷館」。本書對這件事有一段介紹。

本書對於林則徐到廣州查禁鴉片這段時期（一八三九至四〇年），說明美國侵略者是一面暗中抗拒，支持英國侵略者的行動，一面乘機做運輸生意，大發其財；而鴉片戰爭結束後，美國不費一兵一卒也獲得了種種特權。

一八四二至五八年是美國侵略者更加擴大鴉片走私的時期。在這個時期，美國海軍當局玩過一套「協助」禁烟的把戲，望厦條約中又有所謂「不袒護」鴉片販子的條款，本書揭穿了這些騙局。所謂「不袒護」條款，在一八五八年的中美天津條約中是被取消了。美國侵略者還勾結英國侵略者强迫滿清取消了鴉片禁令。

本書所敘史實雖然比較簡略，但也可以使我們認識到美帝國主義的兇殘面目，認識到它是中國人民的死敵。

「毛澤東選集」蒙文單行本出版

爲了紀念「毛澤東選集」出版一週年，內蒙古自治區譯印的「毛澤東選集」蒙文版首批單行本四萬册，十月十二日起在內蒙古和綏遠各地普遍發行。這批蒙文單行本，包括「毛澤東選集」第一卷裏的五篇文章：「實踐論」、「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必須注意經濟工作」、「我們的經濟政策」和「關心羣衆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北京市軍管會登記證新字第二二九號
北京郵政管理局登記執照第九號

斯大林著

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

斯大林同志最近發表了重要著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文譯本已經出版。

斯大林同志的這本著作的出版，標誌着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的最高階段。斯大林同志在這本著作中，從各種角度闡釋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問題，他分析了社會主義經濟法則的性質——這種分析，在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中還是第一次——確定了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法則，並說明了從社會主義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主要前提。斯大林同志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學說，給予各種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以致命的打擊，並批判了某些經濟學家的錯誤論點。斯大林同志在本書中對於目前資本主義的主要問題也作了深刻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

斯大林同志的這一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極爲重要的科學著作，具有巨大的國際意義。中譯本的出版，必將在我國人民的思想政治生活中發生巨大的影響。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華書店發行

學習「矛盾論」（第一輯）

艾思奇　賴若愚　沈志遠等著　定價四千五百元

本書爲幫助讀者學習「矛盾論」而輯。內容包括艾思奇的「從『矛盾論』看辯證法的理解和運用」，賴若愚的「毛澤東同志的『矛盾論』是解決實際工作問題的鑰匙」，榮孟源的「『矛盾論』對歷史科學工作的指示」，沈志遠的「『矛盾論』與經濟科學」，千家駒的「讀『矛盾論』——聯繫到對中國資產階級的認識問題」，徐懋庸的「『矛盾論』在思想改造工作中的應用」等六篇。

學習「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再版）

李達　艾思奇　鄭昌等著　定價七千元

學習「實踐論」（增訂本）

王亞南　王學文　郭大力等著　（在排印中）

新建設雜誌社出版　　新華書店總經售